

---

# 苏轼研究

2017 年第 2 期（总第 49 期）

（季 刊）

## 卷首语

宋代的端午节也称重午节、菖蒲节、沐兰节、天中节等。苏轼词中有不少写到端午习俗，如《少年游》（银塘朱槛曲尘波）中“兰条荐浴，菖花酿酒”；《浣溪沙》（轻汗微微透碧纨）中“明朝端午浴芳兰”，“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南歌子》（山与歌眉敛）中“菰黍连昌歆，琼彝倒玉舟”等。

文化习俗的传承有赖于其本身的内涵和意义，在于它深厚的民族味、文化味、乡土味、人情味。宋代端午习俗主要沿袭前代，《大戴礼记》有：“五月五，蓄兰沐浴。”《荆楚岁时记》载：“端午，以菖蒲一寸九节者，泛酒，以辟瘟气。”每年五月五日，人们用兰叶浸水沐浴，去灾除晦；饮菖蒲酒或艾叶酒，开窍、理气、活血、祛湿，盼望耳聪目明、延年益寿。此外宋人还有龙舟竞渡、系朱丝避兵、书午时符、吃粽子等端午活动，时至今日，其中的部分习俗仍然在感动和影响我们的生活。

2017 年第 2 期《苏轼研究》付梓之际适逢端午，我们选择了多篇不同角度、风格迥异的文章，如阮忠《苏东坡流贬海南儋州的“和陶诗”论》、王万洪《“尚意”宗师苏轼》、刘清泉《谈苏轼的赋税观》、达亮《苏轼与径山“十方住持”交游考》等，相信您能有不少启发。

---

# 苏轼

## 研究 SUSHIYANJIU

2017年第2期(总第49期)

(季刊)



## 目 录

□编辑出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  
《苏轼研究》编辑部

□委印单位: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主管单位: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

□主 编:张志烈

□副 主 编:周裕锴 方永江 潘殊闲

□责任编辑:刘清泉

□编 辑:袁 丁

□编 务: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312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h.cn>

邮箱:[sushiyanjiu@163.com](mailto:sushiyanjiu@163.com)

印数:2000册

发送:苏轼研究学者、爱好者,有关高校  
及图书馆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新财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年6月

### □苏学论坛

- |                  |        |
|------------------|--------|
| 苏东坡流贬海南儋州的“和陶诗”论 | 阮 忠/04 |
| “尚意”宗师苏轼         | 王万洪/17 |
| 谈苏轼的赋税观          | 刘清泉/26 |
| 黄州出土苏轼乳母墓志及铭文定本考 | 梁敢雄/31 |
| 苏轼与佛禅            | 晏 飞/35 |
| 苏轼与径山“十方住持”交游考   | 达 亮/40 |
| “东坡诗词中说”的前世今生    | 饶晓明/43 |
| 苏味道故里追述          | 苏士福/46 |
| 苏轼对河北地域文化的贡献     | 李占才/54 |
|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的“学”     | 杨江帆/60 |

□顾问：李 静 罗佳明 王影聪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王水照 刘尚荣  
苏 灿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永江 木 斋 王友胜  
王希龙 王晋川 刘川眉  
刘清泉 朱 刚 孙开中  
李景新 冷成金 张志烈  
张 鸣 张海鸥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卢晓光  
宋明刚 周裕锴 胡先酉  
涂普生 康 震 韩国强  
蔡心华 熊朝东 潘殊闲

---

## □诗文鉴赏

读《东坡志林》（十四） 徐 康/61

## □新书评介

东坡味道三味鲜 方永江/64  
——王晋川《东坡味道》的乡土情结  
三苏文化的虔诚使者 廖文凯/66  
——兼读方永江《且行·苏祠外仰视》  
九百年来天地变，斯民始终爱坡翁 许植基/71  
——读陈弼编著《千年东坡百家赞》

## □研究史话

“书画亦皆精绝”（二） [新加坡]衣若芬/72  
——历代对苏轼书画的评价

## □苏学专家

恩师马德富先生传 唐 瑛/74

## □景苏札记

苏东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杨常沙/75  
苏轼与李清照 林冠群/78

## □苏学动态

徐州举办苏轼诗词朗诵会 有 愚/80  
四川工商学院三苏文化研究所成立 有 愚/80

# 苏东坡流贬海南儋州的“和陶诗”论

阮 忠

**内容提要** 苏东坡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钟情，在他的《和陶归去来兮辞》《归去来集字》里有集中的体现，蕴含了陶渊明式的人生淡泊与静穆；他在儋州的“和陶诗”所叙儋州之事，所抒一己之情，表现出他是一个随遇而安的阅世者，在对社会的关注中享受着儋州生活的平和；东坡的“和陶诗”在平淡自然方面具有“陶味”，但他“和陶诗”的寓情于史及以学问为诗等，是不同于陶诗的“苏味”。

**关键词** 苏东坡 儋州 和陶诗

苏东坡流贬海南对他来说也是很意外的事。他59岁被贬惠州，满以为惠州是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站，在惠州白鹤峰建了新居，让儿孙来惠州团聚。但诏书急下，改任琼州别驾，移居海南昌化军即今儋州。并在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渡过琼州海峡，经琼州府城，于七月二日到达儋州。他在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再次渡过琼州海峡，奉诏北归。在海南刚好生活了三年。这三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人生记忆，他曾把儋州之贬和早年贬黄州、后来贬惠州相提并论，在北归途中写于江苏镇江金山寺的《自题金山画像》<sup>〔1〕2641</sup>里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自然是他的愤激之词，被贬黄州时任团练副使，贬惠州时任宁远军节度副使，到儋州做的琼州别驾，都是没有实权的闲职，在政坛上无所作为。这三个时期彪炳他人生功业的不是政绩，而是让他垂名千古的诗文创作。

苏东坡流贬海南，最后遇赦北归，死在了江苏常州，也是他希望的晚年栖身之地。他到海南之初，心怀死志，自认为首先要做棺槨，没想到三年后的人生感慨居然是“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sup>〔1〕2362</sup>；“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sup>〔1〕2366</sup>。审视东坡在海南的生活，说是琼州别驾，其实是朝廷束缚他的枷锁，是拴在他脖子上仍能时刻牵引他东则东、西则西的绳索。他没有处心挣脱之意，而是顺适求安，平和宁静地生活，在当地交朋结友，很少和大

陆的旧友联系，喝酒、读书、写作，并在《海葛延之作文法》这篇随笔里，就写作方法发表过很好的意见。而他海南诗歌的创作中，有三个部分，即和陶诗、与弟弟苏辙的唱和诗以及因物因事因人的感兴之作。这三类诗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分开，但实质上都在表现他在海南生活的情状。本文只拟讨论苏东坡在海南的“和陶诗”，其他的诗歌日后再说。

## 一、“归去来兮”式的淡泊与静穆

苏东坡在海南，曾给朋友程全父写信说自己“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今又辱来贶，清深温丽，与陶、柳真为三友矣。”（《与程全父十二首》十一）<sup>〔2〕1627</sup>这话里的“如逃空谷”语出《庄子·徐无鬼》的“夫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跂然而喜矣”，以见逃虚空者的孤独寂寞。当时苏东坡刚到儋州不久，人地生疏，所以他说自己既没有可以交谈者，也没有书籍可读，唯有随身带的“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他把这二者称为“二友”，再加上程全父“清深温丽”的信，东坡戏称为“三友”。

先暂且不说苏东坡的“和陶诗”，说一下他在儋州写下的《和陶归去来兮辞》<sup>〔1〕2560</sup>。这篇和辞有则“小引”写道：“予瞻谪居昌化，追和渊明《归去来辞》，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他这句话说得很沉重，和陶渊明当时的情形大为不同。陶渊明41岁时任彭泽县令，本想借此维持家庭的生计，满足自己对酒的嗜好，只是他生性爱好自然，既受不得做官的约束，也不能为五斗米折腰面对那些浅薄的上级小官吏，于是写下了《归去来兮辞》，主动辞职还乡。应该说《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的自新书，他以辞职肯定昨非今是，完成自我的批判和救赎，并表现了回家后“引壶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的新生活状态。他也说到人生短暂，富贵不是理想，成仙又不可能，不妨“委心任去留”，“乐夫天命”。陶渊明没有说自己生活在“无何有之乡”，而东坡在《和陶归去来兮辞》“小引”里说自

己“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这“无何有之乡”出自庄子的《逍遥游》，名家学派的惠施曾对庄子说，他有大树但“大而无用”，借此讽刺庄子的学说“大而无用”。庄子说惠施不善于用大，“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庄子求无害而逍遥的生活，视之为最高的人生境界，“无何有之乡”就是一种象征。而东坡以此暗示自己身处海南的艰难处境。他在例行的《到昌化军谢表》<sup>(2)</sup> 707里向宋哲宗诉说：“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这时候的他似乎除了死亡，真的是“无何有”了。

东坡《和陶归去来兮辞》用其体制和原韵，形式上的相同是唱和体本身决定的。但二人实际的情形和表达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陶渊明写了《归去来兮辞》之后，真的辞官还乡，他畅想的田园生活变得很实在。如他写道：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东坡谪居儋州，心系故园却不知何时可以回还。所以，当陶渊明发问：“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时候，东坡步其后尘，《和陶归去来兮辞》<sup>(1)</sup> 2560说的是“归去来兮，吾方南迁安得归。卧江海之溟洞，吊鼓角之凄悲。迹泥蟠而愈深，时电往而莫追。怀西南之归路，梦良是而觉非。”所谓“吾方南迁安得归”，一个“安”字，隐含了对家乡的怅望和身陷儋州的无奈。苏东坡被迫身赴海南之初，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的心境大不相同。62岁的他这时也怀乡，对自我的人生也有反省。但没有陶渊明解脱之后的轻松愉悦。陶渊明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知道迷路了赶紧回来，昨天错了今天改正就是。很洒脱的东坡写《和陶归去来兮辞》<sup>(1)</sup> 2560~2561时显得有些郁闷，他说不出陶渊明这样爽快的话，而是喃

喃自语：

我归甚易，匪驰匪奔。俯仰还家，下车阖门。藩垣虽缺，堂室故存。挹吾天醴，注之注樽。饮月露以洗心，餐朝霞而眩颜。混客主而为一，俾妇姑之相安。知盗窃之何有，乃扃门而折关。廓圆镜以外照，纳万象而中观。治废井以晨汲，渝百泉之夜还。守静极以自作，时爵跃而觐桓。归去来兮，请终老于斯游。我先人之敝庐，复舍此而焉求？均海南与汉北，挈往来而无忧。畸人告予以一言，非八卦与九畴。方饥须粮，已济无舟。忽人牛之皆丧，但乔木与高丘。警六用之无成，自一根之返流。

当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里诉说他回家的温馨时，那家就在他的眼前：“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陶渊明自我的欢欣与家人的欢欣在会面的一刹那融合在一起了。而东坡的回乡，他说只在俯仰之间，其实是虚幻的想象，或者说做了还乡的梦，使他在一刹那之间有回到家乡的感觉。他的家“藩垣虽缺，堂室故存”，破碎，仍然是家。陶渊明确说“有酒盈樽”，自饮为快。东坡呢？他只能“饮月露以洗心，餐朝霞而眩颜”，在月露、朝霞中陶冶自己的心性，把孤寂的日子演化为积极的“守静极以自作”。这一说法原本于老子，老子讲“道”，视清静为天地的真正精神，告诫人们以清静自我完善。东坡表示将遵循老子所说的去做，在清静中获得新的人生快乐，如雀飞鱼跃，一任自然，比陶渊明有更积极的人生态度。

进而，当陶渊明表示息交绝游，以求自我自由自然的人生时，东坡回到现实，要“终老于斯游。我先人之敝庐，复舍此而焉求？均海南与汉北，挈往来而无忧”。这时，他重拾豁达的人生态度，淡化了悲伤和痛苦，心胸和视野也更为开阔。人生如飞鸿，为什么要舍弃儋州新居而回到祖辈的老屋？海南和汉北，何处不是家乡？这让人想起他在儋州写下的《试笔自书》<sup>(2)</sup> 2549里说的“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没有人不是生活在岛上，海南和汉北有什么区别呢？东坡在这里用《庄子·大宗师》里的“畸人”生于自然的故事，说人生无一不是自然所致。而人的生命终归虚无，生活中如果“六用”即“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不成，则求“一根”即心识的回复，也就是保持内心的宁静，不再追寻欲望。并说：“已矣乎，吾生有命归

有时，我初无行亦无留。驾言随子听所之，岂以师南华而废从安期。”这样的表述本质上是陶渊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思想的演化。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陶渊明确说人的寿命有限，所以人生尽可以随意而行。东坡则说人生有命，命中注定他是会回到家乡的。而现在无所谓返乡也无所谓滞留儋州。随它去吧，想师从南华真人庄子就师从，却不必废除跟随仙人安期生。东坡在想象中把自己置于自由的境地，不再扭曲自己的心性去适应外部的世界。还表示他将“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

东坡的《和陶归去来兮辞》，袒露了自己居儋的内心世界，他在痛苦中的自我救赎，借助了陶渊明自由自然的精神，从而实现新的人生超越，使身陷的苦难不再是苦难。这大概是他“师渊明之雅放”的关键所在。需要提到的是，东坡曾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的字词和文意，成诗十首，诗序说“予喜读渊明《归去来辞》，因集其字为十诗，令儿曹诵之，号《归去来集字》云”；在黄州时，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改写成词《哨遍》（为米折腰）<sup>〔3〕378</sup>，词序说“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既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櫟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他还用《归去来兮》的原韵题写了书法长卷，题辞说“予久有陶彭泽赋《归去来辞》之愿而未能。兹复有岭南之命，料此生难遂素志。舟中无事，倚原韵用鲁公书法，为此长卷，不过暂舒胸中结滞，敢云与古人并驾寰区也耶！”（《题陶靖节归去来辞后》）<sup>〔2〕2551</sup>这三者与他《和陶归去来兮辞》相应。另外，他在和了《归去来兮辞》后，还要苏辙唱和，足见东坡与陶的意气相许，酷爱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苏辙有《和子瞻归去来兮辞》，只是东坡要他唱和时，他当时正从海康迁龙川，无暇顾及。后来在颍川，他翻阅旧稿时，重读了东坡的《和归去来兮辞》，“乃泣而和之”，这时东坡已经死去多年了。苏辙一生有和陶诗七题四十四首，均是“次韵子瞻”之作，如《次韵子瞻和渊明饮酒诗二十首》。

东坡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他的《哨遍》（为米折腰）<sup>〔3〕378</sup>以庄子式的“我忘我兼忘世”超越了陶渊明思想，但他这首词是“櫟括”即主要是浓缩陶《归去来兮辞》之意。如词的上阕写道：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

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余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返，本非有意。

这对陶《归去来兮辞》之意并没有改变。姑且不说词，还是说东坡的《归去来集字》诗，以见他心目中的陶渊明。这组诗和一般的集句诗不一样，集句诗通常以所集前人诗的成句组合成诗，而东坡称为集字诗，诗所用字词取之《归去来兮辞》，表意也就比集句诗更加灵动。

《归去来兮集字十首》<sup>〔1〕2356~2359</sup>粗看起来是重新演绎陶渊明的思想，像其一：

命驾欲何向，欣欣春木荣。  
世人无往复，乡老有将迎。  
云内流泉远，风前飞鸟轻。  
相携就衡宇，酌酒话交情。

可以说，这首诗除了语言形式的变化之外，全然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开篇叙说回家情形的翻版，而其三亦然：

与世不相入，膝琴聊自欢。  
风光归笑傲，云物寄游观。  
言话审无倦，心怀良独安。  
东臯清有趣，植杖日盘桓。

东坡在诗里描述的是《归去来兮辞》里的陶渊明，让他辞官归于田园的情形得到再现。如果全是如此，那这些集字诗不过是文字游戏，没有更多的意义。但细细品味，东坡在这组诗中通过陶渊明的文字展示一个类似陶渊明的自我，如其六：

富贵良非愿，乡关归去休。  
携琴已寻壑，载酒复经丘。  
翳翳景将入，涓涓泉欲流。  
老农人不乐，我独与之游。

诗的前三联之意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之意相同，但最后一句“老农人不乐，我独与之游”则是他自己的生活的。这种情形在其七里也存在。其七中东坡说了陶渊明式的乘化安命、息交绝游之后，冒出的“琴书乐三径，老矣亦何求”有他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他似乎在走向田园的时候，以琴书自娱，在一任自然中渐渐老了，与世事有了更多的隔膜。最典型的是其十：

寄傲疑今是，求荣感昨非。  
聊欣樽有酒，不恨室无衣。  
丘壑世情远，田园生事微。  
柯庭还独眄，时有鸟归飞。

东坡在这里把陶渊明的“觉今是而昨非”和“倚南窗以寄傲”改造成为“寄傲疑今是，求荣感昨非”，说昨日求荣为非，今日寄傲为

是,这是颇有意味的。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并无“求荣”之说,他当初去做彭泽县令,并不为立名,而想的是养家糊口,兼及满足自己好酒的欲望。而他的《五柳先生传》为自己明言“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安于家徒四壁、不蔽风日、破衣褴褛以及箪瓢屡空的生活。东坡生发出的“求荣”,更多的是自我心态和生活的追求。当年,他跟随父亲苏洵出川进京赶考,何尝不是求荣?与弟弟苏辙同时榜上有名,名震京师,东坡也是很自得的。后因不赞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且以诗讽刺新法遭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那里写过一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sup>(3)</sup>,说什么“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他何曾真的隐于江海?名词《念奴娇》(大江东去)<sup>(3)</sup>最后吟出的“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蕴含着宦海浮沉、功名未立的痛苦。而他在这时候,功名心淡化了。东坡《哨遍》(为米折腰)也有“觉从前皆非今是”的句子,与这里说的“求荣感昨非”有所不同,正因为如此,他始终都没有陶渊明辞官的决断,毅然挂冠归去。

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sup>(1)</sup> 1111 曾感慨地说:“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东坡不是没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性情,而是他比陶渊明有更多的政治抱负。陶渊明固然表白过“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十二首》其二)<sup>(5)</sup> 115~116,却没有东坡深远的政治思考和报国热忱。东坡一再受辱,不忍归隐,并在《留侯论》<sup>(2)</sup> 103 里专就“忍”字做文章,说“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关键就在这里。

东坡曾经录了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其九中的“纡轡诚可学,违已诘非迷”,录完后写了两句话:“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录陶渊明诗》)<sup>(2)</sup> 2111 心中有话,吐之逆人,不吐逆己,选择逆人也不逆己,是东坡的性情使然。他自视与陶渊明在这一点上性情相合。所合的当然不止这一点,陶渊明的淡泊与静穆也同样让东坡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在儋州以陶渊明为友,更多的是因为后者。

## 二、“和陶诗”中随遇而安的阅世者

东坡到儋州之后,在给雷州苏辙的信说: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与子由六首》五)<sup>(2)</sup> 2515

这封信赖苏辙的《追和陶渊明诗引》得以保存,其中有些问题得说一说。

首先,东坡对苏辙说,他在诗坛上开了“追和古人”的先河。诗人之间的酬唱是魏晋以来就有的事,以诗拟古也常在发生。西晋陆机的拟《古诗十九首》、东晋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南朝宋代鲍照的拟《行路难》、南朝齐代王融等人拟汉乐府的《陌上桑》、《相逢行》,这些诗人的拟作,以前人的诗歌为创作模式,“追和”的意味是很浓的,但明言为“拟”,未以唱和的形式出现。

其次,东坡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这一说法不仅跳过了东坡之前的宋诗,而且跳过了唐诗,舍去了陶渊明之前的汉魏诗及《诗经》。他于诗的所好同时彰显了于诗的所不好。这固然无可指责,但他的创作趣味和欣赏趣味,大不同于一般的人。甚至说曹植、谢灵运、李白、杜甫这些诗人都赶不上陶渊明,也只是一己之见。

其三,东坡评价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说是陶诗看起来朴素,实际华美;看起来清瘦,实际丰满。这只能说东坡对陶渊明的诗别有会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悟,关键在于诗味。东坡曾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题渊明饮酒诗后》)

<sup>(2)</sup> 2092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见于陶渊明的《饮酒》,东坡在欣赏中主张“悠然见南

山”当用“见”而不是“望”，说如此更能体现陶渊明见山时的自然状态，或者说更能见陶渊明的本色。他这种想法源于陶渊明归于田园后一任自然的生活态度，率真的东坡也喜欢陶渊明的率真，曾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sup>(2) 2148</sup>

其四，在这封信中，东坡录了陶渊明临终时《与子俨等疏》里自述平生的一段话：“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他说陶渊明话是“实录”，其中最触动他的是陶渊明“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东坡因之想到自己，他也是“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导致命运的起伏与坎坷。而自己没有早醒悟而陷世俗，和跳出樊笼、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比起来，不觉有些羞愧，反思当学陶渊明。不过，他觉得自己的和陶诗是写得无愧的。这也许是他把自己的“和陶诗”编成《和陶集》的重要原因。

苏辙对东坡在儋州写下的和陶诗很赞赏，在《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sup>(4) 1110</sup>中说：“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菰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此亦皆罢去。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东坡这“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不单是没有华屋玉食的条件，而且是他随缘适性的自然结果。艰苦的生活使东坡少了平生的喜好，作诗的随兴感发并没有排斥文章的写作，在诗歌中再现自己新的人生。

因对陶渊明及其诗的偏爱，东坡一生写了许多“和陶诗”。他57岁知扬州时，写过《和陶饮酒二十首》<sup>(1) 1881</sup>。并在序文里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这番话透露出东坡好酒，饮酒易醉，类似好饮好醉的陶渊明。与友人共饮，人得其乐，己也得其乐。在这组和诗里，他说“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表达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自行挂印而去，归于田园，超脱于尘俗之外。而他入仕后官场浮沉，没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静穆，唯有“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的酒趣味可以和陶渊明媲美。

东坡“和陶诗”的创作高峰是在惠州和儋州。他到惠州的第二年即绍圣二年（1095）二

月十一日，酒足饭饱，昏然入睡，一觉醒来抄录了陶渊明《拟古九首》中的《东方有一士》诗，陶渊明诗里写有：“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东坡读了这首诗，就诗中的“东方一士”说道：“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sup>(2) 2115</sup>他对陶渊明的深刻理解以及自己与陶渊明心性的相通，正是和陶诗的基础。三月四日，东坡在惠州游白水山佛迹岩，沐浴浩歌，当晚睡醒后听到儿子苏过诵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于是写了《和归园田居六首》<sup>(1) 2104</sup>。并在引言中说：“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这话有点意味，表明东坡唱和陶诗起于广陵即扬州。《冷斋夜话》<sup>(6) 219</sup>记载：“东坡在惠州，尽和渊明诗。鲁直在黔南，闻之，作诗曰：‘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东坡说是要尽和陶渊明的诗，《冷斋夜话》说“尽和”，这在惠州时没有完成，延续到了儋州。而鲁直即山谷道人黄庭坚，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对东坡有很高的评价且不说，所谓的“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也是看到了他们的人生、性情和趣味。与东坡自认为与陶渊明趣味相投是一致的。

东坡在《和陶归园田居六首》<sup>(1) 2106</sup>其六里写道：

昔我在广陵，怅望柴桑陌。  
长吟《饮酒》诗，颇获一笑适。

… …

江山互隐见，出没为我役。  
斜川追渊明，东皋友王绩。

他对广陵往事的回忆，告诉人们他那时候就向往陶渊明而自觉不能及。向往的本质是希望自己能像陶渊明和初唐的“东皋子”王绩一样过放浪形骸、逍遥自然的生活。绍圣四年（1097）二月十四日东坡的惠州白鹤峰新居建成了，三年不见的长子苏迈带着儿子到了惠州，东坡欣然写了《和陶时运四首》<sup>(1) 2218</sup>。陶渊明的四言《时运》有序云：“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独游，欣慨交心。”这游暮春说用了孔子弟子子路、曾皙等人侍坐时曾皙表达的生活理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陶渊明说得很清楚，他所写的这一组诗既欣赏美景，又抒发人生的感慨，这其实是田园诗或山水诗的常态。东坡亦然。在《和陶时运四首》其三里说“自我幽独，倚门或挥”，

与陶渊明《时运》其三的“我爱其静，寤寐交挥”相似；东坡在其四又说“子孙远至，笑语纷如”，与陶渊明在其四沉溺于“花药分列，林竹翳如”不同，他因儿孙的到来喜形于色了，不像陶渊明怀喜悦仍显静穆。

东坡有和陶诗 124 首，其中在儋州写下的和陶诗有 57 首。东坡在儋州唱和陶渊明诗，保持着惠州时期和陶诗的风格，在走进陶渊明世界时，把自我融入陶诗中，然后借助诗歌唱和的再创作，从陶诗中走出来，让和陶诗深具自我的生活状态和情性，而不是对陶诗循规蹈矩式的模拟。简洁地说，东坡借陶诗之题和诗韵为诗。题出陶诗，韵出陶诗，语言的具体表现和意蕴则有所不同。主要是东坡自我的生活所之、性情所之，以及对生活的描述和感悟所致。

东坡在赴儋州渡海那一天，写下了《和陶止酒》<sup>(1) 2145</sup>诗，序称：“丁丑岁，予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乃和原韵，因以赠别，庶几真止矣。”陶渊明在《止酒》诗里说：“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足见他嗜酒有些痴迷。说完之后，表示从今以后真要戒酒了，“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而当时的东坡苦于痔疮复发，也意识到酒和痔疮的关系，说了“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决心戒酒：“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这是东坡渡海之际与弟弟苏辙的告别诗，而到儋州后，他最早写下的是《和陶还旧居》<sup>(1) 2250</sup>和《和陶连夜独饮二首并引》<sup>(1) 2252</sup>。

这时他刚到儋州，思念惠州白鹤山新居的儿孙和雷州的弟弟苏辙。前者诗序为“梦归惠州白鹤山居作”，既说思归，又说“不敢梦故山，恐兴坟墓悲”。于是想到“生世本暂寓，此身念念非”，难免有些伤感。后者诗序说：“吾谪海南，尽卖酒器以供衣食。独有一荷叶杯，工制美妙，留以自娱。”这留下的酒杯他在诗中还提到，称之为“伯雅君”。刚说要戒酒的他并不曾戒酒，居然还说“饮中八仙人，与我俱得仙”。这“饮中八仙人”即杜甫《酒中八仙歌》中提到的唐代贺知章、李白、张旭等八人，东坡把自己和他们相提并论，在表达对酒的喜爱时，寄托对苏辙的思念：“顾饮一杯酒，谁谓无往还。寄语海北人，今日为何年。”苏辙当时在海北的雷州。

在儋州，东坡最集中的和陶诗是《和陶拟古九首》与《和陶杂诗十一首》。他在《和陶

拟古九首》<sup>(1) 2260~2261</sup>中叙说了自我现实的景况，当时生存的环境恶劣，但他在这组诗里以旷达洒脱消解自己人生的艰难，展示出东坡淡泊中的坚强。其一写道：

有客叩我门，系马门前柳。  
庭空鸟雀散，门闭客立久。  
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  
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  
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  
坐谈杂今古，不答颜愈厚。  
问我何处来，我来无何有。

东坡说有客叩门之时，自己正在睡梦之中。他梦到与朋友畅饮，却被客人的叩门声惊醒，酒散而不及饮。想一想，既对不起梦中来访的客人，故有“梦觉两愧负”之说。在彼此的交谈中，东坡答客的“我来无何有”也许是自我的调侃，以“无何有”代指刚才失去的梦境。但“无何有”缘于庄子《逍遥游》的“无何有之乡”，是绝对自由的人生境地，这在前面也提到。于是说东坡仿佛不是身陷贬谪而有生活的悠然了。

“我来无何有”流露了东坡此时的情绪，他在其二里吟咏自我好酒亦好歌，视自己胜过“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和王戎。山涛和王戎在魏晋时一度好酒而放达，两人后来都入了仕途，做过吏部尚书等官，与“竹林”趣味渐远。东坡说“由来竹林人，不数涛与戎”，言外之意他把自己当作“竹林”中人了。他随后说“有酒从孟公，慎勿从扬雄”。孟公即西汉末年的陈遵。陈遵生性好客，宴饮时为留客常把客人的车辖扔到井中，让客人不能离去。而西汉末年的扬雄是难得的辞赋大家，但他曾为篡汉的王莽写了《剧秦美新》，品行有了污点。东坡这样说，有很明显的思想和行为趋向，他想有酒则饮的生活，却不愿改变自己的节操，流贬儋州，真切的感受是：“昔我未尝达，今者亦安穷。穷达不到处，我在阿堵中。”“阿堵”是六朝人的口语，即“这”。他这话说得很有意味，人生的穷达两极即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东坡审视自我从前不曾“达”即没有得志，这有些道理。他当年科考名满京师时，相传宋仁宗认为东坡有宰相之才，东坡不及施展，就因不赞同王安石变法而遭贬，此后流贬常在发生。他现在泰然“安穷”，平心静气地接受人生不得志，说儋州既不是人生失志之所，也不是人生腾达之所，在这里还想什么穷达之事呢？

不仅如此，东坡还在其三写到服鸟飞来停在自家座位的一角，“引吭伸两翅，太息意不舒”。这“服鸟”一作“鹏鸟”，是民间说的

猫头鹰，西汉初年贾谊因为权贵所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时，一天有鵩鸟飞到他家，当地风俗认为不祥，预兆主人会死去。贾谊为此写了有名的《鵩鸟赋》，在赋中感慨自己的人生，并说生若浮，死若休，鵩鸟飞来不吉祥也无所谓。东坡用这个典故表白自己的人生态度：“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猫头鹰是飞到他的房里，但人生如寄托，什么地方是自己的住所？一个轻巧的反问，似乎无处是他的房屋，无处又不是他的房屋。这猫头鹰想跟我在一起就在一起吧。“夜中闻长啸，月露荒榛芜。无问亦无答，吉凶两何如”。在这蛮荒之地，逢吉逢凶都不在意了。东坡就是这样调适着自己的心态。

这时候的东坡有“琼州别驾”的虚衔，不是一个纯粹的平民。他把自己置身于平民中，做一个随遇而安的阅世者。这时候来看海南，心态变了，眼光也变了，正像其四写的“稍喜海南州，自古无战场。奇峰望黎母，何异嵩与邛”。这“黎母”是海南的黎母山，“嵩”“邛”是河南的嵩山和邛山，他这时视海南的黎母山如同河南的嵩山和邛山，心气平和，不再有身居海南的死亡恐惧。随后他在其七里讲了一个养鸡老人的故事，老人鹤发苍颜，世住儋州，传到东坡认识的第六代孙也已经须发尽白。东坡说这家人就是“阅世者”，他们见过晚唐被贬到崖州的宰相李德裕、北宋被贬到崖州的中书侍郎、平章事卢多逊和司空丁谓。他很感慨，老人一家所阅之世那世事就像东流水一样，人世无比沧桑。东坡在黄州词《念奴娇》（大江东去）里咏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时的东坡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实际上也是一个阅世者。他这个阅世者表示“我师吴季子，守节到晚周”。吴季子是春秋时吴国的公子季札，他信奉周朝礼乐而反对诸侯纷争，主张贤者隐世。东坡说以他为榜样，似乎是在表示自己也要归隐，心事的沉重使向来旷达的他不够旷达了。

东坡的《和陶杂诗十一首》<sup>〔1〕2272~2279</sup>稍晚于《和陶拟古九首》。在这组诗里，他的心境变得更加恬静。其一写道：

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尘。  
微风动众窍，谁信我忘身。  
一笑问儿子，与汝定何亲。  
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  
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  
此道固应尔，不当怨尤人。

这是一个傍晚，夕阳余辉穿过门缝照进来，显现出空中粉尘。微风轻轻吹着许多的洞穴，发出嗡嗡的声音。这话没有说尽，实际上“风

动众窍”出自《庄子·齐物论》，那风动众窍是天籁之音，别有美感。于是乎我“忘身”也就是忘却了自我，而忘身的我与儿子你有什么关系？这犹若戏言，正是还没“忘身”的表现。然后他把贬居海南的孤独视为人生的命运，既然如此，有多少不幸不能够排解呢？

东坡的和陶诗，一般不以陶渊明诗的意旨为归宿，一首诗是这样，一组诗也是这样。这时候的东坡，冷峻地审视历史和现实人生，在诗中贯穿的是自我。他在这组诗的其二中从眼前的自然景观中得到感悟，写道：

室空无可照，火灭膏自冷。  
披衣起视夜，海阔河汉永。  
西窗半明月，散乱梧楸影。  
良辰不可系，逝水无留骋。  
我苗期后枯，持此一念静。

虽是夜半，他看着窗外的天空以及散乱的梧桐、楸树之影，想到的是时光、流水的不停歇和生命的短暂，期待自我生命的长久，为此应该静静地养息。与此相应，东坡在儋州写下的《和陶东方有一士》<sup>〔1〕2266~2267</sup>，其中说自己“屡从渊明游，云山出毫端。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他说的“无弦琴”指的是陶渊明的“无弦琴”。东坡对此有过解说：“旧说渊明不知音，蓄无弦琴以寄意，曰：‘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此妄也。渊明自云‘和以七弦’岂得不知音，当是有琴而弦弊坏，不复更张，但抚弄以寄意，如此为得其真。”（《渊明无弦琴》）<sup>〔2〕2043</sup>他这样说使本有些奇巧的“无弦琴”之说变得实在而乏味，在与陶渊明的神交中获得超越。如《和陶和刘柴桑》<sup>〔1〕2311</sup>中说的：“万劫互起灭，百年一踟蹰。”“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当他清醒地认识到百年只是一瞬的时候，只是没有想到老来变得辛苦，但在竹屋低窗的环境中，一饱与安眠就成了生活的大事，家徒四壁且无妻相伴，也让他满是笑容。

而在《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三里，东坡说世上的“真人”和“俗子”是不同的，这“真人”最初是庄子笔下亦真亦幻的仙人，魏晋时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真人成为道教仰慕的仙人。东坡表面上说仙人和俗人不同，实际上以“仙人”指超尘脱俗者。所以他讲了西汉张良的故事，说留侯张良辟谷，修炼以求仙，有人劝他进食，哪里是懂得张良呢？而“俗人”则是贪恋权势的人，他说和张良同时的萧何，官至相国，因劝刘邦把上林苑的土地给一部分百姓耕种，刘邦生气地把他关进监狱。萧何遭赦免后，赤着脚向刘邦道谢。东坡说：“我非徒跣相，终老怀未央。”这“未央”是西汉的

未央宫，刘邦大会群臣之所。东坡讲这两个人的故事，表明自己不再想政治上的进取了。这不单是他与萧何有不同的人生取向，而且还在于他看到了世事的险恶。

在这首诗里，东坡还提到汉高祖刘邦时的曹参和韩信。曹参跟随刘邦经历了70余战，攻城略地，刘邦认为他像只猎狗，有“狗功”，不及萧何能发现猎物在什么地方，有“人功”，论功行赏，萧何居先。东坡说这不公平。还有韩信，帮刘邦打了天下，最后却应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的老话，被杀害了。于是东坡说“哀哉亦何羞，世路皆羊肠”，他有什么必要混迹官场去走“羊肠”小道，弄不好落个灭亡的悲惨结局。东坡在这里说的是历史，他借鉴历史选择自我人生的道路，看似明智，可他自己晚年又遭贬，让人怎么言说呢？

东坡的《和陶杂诗十一首》还咏了其他历史人物，如其四咏司马相如、其五咏曹孟德、其六咏老聃、关尹喜、其九咏庄子寓言中的南荣等，他借助这些人物讲述从前的故事，自然也会抒发一些自我的情感。

东坡以和陶诗表现自己的生活是很自然的事，而他最初的和陶诗个人情怀较重实出于离别未久，对亲人的念想。就他这个善于把自己融入当地生活、当地百姓中的人来说，和陶诗也会表现儋州百姓的生活，并因儋州百姓的生活产生的想法，也就有了相应的思想和情绪的表达。他的《和陶示周掾祖谢》<sup>(1) 2253~2254</sup> 诗是游儋州古学舍之作，他在开篇说“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这“渊明欣”说的是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自述的“好读书”。然而他看了儋州的学舍之后，深感学舍有古风，但“先生饌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饥坐谈道，嗟我亦晚闻”的现状，在他看来不当如此却竟然如此，难免有些伤感。他的《和陶劝农六首并引》<sup>(1) 2254~2257</sup> 则是忧农之作。其序云：“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予既哀之，乃和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在这组四言诗里，他说了儋州百姓贫困的六个原因：一是“天祸尔土，不麦不稷”，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海南只能生产稻米以及薯芋，不能种植麦稷；二是“播厥熏木，腐余是穡”，耕种方法落后，放火烧荒以后，让植物的灰烬作为肥料；三是“贪夫污吏，鹰鹯狼食”，当地的贪官污吏像恶鹰猛狼一样盘剥百姓；四是“惊磨朝射，猛豨夜逐”，当地人好猎，不能沉下心来从事农业生产；五是“父兄搢挺，以扶游手”的“游手”

即一些人的游手好闲，不以农耕为务；六是“逸谚戏侮，博弈顽鄙”，一些人放纵不羁，赌博顽劣。他很希望改变海南这些落后面貌，还抄写过柳宗元的《牛赋》，想革海南“以巫为医，以牛为药”的陋习；抄写过杜甫的《负薪行》，想革海南男女分工不均的陋习。只说当时海南儋州实在是穷困，他在《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里说到儋州的黎子云兄弟，表现了亲近和友谊，但黎子云兄弟“茅茨破不补”“菜肥人愈瘦”的境况也让他感叹不已，尽管他表示如果能学黎民的方言，他愿意“化为黎母民”。

儋州荒凉贫乏、东坡无所事事的生活境况与其平淡的心理状态交织在一起，导致陶渊明的诗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灵感，让他心灵有了栖身之所。同时，这一时期的和陶诗的创作全然是东坡的生活方式，发乎性情，止乎平和。

### 三、“和陶诗”的陶味与东坡味

东坡以“和陶诗”跨越时空，与陶渊明心灵相通。但需要看到的是，陶渊明生活在东晋，卒于427年；东坡生活在北宋中叶，生于1037年。两人在时间相距六百余年，生活的空间也相当不同。且在人生的旅途中，陶渊明只有做地方官的经历，而东坡长期担任京官或地方官，有诸多的官员朋友。他虽然在被贬黄州、惠州、儋州时都有阶段性的田园生活，但他在田园的时候，仍然是官宦之身，不可能真有陶渊明那样的田园趣味。他借重陶渊明，并在“和陶诗”里顽强地表现自我的生活状态和感受，使他“和陶诗”自然不同于陶渊明的原诗。

这里且不说东坡身处儋州之外的“和陶诗”，只就他儋州的“和陶诗”论说，不妨从他的《和陶杂诗十一首》中选两首作一点比较。东坡《和陶杂诗十一首》<sup>(1) 2272~2279</sup> 其四：

相如偶一官，嗤鄙蜀父老。  
不记犢鼻时，涤器混佣保。  
著书曾几何，渴肺灰土燥。  
琴台有遗魄，笑我归不早。  
作书遗故人，皎皎我怀抱。  
余生幸无愧，可与君平道。

其五：

孟德黠老狐，奸言噬鸿豫。  
哀哉丧乱世，泉鸢各腾翥。  
逝者知几人，文举独不去。  
天方斫汉室，岂计一郗虑。  
昆虫正相啗，乃比蔣相如。  
我知公所坐，大名难久住。  
细德方险微，岂有容公处。  
既往不可悔，庶为来者惧。

陶渊明原诗即《杂诗十二首》其四：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  
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  
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  
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  
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  
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

其五：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  
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  
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  
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  
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  
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从这两首诗来说，东坡步陶诗之韵，和陶以学陶，并没有达不到陶诗的境界而有纯粹的“陶味”。陶渊明“适性”型的诗歌创作者，他的“诗歌难学，关键不是语言风格，而是那真淳率直的心性以及名利之外的平淡”<sup>(7) 239</sup>。东坡的真淳率直可与陶渊明相颉颃，甚至他的率直胜过陶渊明，敢于不畏官场险恶而深陷流贬之中，但他处世的平淡不及陶渊明，没有像陶渊明那样果断地舍弃官场，还自己一个自然之身，居于田园做一个平凡人。东坡的田园诗不及陶渊明，他自认为也不及，但东坡的才学远在陶渊明之上，何况东坡所处的是一个重才学的时代，诗人兼学问家或者是学问家兼诗人是很常见的现象。具体到东坡，他既是才子型的诗人，也是学问型的诗人，不像陶渊明真正地独居田园，疏离当时的玄言诗坛做一个另类的诗人，而是把自己置于诗坛之上，做一个雄浑高亢的歌手。

所以看两人的这四首诗，陶渊明的诗要比东坡的诗本色得多。陶诗其四说自己不像别人有四海之志，所希求的是不知老之将至的家庭生活，儿孙绕膝，酒歌终日，不屑于像当世的权势之士那样彼此斗争，冰炭不容。关键在于他看透了人生的终极道路，人终究会死，死后一抔黄土，归于丘垤，所求的名利有何意义？东坡在唱和诗里讲述了西汉司马相如的故事。司马相如因为给汉武帝献了《天子游猎赋》被封为郎，后出使西南，诘难蜀地的父老乡亲，歌颂汉武帝创业垂统，兼容并包。东坡说司马相如不记得贫困时在临邛穿着短裤衩卖酒的日子，那时他和佣人有什么区别呢？还有，司马相如善赋，因患消渴病而著述不多。不过，成都的琴台留下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传情的遗迹，而我东坡却不能像他早归家园。不过，我

平生无愧，像在成都为人占卜的严君平一样，还是为社会做了一点小事。相较而言，陶渊明的直抒人生情怀和东坡借司马相如的故事来说人生，各自诗中表现的人生境界和情趣不一。陶渊明归于自然，在享受天伦之乐中把世俗的名利谈化了，并以死亡作考量，鄙薄权利的争夺者。而东坡说历史人物，借对历史人物的评述留下他的影子，比照之下，让自己仍然处在世俗之中。

再说陶渊明《杂诗十二首》的其五。陶渊明在诗中回忆少壮时生活的安逸和愉快，那时的他有兼济天下之志，欲大展鹏程。随着岁月流逝，四海之志消磨了，本当欢乐却多忧愁。想到气力渐衰，时光飞驰，人生几何？不知道人生的小船突然会停在哪里，最要紧的是珍惜人生，故说“古人怀寸阴，念此使人惧”。东坡则在和诗其五中讲东汉末年曹孟德即曹操的故事。他说世道混乱，奸贼与贤者各骋其才，而贤者多避难；曹操奸猾，挑拨郗虑即郗鸿豫和孔文举即孔融之间的关系，孔融知道前途多险却留下来支撑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但天意灭汉，哪里只有一个郗虑那样的小人呢？可恨郗虑还被比作战国时的蔺相如。东坡说，他理解孔融，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不为奸邪所容，最后被杀是必然的。“既往不可悔，庶为来者惧”，希望后人从孔融身上吸取教训。东坡这里讲的曹操和孔融的故事，涉及对二人的评价，评价本身尽可见人见智。而他这番评论看起来更像是牢骚之言。他为孔融鸣不平，也借孔融自说。“大名难久住”，对他来说不也是一样的吗？这样委婉的表达和陶渊明在诗中直抒己志有很大的差异，陶渊明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所思所想，把过去和现在勾连起来，在平静中蕴含的人生忧愁是从生命本身生发出来的，与复杂的社会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不像东坡，让历史回顾消解自我现实的情绪。

上述以史寓情，是东坡儋州“和陶诗”的重要特点，或说是他“和陶诗”东坡味所在。陶渊明也有咏史的诗，最典型的是《咏三良》《咏荆轲》。如后者，他重在讲述荆轲的故事：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故事从战国时燕太子丹招募刺客欲刺杀秦王嬴政开始写起，中有易水送别，再到图穷匕首现，荆轲刺杀失败。最后陶渊明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抒发了对荆轲的怀念。而东坡引史入诗时，史中有情，诗中还有理，并通过叙议并举或夹叙夹议来体现，是宋人为诗好理的反映。

不仅如此，在宋人的诗歌创作中，东坡时代以学问为诗是一时风尚。虽说当时以学问为诗最具影响的是苏门弟子黄庭坚，并以“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创作理论以及“江西诗派”影响深远。东坡以学问为诗也是常事，所以他有的和陶诗学问味甚浓，如《和陶始经曲阿》。陶渊明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是这样写的：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  
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  
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  
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  
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  
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陶渊明在这首诗里述说自己成人后的贫困生活与琴书趣味，并含蓄地表白一度疏离田园而进入仕途。虽说终究归于田园，但想一想心有愧意，即他说的“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好在迷途知返，“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班生庐”是班固在《幽通赋》里说的“仁庐”，是“穷则独善”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这首诗用典，如最后一句的班生庐刚提到，还有“凭化迁”的“化迁”出自西晋陆机的《遨游出西城》诗中的“迁化有常然，盛衰自相袭”。而东坡的《和陶始经曲阿》<sup>〔1〕2355</sup>写道：

虞人非其招，欲往畏简书。  
穆生责醴酒，先见我不如。  
江左古弱国，强臣擅天衢。  
渊明堕诗酒，遂与功名疏。  
我生值良时，朱金义当纡。  
天命适如此，幸收废弃余。  
独有愧此翁，大名难久居。  
不思牺牛龟，兼取熊掌鱼。

北郊有大赉，南冠解囚拘。  
眷言罗浮下，白鹤返故庐。

这首诗用典相当密集，开篇的“虞人”句，用了《孟子·万章下》的“以大夫之旌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见他最初听说大赦消息时内心的惶恐犹豫；“穆生”句，用了西汉楚元王不为鲁穆生设礼酒的故事，穆生感到王意已怠，故请辞去，东坡说自己没有穆生这样的先见之明；“江左”句用东晋王朝的故事，以东晋国势衰微、强臣擅权暗喻他出仕前北宋的社会状态；“朱金”句用《杨子》的“使我纡朱怀金，其乐未可量也”，说自己本当能够实现人生理想；“不思牺牛龟，兼取熊掌鱼”用庄子《列御寇》的牺牛、《外物》的“神龟”和孟子《告子》的鱼和熊掌的故事，表示不像庄子能够舍利而求全身避祸，也不像孟子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舍鱼而求熊掌，而说自己是兼取二者，欲望太大了；“南冠”句用《左传·成公九年》钟仪的故事，说自己身为贬官，此时终于遇赦，得到解脱了。最后说遇赦后希望回到惠州的白鹤山，在那儿与家人团聚，安度晚年。

东坡这首诗大量用典以诉说自己的人生抉择，和陶渊明原诗的风格有很大的差异，而与“江西诗派”的学问之诗相近。我在拙著《唐宋诗风流别史》的“江西诗风”一章中专门谈到江西诗派以学问为诗的问题，举了好几个例子，其中有黄庭坚的咏物诗《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不妨引在这里，作一点比较。黄诗写道：

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  
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  
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  
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

钱穆父名钱勰，杭州人，曾任中书舍人。他出使高丽的时候，得到一支猩猩毛笔而写了一首诗。黄庭坚唱和了三首。这是其中的一首，另两首题为《戏咏猩猩毛笔二首》，前一首赠钱穆，后一首赠苏东坡。这首诗咏笔，以典故的有机组合，讲述了猩猩毛笔的故事。猩猩好酒，唐代裴炎取《华阳国志》和《水经注》中的猩猩故事，作《猩猩说》。说猩猩好酒及屐，饮酒辄醉，然后穿屐而行，故在山谷间为人捕获。黄庭坚从这里切入，化用《礼记·曲礼》的“猩猩能言，不离禽兽”和《易经》的“机事不密则害成”成“能言机事疏”一句。随后用《晋书·阮孚传》的阮孚叹“未知一生能著几两屐”，《庄子·天下》的“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汲冢周书》的“王会”，《孟子·尽

心》的“杨子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等典故，婉转地告诉人们它的功用和贡献，间接地说钱穆父用这支猩猩毛笔会建立功勋。黄庭坚以学问入诗，有意酿造诗歌的韵味娱情怡性，不同于东坡《和陶始经曲阿》用典叙说自己的人生。但在以学问为诗这一点上，两首诗的风格是很相近的。

不过，东坡的“和陶诗”还有一些不以史寓情说理、不以用典抒情的，而以叙事说理、以叙事兼及抒情，这在表现形式和风格上与陶渊明的原诗更接近，也就是说更具有陶味。陶诗偏于叙事，也常叙事又说理，东坡和陶诗叙事亦说理与之相类。如东坡和陶的三送张中诗，即《和陶与殷晋安别》<sup>(1) 2321</sup>“送昌化军使张中”、《和陶王抚军座送客》<sup>(1) 2326</sup>“再送张中”、《和陶答庞参军》<sup>(1) 2326</sup>“三送张中”。一送张中诗里说“暂聚水上萍，忽散风中云。恐无再见日，笑谈来生因”，尽管想到的是人生离别，并没有特别的悲戚，却情理俱存。再送张中诗里的“汝去莫相怜，我生本无依。相从大块中，几合几分违”。说在天地之间，人生离合是常事，何况“我生本无依”呢？诗中说理的成份依然很重。

东坡刚到儋州时不免诉苦，难免有情绪的波动，但他在和陶诗中总易趋于宁静平和。如他在《和陶怨诗示庞邓》<sup>(1) 2271</sup>中称道陶渊明“当欢有余乐，在戚亦颓然。渊明得此理，安处故有年。”即乐则乐、悲则悲，一任自然。陶渊明通透领悟了人生乐于归田园而易静穆。东坡身陷官场，是他自己说的“我昔堕轩冕”“困来卧重裯”，那时享受荣华“忧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有意思的是，此时东坡身在破房子里反让他这样的宁静，连夜来的风雨声都没能让他从睡眠中醒来。于是，他对没有早如此有点悔意，说道：“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因事而议论自我的人生或对人生的思考，东坡和陶渊明一样。

这里想说说东坡的《和陶戴主簿》。陶渊明49岁时写了《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诗中说时光倏忽，往复无穷，人生于世，终有完结。然后他再发议论：“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窞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他仿佛面临生死一仍泰然，感觉人生既然如此，“居常”以等待死亡的到来也就可以了。这“居常”说得隐讳一点，其实是安贫乐道。这是“曲肱”告诉人们的。“曲肱”展开说，是“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sup>(8) 143</sup>。于是陶渊明确说，时运的变化有平坦和险阻，只要放纵性情，就无所谓穷

通。如果认识到这一点，自然也不必上华山、嵩山求仙了。

东坡的《和陶戴主簿》<sup>(1) 2317</sup>不像陶渊明这样讲人生的哲理，而是直面在儋州的生活。诗写得很畅快：

海南无冬夏，安知岁将穷。  
时时小摇落，荣悴俯仰中。  
上天信包荒，佳植无由丰。  
锄耰代肃杀，有择非霜风。  
手栽兰与菊，侑我清宴终。  
撷芳眼已明，饮酒腹尚冲。  
草去土自隤，井深墙愈隆。  
勿笑一亩园，蚁垤齐衡嵩。

海南季节的不分明是自然的现象，他目睹万物变化，叙写自我的耕种辛劳和饮酒佐欢，全然是田园生活的享受。而诗的最后似乎不经意说出的“勿笑一亩园，蚁垤齐衡嵩”有一点深意。蚂蚁筑起的小土堆和衡山、嵩山是一样高的，其实是庄子万物齐同思想的另一种表述。不过他真正要说明的是，人生终归于虚无，卑微与高贵有什么不同呢？他的《和陶郭主簿二首》也是如此。诗的小引说：“清明日，闻过诵书，声节闲美。感念少时，怅焉追怀先君宫师之遗意，且念淮、德二幼孙，无以自遣，乃和渊明此二篇，随意所寓，无复伦次也。”他这两首诗不像陶的原诗从田园风光中生发出人生的感慨，但在叙事而及的人生感慨中，率真的风格相近。如其一说：“今日复何日，高槐布初荫。良辰非虚名，清和盈我襟。孺子卷书坐，诵书如鼓琴。”只是他有时引典于率真的表达中，如其二的“诵我先君诗，肝肺为澄澈。犹为鸣鹤和，未作获麟绝。愿因骑鲸李，追此御风列”。诗中的“鸣鹤”用了《周易·中孚》的“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获麟”用了《左传·哀公十四年》，孔子“绝笔于获麟”的故事；“骑鲸李”用了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中的“若逢李白骑鲸鱼，道甫问信今何如”；“御风列”用了庄子《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诸如此类，诗的陶味与苏味就是这样交织在一起。

陶渊明还有一首《游斜川诗》，是义熙十年（414）写的。他在诗的序言中说，那年的正月初五，天气爽朗，风物闲美，和几位邻居一道游斜川，见鱼跃鸥飞，“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而写下了这首诗。诗很好读：

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  
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  
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  
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  
迴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

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  
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  
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  
中觴纵遥情，忘彼千载忧。  
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陶渊明在诗中说自己开年就是50岁了，人生已进入晚年。想到这一点，邀了几个邻居朋友出游。在斜川旁依次坐下，鱼儿在缓缓流动的水中穿梭，鸟儿在山谷里高声鸣叫。他看着远方浩淼的湖泊和独立无匹的曾丘（障山），酒兴更浓，放纵地及时行乐，把“吾生行归休”的念头抛到脑后了。再看东坡的《和陶游斜川》<sup>(1) 2318</sup>，副标题为“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东坡被贬儋州，随行陪侍的只有小儿子苏过，后人称“小坡”《宋史》为东坡立传，后附有“苏过传”，以见他深受父亲东坡的影响。在儋州，东坡与儿子苏过出游，这时不像陶渊明有三朋四友那样热闹。他的诗写道：

谪居澹无事，何异老且休。  
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  
春江禄未波，人卧船自流。  
我本无所适，泛泛随鸣鸥。  
中流遇洑洄，舍舟步层丘。  
有口可与饮，何必逢我俦。  
过子诗似翁，我唱而辄酬。  
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  
问点尔何如，不与圣同忧。  
问翁何所笑，不为由与求。

东坡在儋州的闲适和陶渊明不全相似，毕竟身为贬官，不像陶渊明退身自隐田园。但他这首诗张扬的自我快乐不亚于陶渊明。就年龄来说，他的确是过了“靖节年”，比陶渊明那时大了十多岁，山水之游的兴趣仍然很浓。先是船行水上，任船随鸣鸥，类似于他当年游于黄州赤壁之下的“纵一苇之所如”（《赤壁赋》）<sup>(2) 6</sup>。然后登上重叠的山峦，与儿子苏过一道，有酒则饮，有诗则和。这样自在的日子可谓是对陶渊明“中觴纵遥情，忘彼千载忧”的呼应。回想他在扬州的《和陶饮酒二十首》<sup>(1) 1883</sup>其一说：“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这时东坡已进入人生晚年，对世事不再那样纠缠。他禁不住问陶渊明，你有我这样的快乐吗？暗示自己的快乐为陶渊明所不及。诗最后是他与苏过的简单答问或说是他的自问自答。东坡以孔子问曾皙的口吻来问苏过，你将过怎样的生活呢？苏过回答的“不与圣同忧”，出自《周易·系辞上》的“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表明自己只想沉浸于自然中，与万物和谐相处而不胸怀天下。东坡听

罢，笑着说“不为由与求”。其中的“由”即子路答孔子问志向时，他说自己可以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求”即冉有说自己可以治理方圆六七十里或者是五六十里的国家。东坡说“不为由与求”在本质上也是不与圣人同忧，不以天下为己任。这时，东坡的心与陶渊明靠得更近了。

尽管东坡曾说“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早知农圃乐，岂有非意干”（《和陶西田获早稻》）<sup>(1) 2315</sup>，但他和陶渊明的思想有别，从上述东坡的和陶诗中可以看出。同时需要提到的是，陶渊明在田园诗外，还有一组很有玄言意味的哲理诗，这就是他的《形影神》三首：

《形赠影》《影答形》和《神释》。陶渊明在小序中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形影神》）<sup>(5)</sup>  
<sup>35</sup>他把这组诗的创作用心说得很清楚，并在诗中说“形”之苦在于“得酒莫苟辞”（《形赠影》）<sup>(5) 36</sup>的以酒消忧，影之苦在于以酒消忧则苦身，殊不知身灭形亦尽，何不立善以传名？

《神释》则说日醉促龄，立善谁誉，人生最应该做的就是“委运”即顺应天命，“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就是所谓的“神辨自然”，把人生全然放开了，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了。

东坡和陶的《形影神》三首据说是他抄了陶渊明的原诗送给苏过，随即步陶诗的韵而写的。在《和陶形赠影》<sup>(1) 2306</sup>里，他说天地运行，日月有常，形与影，相依相成，忽然乘物化，生灭则相俱。他做了一个梦，说“形”有哀乐“影”也有哀乐，“梦时我方寂，偃然无所思。胡为有哀乐，辄复随涟湔。”而在《和陶影答形》<sup>(1) 2307</sup>中，影之随形，被他描写得非常形象，语言也很诙谐：“我依月灯出，相肖两奇绝。妍媸本在君，我岂相媚悦。君如火上烟，火尽君乃别。我如镜中像，镜坏我不灭。”但他归结为影的哀乐，是形的哀乐所致，“无心但因物，万变岂有竭”？这是很自然的。不过，“形”与“影”的醉与醒都是梦，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东坡在其中暗寓了自己的人生理念。

随后东坡在《和陶神释》<sup>(1) 2307</sup>中说“形”非金石，“影”不可能永远托附于“形”，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要信成仙之道，也不要信佛教的来生，“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最好是追随陶渊明，在酒乡中度日。不过酒醉酒醒，还是有止境，逃不脱人生的悲剧命运。最好是没了形体，那人生的好坏都不存在了。而

且“既无负载劳，又无寇攘惧”，完全超脱于尘俗之上。同时，他说到孔子：“仲尼晚乃觉，天下何思虑。”仲尼是孔子的字，他56岁时离开鲁国游说诸侯，70岁时回到鲁国，读《易》而“韦编三绝”。“仲尼晚乃觉”正是说他读《易》的事。“天下何所虑”则出自《周易·系辞》的“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东坡用这个典故说明人生还是在于自然。

这一组诗表现了东坡思想的复杂性，他是一个怀有儒家、道家、道教和佛教思想的人，虽说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道、佛思想此起彼伏，陶渊明的思想就比他单纯得多了。陶渊明总在想着生命的自然、生活的自然、性情的自然，东坡则在日趋平和的心态之下，思想则在儒、道、佛之间徘徊。

东坡在儋州写下了大量的和陶诗，这是他谪居黄州、惠州时诗文创作的延续，却也是他一生的好尚。他好陶渊明的诗，也好陶渊明的率真性情与隐居田园的生活，但他做不了陶渊明，只是权将自己的谪居当隐居，从中有和陶诗之乐，也有自我生活之乐。当然，东坡的和陶诗的陶味和苏味兼备，东坡在和陶诗中习惯述史、用典，固然是他张扬学问的方式，但诚如陈善在《扞虱新话》中说的，东坡和陶诗追求创作的工巧也伤于工巧，不及陶渊明诗的自然。之所以会如此，既与东坡深谙学问且在重学问的社会氛围中相关，又与东坡自我的性情有联系。他好以诗和陶，是出自对陶渊明的仰慕和性情相投；而他在和陶诗中排解自己的情绪，也从中获得新的人生快乐，在这样的時候却又只有自我而无陶渊明。清代王文诰曾把屈原和东坡相较，说道：“灵均之贬，全以怨立言，公之贬，全以乐立意。”<sup>〔9〕15</sup>这话虽不尽然，但东坡在儋州，初以为苦、后以为乐则是真的，他的和陶诗也是一个说明。同时，东坡毕竟和陶渊明有不同的生活际遇，导致他性情的坚执和变异必然使其和陶诗的陶味与苏味并存。

东坡晚年愈趋平和，诗歌创作更生活化也更显琐碎，“和陶诗”即是体现之一。不过，性情却依然故我。他在儋州填过一首词，题为《千秋岁》（岛边天外）<sup>〔3〕740</sup>，词道：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觐，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槎且恁浮于海。

他对自己的人生有太多的感伤，感伤过后却是“旧学终难改”的表白以及“吾已矣，乘

槎且恁浮于海”的决绝。

最后想说的是，今人杨松冀说：“经过苏轼对陶渊明人品和诗风的大力揄扬，陶渊明的形象才真正地在思想史和诗歌史上树立起来。”<sup>〔10〕15</sup>

苏东坡虽然尽和陶诗，但用诗歌大力揄扬陶渊明的，在东坡之前有盛唐诗人李白。李白常在诗歌里吟咏陶渊明，如《赠崔秋浦三首》其一的“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门前五杨柳，井上二梧桐”；《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的“梦见五柳枝，已堪挂马鞭。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李白对陶渊明充满了敬慕的情怀，也是以陶渊明作为自己人生榜样的。当然如果以和陶诗来看对陶渊明的高度揄扬，在古代诗歌史上唯有苏东坡，无人能出其右。

### 注释

〔1〕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2〕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3〕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 高秀芳、陈宏天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5〕 陶渊明《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6〕 颜中其《苏东坡轶事汇编》，岳麓书社1984年版。

〔7〕 阮忠《中古诗人群体及其诗风的演化》，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

〔8〕 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论语》，中华书局1954年版。

〔9〕 王文诰《苏文忠诗编注集成总案·苏海识余卷一》，巴蜀书社1985年版。

〔10〕 杨松冀《苏轼和陶诗编年校注·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阮忠，海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 “尚意”宗师苏轼

王万洪

**内容提要** 苏轼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更是一位引领时代风尚的书法理论大师。本文从书法史上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传统定论出发，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简要分析，特别对宋人尚意之说，从宋代书法发展历史的角度展开了深入讨论，指出：尚意说源起的根本，是宋代文人书法之蔚然成风；主张意趣、天赋、才情与讨论创作思维是尚意书论的主要内容；佛道两家的哲学精神对此深有浸染；苏轼作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宋代尚意书论形成的断代宗师。

**关键词** 宋代书法 尚意 苏轼

## 引言

正史中的苏轼，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更谈不上是书法家<sup>〔1〕</sup>。然而，后人眼中的苏轼，则主要是一位文学家、书法家，甚至大才：诗词文章无所不能，棋琴书画无所不通，烹饪医药无所不精，为官建设无所不成。苏轼非常人哉！

生逢北宋晚期党争政治的苏轼，实际上一生仕宦过程的多数时间是在失意、坎坷乃至颠沛、流离中度过的。苏轼先后经历绍述之争<sup>〔2〕</sup>、元符党籍<sup>〔3〕</sup>、元祐党籍<sup>〔4〕</sup>等集团性质的大型政治斗争<sup>〔5〕</sup>和洛蜀之争<sup>〔6〕</sup>、乌台诗案<sup>〔7〕</sup>等中小规模的政治斗争，主要是以抗争者、失败者、沉默者、被迫害者的形象生活于政治舞台，数次在政治生活中遭遇险境，几次大祸临头：这表明后人眼中的“千古第一文人”苏轼，实际上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苏轼作为后人眼中的文学家、书法家、绘画家、音乐家、美食家和茶茗、医药、旅游爱好者，他的真实政治智慧是有限的，而不是无穷的，并非实际能担大任的宰辅之才。

但上述不足放在书法艺术的领域之内，它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政治生涯的挫折太多，苏轼仕途已绝，一方面沉痛苦闷，无以遣怀，唯作诗文，辅以书画，作为在艺术人生中排遣苦闷的方法。以乌台诗案为转折点，苏轼积极入世、立德立功的情怀被严重打击，这为

他节约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赢得了一个好的心态，恰好有利于艺术创作和理论探索。另一方面，苏轼参禅悟道、悠游山林、崇尚隐逸，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开始逐渐与儒家入世思想并行、融合，其中又以道家情怀为主导，这是苏轼晚期书画艺术与理论见解超越前期的主要原因。

他以过人天赋与贯通诗文、书画、音乐的综合修养和罕见的创造力、想象力、艺术传达力，使得自身书法水平不断更新变态，最终成为一代大家；他敢于否认陈说、勇于创新理论、不断探索实践，使得宋代书法理论建构起属于自身的独特批评话语体系和审美鉴赏体系；他以师友交流的方式突破了传统学校、应试、馆阁之学和家族相传的书法教育方式，培养了大批书法人才，形成独特的苏门弟子群现象；他以高尚的人品、卓越的才华、坎坷的遭遇、豁达的心态、博学的修养、丰富的成果，成为宋代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家。凡此种种，都在证明苏轼书法成就的卓越。

因此，苏轼书法艺术的卓越成就不是来自顺境，而是来自逆境。他的书法理论见解的变化和创新，与创作紧密联系，也是在政治生涯挫败之后不断新变，最终达到时代最强音地位的。

在2013年10月于成都武侯祠举行的第二届“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上，笔者提交了《苏轼草书法理论辨正》一文，对苏轼独标天赋意趣而忽视物象本源的笔法起源论进行了辩证地分析。近年来，不断整理、校注并深入思考苏轼的书法理论，对以苏轼为代表的“尚意”诸说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现在写在下面，恳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 一、尚意：宋代书法发展的必然选择

明代王澐《翰墨指南》提出“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的意见，经后人推演、论证、研究，在书法理论史上就有了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定论。比如清人梁巘《评书帖》就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

意。”周星莲《临池管见》则以为：“晋人取韵，唐人取法，宋人取意，人皆知之。”冯班《钝吟书要》又将晋人尚韵称为用理，说：“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刘熙载《艺概·书概》则又提出“晋人尚意，唐人尚法”的不同看法，梁巘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元明尚态”（《评书帖》）的新论。在此基础上，周星莲以为：“吾谓晋书如仙，唐书如圣，宋书如豪杰。学书者从此分门别户，落笔时方有宗旨。”梁巘则论述得更具体准确：“晋书神韵潇洒，而流弊则轻散。唐贤矫之以法，整齐严谨，而流弊则拘苦。宋人思脱唐习，造意运笔，纵横有余，而韵不及晋，法不逮唐。元、明厌宋之放轶，尚慕晋轨。”那么，尚韵、尚法、尚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 （一）晋人尚韵

详究前人所论，所谓“晋人尚韵”，即是在魏、晋、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讲究风度韵致。魏晋时代，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上开始了文学的自觉，历时三百余年；与之相对应，魏晋时代也拉开了书法艺术自觉的帷幕。晋代开国不久，内乱外患并起，社会动荡不安，但在书法方面，并不因为社会的动荡而走向衰落，相反，出人意料地高度发展。由隶书衍生出来的楷、行、草书，通过众多书家的努力实践而日臻成熟，并被推向艺术的高峰。从此，书法的审美功能已盖过实用功能，大大增加了艺术创造的自觉性，成为人们刻意追求的审美载体和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

晋书尚韵的风尚广泛地联结着那个时代的艺术风格、生命情调和文化精神，特别是哲学、文学和人格理想。晋代是一个战乱、杀戮的时代，士大夫苦闷、矛盾、思索，却又充满激情和浓郁的生命色彩。这时士大夫的精神是思辨探索的，也是自由奔放的。原来占统治地位的经学开始走向衰败，受到冷落，继之而起的是以清谈、议论、争辩为标志的玄学。表面上，士大夫阶层消极、悲观、归隐、超脱、逃避现实，宣讲“以无为为本”，从古代“老庄”隐逸、逍遥、虚静思想中求活法，实际上热烈探寻新的生活、张扬人格精神、发现自我价值。与这种矛盾思潮相适应的各种文艺形式逐渐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转向抒发个人的情怀，从追求雕琢绮丽的外在形式美转向追求内在神、意、风骨、气韵的志趣美。“晋书之韵”是由这个尚韵时代所孕育、所推出，最终晋人书法又成为有晋一代审美观念最集中的体现。

晋人尚韵的书风，是以王羲之为领袖的艺术群体共同形成的时代书法风格。宋人李心传以为：“汉魏以后法书，东晋为第一；就晋人论

之，右军又为第一。”<sup>〔8〕</sup>卷六八八—尚韵书风是与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的心灵姿貌相适应的。所谓韵，就是韵致、风度。晋代书法气韵绝俗，风度翩翩，蕴涵着萧散简远、平和自然、圆转流媚、飘逸飞扬的美，同时亦不乏力度。古代鉴识者对晋书尚韵的风格美颇有体悟。如黄庭坚《题绛本法帖》说：“两晋士大夫类能书，笔法皆成就，右军父子拔其萃耳。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大都犹有古人风泽，略可想见。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sup>〔8〕</sup>卷二三一—康有为《广艺舟双揖》也说：“书以晋人为最工，盖姿制散逸，谈锋要妙，风流相扇，其俗然也。”二人的分析，有助于人们对于晋书尚韵的风格美的理解。

晋人最能体现“韵”字的书体莫过于行书和小草。对此，宗白华先生带着他那美学的发现和诗人的激情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写道：“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綮，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晋人的书法是这种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sup>〔9〕</sup>254 因为行书和小草居于楷书与狂草之间，动静适中，具有中和之美。中和之美需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尤能显现书家与作品的风度和神韵。这种虚静、萧散、简远的中和之美与儒家雅正的中和之美还有不同，而是一种“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的写照，是林下风致、玄学精神、个性自由的综合写照。因此，晋代书法尊崇“神采为上，形质次之”（王僧虔语），大都表现出一种飘逸脱俗、姿致萧朗的风貌。其代表是二王的书法，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评王羲之书为：“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说明王羲之书法的风规韵致，是与其人的气韵、风度一致的。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评王献之书为：“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二王书法艺术流露出的这种韵味风神，以独具的艺术魅力，反映出晋代书艺的时代特征。类似于上述评论的意见，在六朝书论中俯拾皆是，其整体的特点，就是推崇一种风度韵致，追求潇洒蕴藉之美，与当时盛行的人物品藻和文论、画论采用的喻体批评一致。

## （二）唐人尚法

唐代书法法度严谨、气魄雄伟，表现出封建鼎盛时期国力富强的气派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具有力度美和气象美。唐代一朝书法艺术以楷书成就最高。北朝魏碑楷书和唐代楷书是中国楷书艺术的两大派系，代表着中国楷书风格史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时代风格。当代书学界有识之士曾对二者作比较研究认为：“前者（魏碑）如璞玉，粗糙而自然；后者（唐楷）如名器，精美而雕琢。唐楷扬弃了一切不规范的东西，使其成为单一、程式化了的书法形式。而魏体正是保留了大量未被扬弃又未经雕琢的原始材料，充满了生气和奇趣。”<sup>〔10〕</sup>这段论述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尊魏卑唐”及其流风的矫正作出的重新品鉴。唐人顺应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在晋人楷书和魏碑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楷书艺术，形成了“唐人尚法”的时代格局。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尚法的结果确实带来了唐楷“程式化了的书法形式”，但这“法”不是消极的东西，更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唐王朝政治统一、国力强盛的时代产物。唐王朝建立以后，大一统的政治时局带来了空前的文化繁荣，盛唐士人一洗六朝玄虚颓唐的精神状态，代之以胸襟宽广、意气恢宏、充满了蓬勃向上的豪情。诗歌与书法是他们最适宜表达胸中壮气的艺术，从而成为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然而，格律严整的唐诗风范是与尚法的书风相通的。

唐书大兴尚法之风，既是书法的自律性历程进入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又是其特定时代条件使然。具体表现在：一是帝王的重视，国家的提倡，以书为教，以书取士，设立书学，对书法还规定必须合乎“楷法遒美”的要求；二是楷法、碑刻的风行，严守法式的唐代楷碑标志着中国书法史上第三次碑刻高潮，唐代尚法意识深深根植于楷法以及碑刻实践的肥沃土壤里；三是书学理论的导向，唐代不少书家写出书法论著，其中研究“法”的特别多，且趋于系统化，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尚法的审美标准；四是和书艺的尚法书风互为呼应的唐代诗歌也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步入探索法则的历程。书法在文化背景和诸多外部条件的激励下，形成唐书尚法的群体主导倾向，绝不是偶然的。

法，就是法度、规则，指书法的形式规范。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晋人作书虽然注重技法，但他们是循理生法，用法潇洒自如。唐人则循法求古，用法谨严，在法度的范围内抒情达意。书法被称为“法”，可见“法”对于书法的重要作用。追溯唐书尚法之源，应该是从隋

代开始的。陈、隋间书法家释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代孙，一生专嗣右军书法。在笔法上，上他示人以“永字八法”，此法在当时及后来成为学习楷书的准则，迄今仍是楷书入门的基本法则。无疑对初唐书风影响极大，开了唐书尚法的先河。唐代书家对前人的书法进行了总结，在书法结体和用笔方面实行了规范化和精微化。研究笔法与技法的书论层出不穷，欧阳询著《三十六法》和《八诀》，唐太宗有《笔法诀》，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张怀瓘有《用笔十法》和《玉堂禁经》，林蕴有《拨镫四字法》，以及最受后人推崇的《永字八法》和《五字执笔法》等。因此，唐人的楷书表现出大小相等，上下齐平，用笔应规入矩的趋势，即使是比较自由浪漫的行草书，也逐渐抛弃了晋人兼用侧锋的笔法，而追求纯中锋的用笔。在崇尚法度的风气之中，出现了森严雄厚的“唐楷”和豪放的“狂草”，体现了唐帝国开拓向上的精神。

具体而言，“唐法”一方面体现于初唐书坛对晋人和魏碑楷书作进一步完善的努力，初唐四家中，欧阳询书“得晋规矩”，“法度严整”、“人以为法”，虞世南书“得智永笔法为多”，小楷“足为楷法”，褚遂良书“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薛稷“于书得欧、虞、褚、陆（东之）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这是唐代尚法阵容严整的开端。另一方面则是盛唐颜真卿于“二王”法外求法所作出变法的成功，以至晚唐柳公权圆满“唐法”的柳体创作。书法“至中唐，法度森然大备”。颜真卿是变法的杰出代表。欧阳修《集古录》评其书：“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sup>〔11〕 372</sup>中称：“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初唐书法守法多于变化，而颜真卿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不但能守法，而且能变古法，自立新法，成为一代楷则。至于柳公权，初学晋人书法，结合初、中唐诸家笔法，自成一格，因而“书法与世楷模”。可见，唐人尚法体现了守法与变法的统一，既不求法脱，又不为法束，既统一于法，又多姿多彩。若对唐代书法尚法的群体风格美作概括总结，可谓法度森严、端庄整饬、筋骨强健、雄秀劲媚。作为后世习书范本的欧体、颜体、柳体，最典型地代表了有唐一代“尚法”的三个时期的风格美。

## （三）宋人尚意

“尚意”，主要是说宋代书法追求意趣而不拘法度。苏轼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黄庭坚亦说：“老夫之书，本无法也，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sup>〔8〕 卷二三一〇</sup>米芾说：“学

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紫之，便不工也。”<sup>〔8〕</sup>卷二六〇二董道亦说：“书法贵在得笔意，若拘于法者，正以唐经所传者尔，其于古人极地不复到也。”<sup>〔8〕</sup>卷六八二五这些就充分表明了宋代书家们不泥古法，提倡适意的艺术主张，这种主张在他们的代表作品中，如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米芾的《虹县诗帖》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重主观、重个性的美学思潮特别强调了书法艺术的抒情功能。这样，书法艺术就与人的品格性情有了直接的关系，书法的美就不仅在于其外在的形态，更在于其内在的神韵，即它所传达的情趣、学养、品性、胸襟、抱负等精神内涵。

宋代在政治上是软弱时代，已经失去了汉唐那种宏大强盛的气势，但在文化艺术领域却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文人士子在“兼济天下”的愿望难遂之余，只求“独善其身”，以文章、诗歌、艺术来弥补心灵上的失落感。和前代相比，宋代文人兼通诗文书画的现象极其显著突出，而且主要是用来抒情写意的。一朝宋代，漫延着尚意、写意的时代审美主导倾向，书法尚意、绘画写意，“意”在文人笔下跨越门类，互为渗透，互为生发。宋书所尚之意，从艺术主体而言，是指书法家的意趣喜乐、个性表达；从艺术客体而言，是指书法作品的随意而为、不求工拙。它反映了宋代士人的审美情怀，以及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心态，和当时盛行在文艺领域中的关于意境、气韵的审美观是相一致的。

宋代书法虽然未出现多如晋唐的大家，总的成就也不及晋唐，但宋代书坛苏、黄、米、蔡四大家，足以与晋唐名家相抗衡。尤其前三人领袖群伦，成为尚意书风的代表。和楷书以法见长相比，行草书具有以意见长的优势，最适宜于书家抒情达意，从而成为宋代尚意书风的主要书体。苏、黄、米三人在书法实践方面均以意趣独特、个性鲜明的行草书称著于世。苏轼的书法尚意倾向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在《次韵子由论书》<sup>〔11〕</sup>210中自言：“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在《评草书》<sup>〔12〕</sup>2183一文中又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他作为文人书家、文人画家，这些关于书法的自白旨在一个“意”字，影响了一代书风。黄庭坚的书法，其意更加张显，别开生面，行草书富于洒脱奔逸、骏爽超迈之意。米芾的行草把外拓的笔意之美发挥到了极致，作书“意足我自足”，更是尚意书风最充分的表现。然而，包含着率意在内的尚意书风，不等于不讲究书法功力，而作任意纵情的“画字”或“刷字”。冯班《钝吟书要》说：“宋

人作书，多取新意，然意须从本领中来。”此语实在，苏、黄、米的书艺功夫都是一流的。

宋书尚“意”与晋书之“韵”有相似处，亦有相异处。虽然都是强调性灵、情境，宋人“意”的范围则广阔得多，意马心猿、任情纵横、自由豪放，为了心的自足、情的宣泄，不忌险怪、不怕激烈、不拘一端。此“意”是对唐人尚法的否定和发展。说是否定，因为宋人力求打破唐人拘于法度的僵化形式；说是发展，因为宋人并非不要法，而是对法的活用，对法的改造，向法中注进了新意，从而表现自我的情趣、个性。所以，宋人书以其独特的生命情调和文化精神，谱写了中国书艺风格史上别开生面的新篇章。

每一个时代，社会环境不同、人们的审美欣赏角度不同，又随着文化的发展溶入，书法都有着自己的特点。浏览历代书法，“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为精辟的总结：晋代书法流美妍媚，风流潇洒，反映了士大夫阶级的清闲雅逸，流露出一种娴静美；唐代书法法度严谨、气魄雄伟，表现出封建鼎盛时期国力富强的气派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具有力度美；宋代书法纵横跌宕、沉着痛快的书风，正是在“国家多难而文运不衰”的局面下，文人墨客不满现实的个性书法，以书达意，表达一种心境，具有意趣美。

在笔者看来，魏晋人追求的审美境界是雅而丽双赢的效果，书法既讲究华美妍丽，还要追求雅正端庄，将二者结合的最好的是王羲之，其代表就是《兰亭序》。王珣《伯远帖》是华丽到了极致的作品，妍美流丽，就算放在今天来看，也是华丽书法的经典。王羲之篆隶痕迹很深的那些简牍，则是学古未变、质朴有余而妍丽不足的作品，真正能代表他书风特点与个人面目的，就是《兰亭序》。兰亭序的笔法非常精妙，是千锤百炼、精妙构思为基础而随意书写的产物，是端严与流丽结合最好的作品。往下发展，魏碑书法雄浑厚重、质朴遒健，但失之于刀刻斧凿、锋芒太露，刚硬笨拙太多，称不上妍丽之美，算不上雅正之作，这是民间书法大兴而文人书法失利的一段时期。到隋唐时期，国家统一之后，提倡书法，尊重书学，文人书法复兴，碑刻书法继续延续，汇通魏晋与北朝碑版，唐人开始在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下大力发展书法事业，唐人尚法针对的是碑刻楷书而言，其实，也有唐人远离书法法度而追求绝对自由的书法载体形式，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大幅草书，史称狂草书。在张旭、怀素之前，草书只有小草书，无论纸张大小、笔墨点画、章法安排上都是这样，对雄浑气象的激越表达

方式，就是纵情挥洒的狂草艺术。这是不守法度的产物。唐人楷书尚法与草书自由的矛盾，使得唐代书法在队里的两个极端都产生了卓越的书法家和书法作品，并产生了大量与之对应的书法理论著作，从书家、书作、理论三方面来看，唐代都是书法兴盛发展的历史时期，唐代是中国书法最兴盛的壮年期。

但是，无论是极端讨论楷书笔法和结构的理论著作及其书写实践，还是追求绝对自由状态的狂草艺术及其高峰表现，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背离了魏晋时代确立起来的雅丽兼备的审美标准。尚法一路过于端正严格，雅而不丽；狂草一路过于自由放纵，丽而不雅。在唐太宗的大力提倡之下，尽管所有书论、书家都念念不忘二王传统，将王羲之及其作品与笔法作为最高的书法之神供奉起来，在所有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中都标榜自己是王羲之的法脉传人，但唐人书法显然不是雅丽双赢的作品，而是雅与丽相互背离、无法统一的作品。整体上看，除了孙过庭小草《书谱》追摩传承魏晋书风之外，唐人书法很难再有魏晋雅丽风韵在。

宋人学唐，但既不是走尚法的楷书之路，也不是走自由的狂草之路，更不是将二者盲目结合起来的中和之路。而是走技术路线学习唐人、主体修养崇尚意趣、审美风格追逐晋人、书法实践自成面目的整体路数。这个“整体”的坚实基础是宋代开明的科举制度和兴盛的文教事业，使得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修养、眼界认知、书卷气质、独立意识达到历史最高峰的状态。在时代追求帖学的大环境中，宋代文人书法家们各有师法、各有所学、各有所论、各有所著。这种万马奔腾的局面，使得宋代书法在学法唐人、追模晋人的过程中复归魏晋意韵书风，而能自有新变，追求的不再是雅丽之美，而是意趣所在的清丽之美，这是宋代书法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即便是南宋书论逐渐复古、僵化到传统儒家书论书如其人、心正则笔正的老路，也基本保持了书法尚意与清丽之美的追求。

从审美角度看，“宋人尚意”则是对唐代书学思想的背离性选择。唐代国家统一，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强大，疆域广阔，文化鼎盛，故而气象雄强，直接汉朝，唐人书法因而以肥壮为美，楷隶行草诸体均体现出宏大劲健的时代风格；唐代实现了对汉魏晋南北朝隋代五百多年战乱的终结，又需要强有力的法度与规矩绳墨之，体现在书法艺术上，就是书法规范法度的正式建立，正楷书应应运而生，因而“唐人尚法”的审美主张实际上是唐代大一统的政治文

化背景的必然选择。但法度的建立又必然带来约束拘谨的一面，因此，有唐一代，上自帝王下到民间，无论从创作还是理论的主流来看，都表现为一分为二的矛盾特征：一方面是法度森严成为时代象征与历代极则的各家正楷，如欧体、颜体、柳体等；另一方面是狂放不羁恣肆野逸的狂草艺术，如李白、张旭、怀素等——尚法与背法一直是唐代书法相互矛盾的两条主线，并且二者没有得到中和汇通。唐代对书法法度的探索与建立、对创作的规范与理论研究，是进步的；而对书家性情的束缚与统一标准，是退步的。宋代书法摒弃了唐人法度规矩过度的一面，因而在楷书成就上不能望唐人之项背，但宋代书法继承发展了唐人抒情放纵的一面，并对其进行理性约束和自我新变，代表性的苏、黄、米诸家莫不如是。往上溯源，这是对晋人书法崇尚意趣韵味的一种自觉回归，因此，“宋人尚意”是一种复古兼以新变的时风。这一特征同样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唐代相比，宋代疆域狭窄，武力疲敝，但是政治开明，文教昌盛，文人修养居于历代之最，帝王将相擅长书法者层出不穷，因而宋代书法在法度力度气度上不如唐人，而在抒情写意与情趣追求方面超越唐人，开启并形成了文人书法这一书法艺术的主流。蜀人苏轼是宋代尚意书风的第一理论提出者与文人书法的主要创作实践者。他在当时直到当代的影响都异常巨大，是书法史上仅次于王羲之的第二号人物（王羲之书法有历代帝王的极力提倡，方能如是）。

巴蜀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在宋人尚意特点的探索、立论并使之最终确立方面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苏轼是宋人尚意的第一理论倡导者和创作实践者。黄庭坚等人作为与苏轼过从甚密的学生和友人，在言行交往入蜀为官等方面大受苏轼等巴蜀人物的影响，是尚意书风的积极参与者和理论提升者，张拭、张孝祥、魏了翁等人是理学思想指导下的积极传承者。

## 二、“尚意”书论的提出与时代风格的确立

宋代书法从宋初开始，就为三百年的发展奠定了两个基调：文人书法和帖学书法。宋代文教事业发达，其兴盛程度为历代之冠；科举制度完善，取士面向全社会；因此宋代书法的主流创作大军是通过科举走向仕途的文人士大夫，而宋代士人的整体学术修养也是其他朝代所不可企及的，宋代书法家的学养、见识、书卷气最盛。帖学书法前论甚详，在此不述。发展到宋代中期，第一个高举尚意、尚趣、喜乐、

积学书论观念的人是欧阳修。欧阳修虽然书法不能成为一流大家，但他诗文为一代宗师，同时积学好古，编纂《集古录》一千卷，题跋十卷，详细鉴赏、评论了前代名碑与名帖，提出了许多有见识、有新意的看法。

首先，他认为写字是一个人的业余爱好，可以修身养性，娱乐身心，于是提出“有暇即学书，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尔”（《学书静中至乐说》）<sup>〔8〕卷七三八</sup>、“可以乐而不厌，不必取悦当时之人，垂名于后世，要于自适而已”（《夏日学书说》）<sup>〔8〕卷七三八</sup>、“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学书为乐》）等自我看法，并且多次与苏舜钦、蔡襄一起讨论到“学书消日”、“把玩不倦”、“极为可喜”等话题。欧阳修是一个严肃的儒家学者，他对佛道二家极为反感，一直主张正统的儒学思想观念，而儒家经学的研究前提就是文字学，书法写得好不好，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的重要尺度。而自古以来尊崇书法的风气，熏染了一代又一代皓首穷经、肩担大任的儒家学者。欧阳修能够提出上述看法，表明他对于书法的功能有了全新的认识：书法除了公文写作，还有娱乐消遣的一面，甚至主要是娱乐消遣的一面。所以，他论书特别重视个性心理感受，主张自己的性情为主，不要对古人亦步亦趋，不要成为古人书法的奴隶：“学书当自成一家之体，其模仿他人谓之奴书。”（《学书自成家说》）<sup>〔8〕卷七四三</sup>在这样的基础上，他特别提倡书法家的艺术个性：“求悦俗以取媚，兹岂复有天真耶？唐所谓欧、虞、褚、陆，至于颜、柳，皆自名家，盖各因其性。”（《李晟笔说》）<sup>〔8〕卷七三八</sup>

欧阳修主张天真、提倡个性、看中娱乐、随意消遣的说法，是宋代书论中关于书法娱乐功能、书法个性创造的首出之见，开启了后代关于尚意、尚趣书风的门径。他甚至指出学习书法的主要功能就是娱乐解闷，聊作喜好而已，将书法的地位从以前很高的庙堂状态降下来了，不再严肃端庄地对待书法，而是自娱自乐地对待书法。书法不再是妙不可言、神圣高雅的东西，而是普通生活中的游戏娱乐性质的东西。这是宋人解构前人，主张尚意的理论基础。

此外，欧阳修还主张写字可以不计较工拙，写得好不好无所谓：“每书字，尝自嫌其不佳，而见者或称其可取。尝有初不自喜，隔数日视之，颇若稍可爱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销日，何用较其工拙而区区于此，遂成一役之劳，岂非人心蔽于好胜耶？”（《学书工拙》）<sup>〔8〕卷七四四</sup>既然可以不计较写字效果的好坏工拙，那么古人珍藏秘玩的用笔之法也可以不考虑工拙的问

题了，于是提出“斜正之间便分工拙”、“可以意得”的尚意之说：自己觉得可以，那就行了，不必太计较。所以，欧阳修的书法水平尽管不高，但他在书法理论上的提倡影响是很大的。作为一代文宗，同时身居高位，是文士书法的积极提倡者和实践者，他“学书为乐”、“学书消日”、“不为奴书”、“各因其性”、“不分工拙”、“可以意得”、“信笔便书”、“得意忘形”、“必有深趣”等若干散论的提出，使他成为文人尚意书法理论的先行者。

苏轼是欧阳修的学生，也是靠欧阳修奖掖、提拔起来的才俊。苏轼毕生尊敬欧阳修，他不仅经常满怀敬意地将欧阳修的书法水平吹到远远脱离实际质量的地步，还对欧阳修的许多看法忠实地继承下来、详加论说、发扬开去，比如论蔡襄书法“为本朝第一”的意见，苏轼为欧阳修倡导了七八次并详细加以分析论述，再比如苏轼为滁州重写《醉翁亭记》时说自己是欧阳修的学生，这个工作义不容辞，等等。

但从书法理论角度看，苏轼对欧阳修娱乐、消日、个性、工拙的尚意启蒙思想吸收并不多。欧阳修不是一个书法家，而是一个书法爱好者，他谦虚地说自己学书法是跟着鉴赏、搜集古代碑帖一路开始的，慢慢地能够写字，逐渐有长进。但苏轼显然不是这样的情况，他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文艺天才，自称为文写字全靠天赋，比如《自评文》<sup>〔12〕2069</sup>所说：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它虽吾亦不能知也。

历史上，敢自己说自己的文章犹如“万斛泉源”、“随物赋形”的人，苏轼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就算是庄子，他也只能说自己的文章是“无端崖之辞”，虚辞滥说，所以妙不可言；而苏轼是觉得自己的才华真是高呀，随便怎么写都行，自然而然，想成什么样子都可以，没有难度，不存在构思的问题。<sup>〔13〕</sup>因此，这段论述，可以称为苏轼文论“尚意”的最佳代表，更是苏轼宗法道家自然无为哲学命题而对创作思维进行形象表述的最佳言论。苏轼不仅有思如泉涌的先天思维能力，更有“随物赋形”的后天语言表达能力，还有收放自如、一日千里的卓越天赋。事实上，通观数千年巴蜀文学史与整个古代文学史，能与苏轼相提并论的杰出文学家，也不过司马相如、扬雄、李白数人而已；与苏轼一样能精通经学、诗、文、书、画并均能达到第一流大家的人才，千年以降，大约只有王维接近苏轼。在道家自然论哲学思想

与超迈的个人才华支配下的苏轼诗文书画理论,经常出现“体气高妙”(《书子由超然台赋后》)、“万窍玲珑”(《书赠邵道士》)、“人才分限”(《记少游论诗》)等等评语,肉体凡胎的普通人是无法达到苏轼所讲的悠然状态的。

苏轼《自评文》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天赋奇高,二是随意而为。随意而为也体现在书法上,就是随心所欲的写,不刻意去想写成什么样子。苏轼《评草书》<sup>(12) 2183</sup>说到: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欧阳修书法本身不佳,所以主要看书法的娱乐功能;苏轼书法本身就很好,所以没怎么想过该如何写才好。完全解脱了构思、效果内外束缚,达到内外和谐、心手相应、随意为之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书法创作,想不写好都难。不独散论,苏轼还有二十六首论书诗歌,不少作品论述到随意书写一事,以《石苍舒醉墨堂》<sup>(11) 235</sup>为代表。这首诗写道: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恁恁令人愁。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消百忧。  
乃知柳子语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  
君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  
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皆藏收。  
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  
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宋代尚意书法理论的独立宣言。且不说“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这样的话其他人没有讲过——实际上他们也不敢讲——仅凭意造无法、不减钟张、不须临池、一挥纸尽这样的狂态、自信和骄傲,历史上就没有第二个人。

苏轼不光是理论先行的空谈家,他更是一个实践创作能跟得上的书法家。《跋王荆公书》<sup>(11) 2179</sup>说:

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

“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实际上在说王安石书法是自然天才的表

现,是天赋书法,个人面目太强,不是有根基有传承的书法。而“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句,则是说自己平时写字就不太认真,比较随意。竭尽能力专注写字可以到本朝书法第一的蔡襄的水准,稍得意可以与杨凝式相抗衡(杨凝式是宋代书法家普遍取法学习的对象,是唐代书法到宋代书法的重要过渡),再随意一点,就是“无意于佳”的状态,好像是在谈论《法华经》一样<sup>(14)</sup>,成佛得道,宏大厚重,永垂不朽。应该是颜真卿、王羲之这样的级别了。实际上,苏轼确实在书法史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名垂千古,成为一代宗师。由此也可见苏轼对自己的书法评鉴甚高。

中国书法理论史上论述书法构思的意见很多,从晋代卫夫人、王羲之开始,一直到明清代诸家的书论中,都对“意在笔先”的构思论书写状态极为推崇,笔者曾整理出六十一家之多。其中,王羲之的意见是最经典的看法:“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苏轼无意于佳、意造无法、随物赋形的书写状态显然不是王羲之一路而下的意在笔先、预想字形大小、然后精确地传达点画结构而作字的传统意见,这是另一种全新的书法创作思维方法论,即非构思类的自由书写方法论。所以,苏轼才会提出意造无法、无意于佳这样的看法,尽管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但却有着触类旁通的基本事实作为支撑,他的文章诗词就是这样的。天赋高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受那么多限制,岂不更好?

综观书法理论史,苏轼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意造无法、无意于佳主张的理论家,这不仅是对欧阳修娱乐书法理论的继承,更是对王羲之意在笔先书论的解构,是苏轼在贯通诗文、依靠天赋基础上独创的全新书法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宋人尚意不仅是以非构思笔法论对晋人意在笔先的构思笔法论进行解构,更是对唐人法度谨严的楷书世界进行突围和新变,没有这样的理论创造,宋代书法就没有办法走出魏晋隋唐两座高峰的苑囿,就不可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时代标志。

在苏轼之外,同时代的名家中还有文同、黄庭坚、米芾、王安中、李之仪、秦观等人论述过尚意之说,以黄米两家对尚意理论有较大贡献。黄庭坚主要是在尚意的基础上论兴趣、谈自然、讲韵味、谈禅意,是继承苏轼之后的

新见；米芾则主要是高扬个性解放的大旗，以其怪异孤僻的性格和凌驾一世的狂妄宣扬个性书法，他的理论见解不如苏黄二人全面，但成为宋代书法家个性解放、目中无人的极端代表，《海岳名言》<sup>〔8〕</sup>卷二六〇二有一则记录：

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在米芾眼中，蔡京、蔡卞、蔡襄、沈辽、黄庭坚、苏轼等本朝名家“各得一笔”，各取一面，各有所短，只有自己“独有八面”，故称刷字。刷字就不是写字，是用刷子涂抹，随便写，往哪个方向用力、出锋、行笔都没有关系。米芾书法号称八面出锋，自评刷字，也算是创作和理论合一的案例。

### 注释

〔1〕《宋史》本传曰：“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另据《宋史·艺文志》的记载，苏轼共有《易传》九卷、《书传》十三卷、《书说》一卷、《论语解》四卷、《东坡诗话》一卷、《苏沈良方》十五卷（沈括、苏轼所著）、《前后集》七十卷、《三苏翰墨》一卷（苏轼等书）。苏轼的著作首先是经学著作，其次是奏议策论，再次是诗文书话。《宋史》本传对苏轼的文艺才华只字未提，善书一事无从谈起，只有《宋史·艺文志》记载有《三苏翰墨》一卷（苏轼等书），不能推出苏轼善书的能耐来。

〔2〕元祐八年（1093）九月，“元祐更化”的总后台高太后去世，年已18岁的宋哲宗终于走上历史的前台。宋哲宗厌恶元祐旧党，崇拜其父亲神宗，亲政之后，自然就要将自己的政治理念付诸实施。绍圣元年（1094），在宋哲宗的支持下，新党重新上台，恢复熙丰新法，号称“绍述”神宗之政，结束了“元祐更化”。在哲宗的支持下，新党重新上台，“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元祐年间，旧党仗着高太后的支持，肆无忌惮地排挤打击熙丰新党，尽废熙丰新法，甚至利用所谓的“车盖亭诗案”，将曾任宰相的新党大臣蔡确贬死岭南，与此同时，又旁及枝叶，扩大打击面，宋哲宗“绍述”以后，政治风向再次逆转，随着新党上台，旧党大臣纷纷被降职外调，绍圣元年三月至四月，首相吕大防罢知永兴军，门下侍郎苏辙罢知汝州，端明殿学士知定州的苏轼落职知英州，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祖禹出知陕州，右相范纯仁罢知颍昌府。不但如此，连党附元祐大臣的中层官僚也遭打击，如号称“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也落馆阁校勘，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此后的一年多里，众多元祐党人继续被一贬再贬，到了绍圣二年十二月，曾布仍言：“去年施行元祐党人，多漏网者。”章惇说：“三省已得旨，编类元祐以来臣僚章疏及申请文字。密院亦合编类。”对此，哲宗表示同意。此后，绍圣新党

又对元祐旧党展开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进一步向白热化发展。

〔3〕元符（1098~1100）是宋哲宗赵煦的第三个年号，北宋使用这个年号共三年，元符三年正月宋徽宗即位沿用。神宗时，有张载的关学，洛阳二程的洛学，川中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几个学统都是广收弟子，到熙丰变法时，这种学统之争又进而扩展至朝堂之上，越演越烈。如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尚可止于言辞，但他们的门人弟子却交朋结党，彼此倾轧，演变为宋朝的党争。至元符太后当政时，司马光为相，尽废神宗熙宁、元丰间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旧党怨于曾被新党诸人压制一时，遂奏请元符太后，立元丰党籍，斥逐新党诸人，种下党争祸根。世称元符党籍。因打击元丰大臣，故又称元丰党籍。

〔4〕元祐党籍是执政的新党借皇权力量大肆打击反对集团并实行私心报复的恶性政治事件。宋哲宗元祐元年，司马光为相，尽废神宗熙宁、元丰间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绍圣元年章惇为相，复熙丰之制，斥司马光为奸党，贬逐出朝。徽宗崇宁元年，蔡京为宰相，尽复绍圣之法，为了自己把持朝政，蔡京勾结宦官独专朝政。给反对新党的司马光、苏轼等（当时很多人都死了）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在端礼门外树立“元祐奸党碑”，上面刻写三百零九个党人之恶名，昭示全国，被刻上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徙。后因星变，徽宗下令毁碑。其后党人子孙更以先祖名列此碑为荣，重行摹刻。

〔5〕《宋史》、《全宋文》、《宋大诏令集》等文献中随处可见上述集团党争的文献资料，笔者曾专门梳理过这部分资料，得到新旧两党132人661篇奏章、六朝诏令827篇，放眼望去，尽是人祸，北宋文教事业培养出来的文人斗争直接摧毁了政权的人才基础和施政环境。王安石新法废立之争本是初衷良好的改革运动，至此已经背离初衷甚远。北宋亡国与党争有直接关系。仅从《宋史》一书中点名苏轼落职罢官的材料就不下十则，任举数例：其一，宋哲宗绍圣元年四月，壬子，苏轼坐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落职知英州。其二，宋哲宗绍圣元年六月甲戌，来之邵等疏苏轼诋斥先朝，诏谪惠州；丙子，罢制置解盐使。其三，宋哲宗绍圣四年闰二月，丙戌朔，张天说坐上书讥讪先朝死；甲辰，苏轼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范祖禹移宾州安置，刘安世移高州安置。其四，宋徽宗夏四月，丁巳，诏范纯仁等复官、官观，苏轼等徙内郡居住。其五，宋徽宗崇宁元年九月，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庚子，以元符末上书人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邪等，降责有差；甲辰，诏：“元符三年、建中靖国元年责降臣僚已经牵复者，其元责告命并缴纳尚书省。”……戊辰，诏责降官观人不得同一州居住。……丙子，刘奉世等二十七人坐元符末党与变法，并罢祠禄。

〔6〕洛蜀之争全称为洛蜀朔三党之争，对此，学术界研究成果已多，且史传文献记录较为清楚，故不在文中专门讨论之。现将三党之争的主要经过和观点简述于下：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是由多种政治力量暂时结合而成的，在击逐变法派的同时，内部也掀起了具有地方色彩的派别斗争，这就是“蜀洛朔

党争”。洛阳人程颐以布衣之士为司马光、吕公著汲引至政府，并以崇政殿说书之职担任宋哲宗的老师。对这个十岁的小皇帝，程颐“每以师道自居”，除灌输儒家正统思想，还要小皇帝不近酒色，连司马光等也觉得未免过分。司马光死后，朝臣们藉朝贺大赦的机会，去吊唁司马光。程颐认为不可，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哪能“贺赦才了”，就去吊祭！人们不同意这种迂腐之论，而苏轼讥笑说：这是枉死市上叔孙通制订的礼，而不是孔夫子的礼。众人无不哄然。程颐的弟子朱光庭、贾易等所谓洛党借口苏轼在策问中提出效法“仁祖之忠厚”则官吏们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励精”又使官吏们流于苛刻，藉以攻击苏轼诬蔑宋仁宗赵祯不如汉文帝刘恒、宋神宗赵顼不如汉宣帝刘询，应予治罪。蜀人吕陶、上官均亦即所谓蜀党不肯坐视苏轼所受排击，上章论列朱光庭借机为程颐泄私忿。无所偏袒的范纯仁也觉得朱光庭的奏章太过分；而侧身于朔党的王岩叟则支持程颐。洛党和蜀党斗争的结果是苏轼离开了中央政府，程颐也罢去了崇政殿说书之职。两党两败俱伤，以刘摯、梁燾等北方人为首的朔党控制了政府，成为司马光保守派的真正继承者。随后，朔党又同吕大防发生矛盾，权势之争愈演愈烈。而一些投机分子如杨畏之流又交斗其间，政治局面更加混乱，最后经受不起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打击，完全垮台。洛党的政见，与王安石多有异同。他们也像王安石那样，主张以理想来改造现实，他们所本的理想也是所谓“王道”典范唐虞三代。不仅在理想方面，在具体主张方面也是这样。程颐曾上神宗书，其中有关井田、兵归于农、帝王必立师傅等等的主张，也多与王安石一致。熙宁二年程颐参与考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就是因为有相同认识的基础。洛党与王安石也有不同，比如王安石特重法，而洛党偏重人。程子曾说：“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这是两者显著的不同处。蜀党对政事的看法较洛党柔软，言事论理不执于一端，所以他们并不强调某种理念，也不认为某种制度独胜。而两党领袖的趣味、性格尤其表现了不同。比如洛党领袖程颐“不欲为闲言语”，援古句“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说作诗是浪费生命，所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个字上”。蜀党领袖苏轼则极好词采，以为“世间乐事无逾此者”。程颐严肃有余，完全没有幽默感，苏轼则是在诗文书画诸方面都极显才华的大才子。朔党不同于洛党之处，在于朔党多为实务派官员，所以较重经验。王安石与洛党都喜欢讲唐虞，讲三代，讲“王霸之辨”，而朔党不讲。不讲三代那样玄远的理想，而注重王安石与洛党看不起的汉唐经验，主张通过权衡汉唐的利弊，来进行逐步的改良。激进派对这样的主张不以为然，以为这样的主张行之于平稳治世，也许是得策，但用之于大变革时期未免缓不济急。洛蜀朔三党，不同处本来很多，只是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走到了一起。维护新法的王安石一派被驱除出朝廷，他们便不能相安于一朝。所谓“既交恶，其党迭相攻，”文人相轻的劣根性尽显无遗。

〔7〕 乌台诗案是北宋著名的文字狱，以苏轼及其亲党等保守派为主要打击对象。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1079）发生了乌台诗案。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

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又称“柏台”。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近4个月。李定等人曲解诗词，并对苏轼严刑拷打，“诟辱通宵不忍闻”。由于王安石、王安礼的求情和苏辙捐官抵苏轼罪等因素，苏轼最终免于死。当然，根据《宋史》的记载，苏轼幸免于死主要在于宋神宗的爱才，“慈圣光献曹皇后……苏轼以诗得罪，下御史狱，人以为必死。后违预中闻之，谓帝曰：‘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据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轼由此得免。”北宋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人生与仕途遭遇重大挫折。

〔8〕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9〕 宗白华《美学散步》，中华书局2009年版。

〔10〕 王玉池主编《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

〔11〕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12〕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13〕 当代写作学有马正平先生提出的“非构思写作学”，就是建立在庄子、苏轼等人奇妙想象力基础之上的写作理论，该理论主张建立一套可以自为的写作模型，常人经过思维训练，也可以达到随意自为的状态。

〔14〕 对于“言法华”一说，还有一种理解是认为言法华是一个僧人，善书，即欧阳修笔下所谓作书不求工拙的言法华。但根据苏轼先蔡襄而后杨凝式的排列顺序，是后者高于前者，故本处采用文中的说法。

## 参考文献

〔1〕 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刘奇晋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一二）》，荣宝斋出版社1991年版。

〔3〕 卢圣辅主编《中国书画全书》（全14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版。

〔4〕 脱脱等撰《宋史》（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5〕 李慧斌《宋代制度层面的书法史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6〕 李水泳《北宋社会背景视角下的苏轼书法嬗变》，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7〕 李放《苏轼书法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王万洪，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 谈苏轼的赋税观

刘清泉

**内容提要** 为诠释苏轼诗文中“税”字的意义，搜集了苏轼有关例句若干句、诗文若干篇；为阐释苏轼的赋税观，从“反对苛税，主张薄赋税”、“反对弊税，主张较赋税”两个方面加以论述、考察。

**关键词** 苏轼 赋税 观点

谈论苏轼的赋税观，必须先搞清楚“税”的意义。

关于“税”的意义，《说文解字》说：“税，租也。从禾，兑声。输芮切。”<sup>[1]198</sup>又说：“租，田赋也。从禾，且声。则吾切。”<sup>[1]198</sup>又说：“赋，敛也。从贝，武声。方遇切。”<sup>[1]177</sup>《说文解字》把“税”解释为“租”，把“租”解释为“赋”，而且把“赋”解释为“敛”。从“税”、“租”、“赋”、“敛”字的偏旁变化，可以窥见赋税从实物到金钱、从主动到被动的变化过程。综合字典对“税”的解释，大约有几项：一是指赋税。《前汉食货志》<sup>[2]853</sup>云：“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虞衡之入也。……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二是指兵赋，交纳的兵甲车马等。《前汉食货志》<sup>[2]853</sup>云：“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三是指赋役，封建统治阶级强制人民承担的无偿劳动。《韩非子·诡使》云：“以避徭赋。”

## 一、苏轼诗文中的税

从苏轼诗文中含有“税”字的例句来看，“税”有两个意义：第一，赋税；第二，与“驾”组合成“税驾”，意思是解驾、停车，言休息或归宿。

### （一）赋税

苏轼《吴中田妇叹》<sup>[3]804</sup>云：“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被迫卖掉耕牛，拆掉房屋、

灶台，用以缴纳今年的税收，老百姓根本无法顾及明年能不能吃饱饭了。苏轼《和陶桃花源并引》<sup>[3]4750</sup>云：“臂鸡有时鸣，尻驾无可税。”《庄子·大宗师》<sup>[4]143</sup>云：“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意思是如果疾病使我的左臂变成鸡了，那么就让这只鸡打鸣司晨与司夜去吧……如果化我的屁股成为车轮，把我精神变作马匹，我就乘着这驾马车出行，谁还需要再另行套车去呢！

“臂鸡”“尻驾”指想像中左臂变成鸡、屁股变成车，鸡可以打鸣报晓，而车却不可以收税。这是对乱征赋税的讽刺。苏轼《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刑政》<sup>[5]436</sup>云：“先王之理财也，必继之以正辞；其辞正则其取之也义。三代之君食租衣税而已，是以辞正而民服。”意思是先王管理财务，一定反复讲征税的正当理由，言辞正当那么征税也就合乎道义。三代君主之所以能够以租税收入维持吃穿用度，是因为言辞正当而百姓信服。

### （二）税驾

苏轼《新渡寺送任仲微》<sup>[3]3915</sup>云：“倦游安税驾，瘦田失归耘。”意思是已倦于为官，思欲归田。赵次公曰：“先生因送任仲微，遂起归田之兴。以仲微家有美田在蔡州新息县也。”苏轼《次韵郭功甫观予画雪雀有感二首》<sup>[3]5323</sup>云：“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意思是乘风扶摇而上九万里，哪里才是自己的归宿呢？鹏鸟到现在才后悔自己怎么不飞低些呢。王十朋集注引赵次公曰：“盖先生悔悟自叹之词。”语出《庄子·逍遥游》，文曰：“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sup>[4]2</sup>意思是鹏鸟的背，不知道有几千里大呢。它激动起来，一来劲，飞翔升空，翅膀展开就像垂挂中天的云层。“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sup>[4]3</sup>意思是鹏鸟向南溟迁徙，

击水而飞，一飞是三千里，高空飞行，一飞是九万里。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并引状问》<sup>[5]939</sup>云：“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税驾矣。”如今天下人都认为新法不便，而陛下却执意坚持，微臣真不知道陛下要走到哪里才能解驾停车啊。

其实，“税”的同义词还有征、租、课、算，等等。如苏轼《策别厚货财一》<sup>[5]860</sup>云：“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则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矣。”意思是如今天下所有能够征税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不征税的。高山丘林森林平原，没有一处没有禁令。边关有赋税，集市有租赋，盐铁有专卖，酒水有课税，茶叶有算赋。凡是末世用过的应急之法，没有不用尽的了。

## 二、苏轼的赋税观

### （一）反对苛税，主张薄赋税

“苛”的意思是苛刻、狠；“苛税”的意思就是狠税、重税。苏轼反对重税、主张轻税。所谓“薄赋税”，就是减少榨取、减轻赋税之意。这些主张是苏轼德治仁政政治理想的体现。

以“仁政”为出发点，苏轼体恤民情，关注民生。他在《策别安万民一》<sup>[5]833</sup>中说：“今鸡鸣而起，百工杂作，匹夫入市，操挟尺寸，吏且随而税之，扼吭拊背以收丝毫之利。”意思是说如今鸡一叫就要起身，做工的进行各种各样的劳作，商人进入集市，一尺一寸地丈量出售。而官吏随之而来，向他们征收税款，以至掐着他们的脖子，捶击他们的脊背，以逼迫他们交出微薄的税利。他认为官府如此作为，百姓是不可能安居乐业的。

这与程夫人“仁爱”的教导是一脉相承的。苏轼在《记先夫人不残鸟雀》<sup>[5]8458</sup>中回忆小时候母亲不杀生、禁捕鸟的事情，以至众鸟不畏人捕而与人亲近，同时由于人的保护而免于蛇鼠猛兽的伤害。末尾议论说：“由是观之，异时鸟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为甚于蛇鼠之类也，苛政猛于虎，信哉！”意思是由此看来，鸟雀不敢在离人近的地方筑窝，是因为它们认为人比蛇鼠之类的动物更可怕。苛刻的政令比老虎还凶猛，确实如此啊！

对于苛捐杂税，苏轼深恶痛绝，并给以辛辣的嘲讽。从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作于湖州的《吴中田妇叹》<sup>[3]804</sup>可以窥见一斑。其诗云：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耙头出茵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赭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粃。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糗糒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开头四句，写这一年农村的景象：粳稻迟熟，好不容易盼来了收割，却是秋雨如泻。秋雨连绵，空气潮湿，以致农具锈蚀，“耙头出茵镰生衣”。由此透露了田妇失望、愁苦的感情。以“苦”定调，并开启下边的具体描写。

接着四句，无休止的秋雨使失望的田妇流泪，而流泪流尽秋雨却仍然不尽，只有眼巴巴地看着稻穗躺在泥水里。这两句可以说是一字一泪，下面两句写收割之苦。在田垄上守候了一个月，在久雨中等待晴天，“天晴获稻随车归”没有直接写收割的喜悦，却暗含了喜悦的情绪。不难体会出这样的意思：多少个日日夜夜，忧愁焦虑，勤劳辛苦，好不容易总算收获到家了。以上八句，写农民的忧愁和劳苦，反衬下面作者着意要表现的因米贱钱贵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接着四句，笔锋一转，希望破灭，短暂的喜悦顷刻化为更大的悲哀。“汗流肩赭载入市，价钱乞与如糠粃”颗颗饱含着农民血汗和眼泪的稻米，价钱却贱如糠粃！以一种平淡的语气叙说一个冷酷的事实，每个字都凝聚着一种难言的痛苦、失望和悲愤的感情。“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只有走到生活绝境的人，才会卖掉耕牛和房屋的啊。

最后四句，“官今要钱不要米”由于新法收税要钱不要米，这就是税收中的“折变”。加上当时为了对付西夏而花费大量的银钱去“招抚”边境上的羌人部落，造成钱荒米贱，以至百姓遭殃。最后两句对那些带给人民灾难却又以好官自诩的权贵们给予辛辣的嘲讽。

即使贬谪黄州期间，苏轼对苛税亦有讽刺之作。他在陈季常那儿见到《朱陈村嫁娶图》之后，便有感而发，作诗《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sup>[3]2146</sup>。此画让苏轼回忆起朱陈村的淳朴民风。朱陈村处于深山、与世隔绝、民安其土，而且只有“朱陈两姓，世为婚姻”。苏轼知徐州时下乡劝农，

曾到过与之临近的杏花村。但是，如今这个偏僻村落竟然有县吏半夜敲门、催收税钱，其风俗、景物哪里还能够入画作为审美对象呢？此画让苏轼不禁怀旧思今、感叹唏嘘，因作此诗，其二云：“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苏轼既同情百姓生活不易，又讽谏朝廷税收过度。

由此可见，苏轼薄赋税的主张。

## （二）反对弊税，主张较赋税

“弊”的意思是弊病、害处，引申为坏的、有害的。“弊税”的意思就是坏的、有害的税法。苏轼主张废除劣税、改良弊税。所谓“较赋税”，就是考察、比较税法施行的效果对百姓是否有利，考察、比较只是手段，辨别优劣才是目的。

### 1. 免“五谷力胜税”

北宋前期，商船不论载货与否，均按载重量收税，称“力胜钱”。惟贩运粮食不收。神宗时，各州军为增加商税收入，对贩运粮食的船只也征税，称“五谷力胜钱”。凡遇关卡就要征收税率 2% 的力胜钱，此税的总税率就很高了。“五谷力胜钱”提高了运营成本，给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长途贩运带来严重影响，尤其发生饥荒的时候，阻碍了粮食流通，也就阻碍了顺利赈灾。

宋仁宗时发布《天圣附令》规定，免除粮食柴草农具等的力胜钱和其他税钱。虽然朝廷有诏令，但是因为力胜钱是地方收入的财源之一，遭到地方的强烈抵制，诏令也就形同虚设了。苏轼屡次上奏朝廷，表达他对“五谷力胜税钱”的看法，希望朝廷再次诏令地方执行《天圣附令》。

苏轼知杭州，元祐四年（1089）上《再论闭余状》<sup>[5]3651</sup>、元祐五年（1090）再上《上吕仆射论浙西灾伤书》<sup>[5]3254</sup>，力主免去“五谷力胜钱”。

元祐七年（1092）十一月七日，苏轼回到朝廷，又上《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sup>[5]3522</sup>，文曰：

臣闻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余，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废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无之弊法，使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

皇宋某年始。”臣窃为圣世病之。

意思是我听说粮价太低则使农民受损失，而粮价太高则使商人受损失，因此法律规定不征粮税，使丰收的地区，商人争先买粮，以抬起太低的价格；而在受灾地区，车船拥挤来卖粮，以压低高涨的粮价。从先王以来，没有谁能改变这种做法。而最近出台的法令，开始征收五谷力胜税钱，这使得商人裹足不前，农业和商业都受到损害。废去历代不可更易之善典，而行自古所无之弊法，使百世之后，史书上留下这样的记载：“征收五谷力胜税钱，是从我大宋王朝某年开始的。”我私下里为我朝感到痛心。

又说：

右臣窃谓：若行臣言，税钱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谷无税，商贾必大通流，不载见钱，必有回货。见钱回货，自皆有税，所得未必减于力胜。而灾伤之地，有无相通，易为振救，官私省费，其利不可胜计。今肆赦甚近，若得于赦书带下，益见圣德，收结民心，实无穷之利。取进止。

意思是微臣私下里认为：如果按我的意见办，税钱也不至于大幅度流失，为什么这样讲呢？粮食不征税，商业必然兴旺，不载现钱，回程必然要带些货物。现钱与带货都要征税，所得不一定就比力胜税钱少。而受灾地区，互通有无，容易救济，公私费用节省，其利不可计算。现在大赦已经迫近，如果在赦书中顺便下达，更现圣德，笼络民心，实乃无穷之利，请裁决。

元祐八年（1093）三月十三日，苏轼于京师再上《缴进免五谷力胜税钱议札子》<sup>[5]3541</sup>予以申说，并说“臣昧死以闻，无任战汗待罪之至”，意思是我冒着死罪献上奏议，不禁惊恐待罪之至。

苏轼“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札子，主张免去“五谷力胜钱”，因为此法之弊显而易见，而且此法与朝廷法令相左。

### 2. 罢“赋税赏格钱”

元祐七年（1092）八月，苏轼知扬州，接连上奏《扬州上吕相公论赋税书》<sup>[5]5258</sup>和《乞罢赋税岁终赏格状》<sup>[5]3503</sup>，力主罢除“赋税赏格钱”。他在后一篇表状中说：

检会元丰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敕：“卖盐及赋税监官年终课利增额，计所增数给半犒；卖盐务专副科子赋税专栏，年终课利增额，计所

增数给半釐。”及检会元丰赏格“酒务盐官年终课利增额，计所增数给二釐；酒务专匠，年终课利增额，计所增数给一釐”者。

意思是对照元丰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敕令：“卖盐及赋税监官年终计算税利的增加额，把总额的半成作为奖赏；卖盐务正副掌秤的，赋税吏员，年终核算税利增加额，把增额的一成作为奖励。”又对照元丰年间的奖励规定：“酒务盐官年终核算利税增加额，算清所增数后将其中的二成作为奖金发给征收者；酒务专匠，年终核算利税的增加额，算清之后将其中的一成作为奖金发放给他。”

在介绍赋税年终赏格是怎么一回事之后，苏轼具体分析了罢除此法的原因。他说：

右臣闻之管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今盐酒赋税监官，虽为卑贱，然缙绅士人公卿胥子，未尝不由此进。若使此等不顾廉耻，决坏四维，掊敛刻剥，与专栏秤匠一处分钱，民何观焉？所得毫末之利，而所败者天下风俗、朝廷纲维。此有识之所共惜。

意思是我听说管仲曾经说过：“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种纲纪。纲纪败坏，国家就会灭亡。”现在的盐酒赋税监官，地位虽然卑贱。然而绅士君子公子公孙，未尝不由此进身。如果让这些人不顾廉耻，破坏纲纪，聚敛盘剥，与税吏秤匠们在一起分钱，人民还能向谁看齐呢？得到一点点蝇头小利，而将天下风俗，国家纲纪败坏，有识之士对此倍感痛惜。

又说：

臣至淮南，体访得诸处税务，自数年来，刻虐日甚，商旅为之不行。其间课利，虽已不亏，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为少衰。详究厥由，不独以财用窘急，转运司督迫所致，盖缘有上件给钱充赏条贯，故人人务为刻虐，以希岁终之赏。显是借关市之法，以蓄聚私家之囊橐。若朝廷悯救风俗，全养士节，即乞尽罢上件岁终支赏条贯。

意思是我到淮南去，查访得知各地的税务部门，最近几年，盘剥日甚一日，商人因此裹足不前。其间税钱，虽已不亏，或已有增剩，而官吏们的盘剥也没有稍加减轻。认真探究其原因，这不单单是因为国家财政状况窘迫，转运司尽力催逼所致，而是由于上述给钱奖赏的规定，使得人人尽力盘剥，

以图年终的奖赏。显然是借助于税收的办法，以中饱私囊。如果朝廷要挽救风俗，激励气节，就请废除上述年底奖励的规定。

他在前一篇奏议中说：

只如扬州税额，已增不亏，而数小吏为虐不已。原其情，盖为有条许酒税监官分请增剩赏钱。此元丰中一小人建议，羞污士风，莫此为甚。如酒务行此法，虽士人所耻，犹无大害。若赋税行之，则既增之外，刻剥不已，行路被其虐矣。轼旦夕欲上此奏乞罢之，亦望相公留念。

意思是就像扬州税额，已收到比规定还多的税款并不亏空，几个下级小官却肆无忌惮地勒索。查其原因，因为有条许酒税监官分请增剩赏钱。这是元丰年间一小人出的主意，玷污士风，真是到了极点。假如酒店推行这种做法，即使被士人所耻笑，但还没大的害处。倘若赋税局推行这个剩赏钱，必然在规定征收的税款以外，又刻剥不止，行路之人受害匪浅。我早晚想上此奏，求请罢除剩赏钱，也望相公您留意。

### 3. 反对施行或废除“免役法”

苏轼主张“法无新旧，以良为是。”即不以是新法还是旧法来判断它的好坏，而是以是否有利于百姓有利于国家来判断它的好坏，税法亦然。

苏轼先是反对王安石推行免役法，后来又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这是为什么呢？

王安石实行的免役法，是对差役法的一种改革，其目的在于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苏轼批评免役法，并非要维护差役法，反对改革差役法，而是因为免役法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苏轼签判凤翔执行的是差役法；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时执行的是免役法；知密州时推行过给田募役法。以百姓利益作为衡量标准，苏轼对差役法、免役法和募役法，既有理性思考，又有实践经验，对这些役法的长短利弊可谓了然于胸，这是其他官吏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他认为差役法害民最深、免役法弊端不少，只有给田募役法稍微有利于百姓。因此，他刚刚从登州回到朝廷，就草拟了《论给田募役状》<sup>[5]3011</sup>。

苏轼回到朝廷，司马光与他谈论当今要务，一条一条地讲他即将要做的事情。苏轼听出来了，他就是要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全部推翻，恢复熙宁变法之前的做法。苏轼说，您想做的各种事情，都是上顺天心、下合民意的，只有役法一事，请不要轻易议定。苏轼为什么要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

恢复差役法呢？差役与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在于搜刮民财，致使民间十室九空，钱都聚集到官方，民间却闹钱荒；差役之害在于百姓常为官方服役，不能专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些小官吏还钻空子敲诈他们。这两害的轻重大略相等。用差役法代替免役法，就等于用这一害换另一害。

除此之外，苏轼在《策别安万民四》中<sup>[5]848</sup>说：

是以数十年来，天下之赋，大抵混乱，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以至于破败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赋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

苏轼主张防止“兼并之族”既兼并土地而又逃避赋税。他说，几十年来，国家赋税混乱不堪，兼并之族赋甚轻，而贫弱之家却不免于重赋，有的甚至破产逃亡，不知到哪里去了，而赋税还留着。这种情况不是一件两件，而是“天下皆是”。他主张根据买卖田地的契约来转移田赋，以防止兼并之族“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赋”。

另外，关于税收中的“折变”，即把米折变为钱、把钱折变为米，苏轼认为折变应该有利于百姓，而不是想方设法盘剥百姓。苏轼在《论给田募役状》<sup>[5]3011</sup>、《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sup>[5]3600</sup>、《与孙知损运使书》<sup>[5]5278</sup>、《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其四十七）<sup>[5]5949</sup>等文章中提及“折变”问题。苏轼在《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其四十九）<sup>[5]5949</sup>中说：

谨按《编敕》：“支移、折变，令转运司相视丰歉，务从民便。”详此敕意，专务便民，丰则纳米，歉则纳钱。今乃反之，违条甚矣。某切谓提刑、提举司当依敕文检坐此条，改正施行。

意思是按照《编敕》所说，支移和折变的具体实行，让转运司根据丰收或欠收的情况而定，一定要与民方便。推究敕文的用意，是一心致力于方便民众，丰收了就交米，欠收了就交钱。如今却反其道而行，也太违背敕文的精神了。我个人认为提刑司、提举司应当依照敕文检查落实这一条，改正施行。

总而言之，我认为苏轼的赋税观是：反对苛税，主张薄赋税；反对弊税，主张较赋税。

#### 注释

[1] 许慎著，班吉庆、王剑、王华宝点校《说文解字校订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2] 《康熙字典》，中华书局1958年版。

[3]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年版。

[5]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刘清泉，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书名：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的心路依归研究  
作者：陆雪芹  
出版：九州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  
开本：880mm×1230mm  
印张：10  
页码：301页  
定价：29.00元

# 黄州出土苏轼乳母墓志及铭文定本考

梁敢雄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明、清、民国印行的本地志书为何不按出土的乳母墓志原刻铭文收录的原因，论证了在历代流传的乳母墓志铭种种文本者，何者为苏轼书法真迹、何者才是苏轼认可的定本？并对乳母铭几处异文作了辨析。

**关键词** 乳母任氏 墓志 拓本 文本

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苏轼贬到了黄州，八月苏轼乳母任氏逝于临皋亭。苏轼将其安葬于黄州城外东阜上。乳母逝世后，苏轼为其亲撰墓志铭文。除此志文外，苏轼至少有几个月没有再提笔。老友王定国求书，苏轼便重书此铭文给他。明代隆庆初，农民耕土时才发现了苏轼乳母墓志。据万历三十六年的《黄冈县志》卷一记载：“（乳母任氏墓志石）国朝隆庆间为人掘出，郡为封墓而建亭其上，志石归于藏。”

## 一、明清对黄州出土苏轼乳母墓志的评价

该墓志在黄州出土后，全国轰动。当时就有文人、名家对此事作了介绍与评论。上元（今南京）人周晖在《续金陵琐事》中称：“东坡先生《乳母任氏墓志铭》，嘉靖末年方出于地中（嘉靖末与隆庆相连，周晖未见到刻印不久的《黄冈县志》，容所述时间微有偏差）。黄州太守因拓者甚众，恐损其石，遂收入库。吾乡一老儒云：此片石，一生是行的墓库运。”<sup>[1]242~243</sup>晚明文坛领袖王世贞在其《东坡乳母铭》文中给予了高度评价曰：“苏轼乳母铭此刻在黄州，近有人于土中得之。盖子瞻亲书于石者以故。比他书尤古遒劲，其用墨过丰，则颜平原之遗轨也。”清代金石名著《寰宇访碑录》第七卷，据“浙江仁和赵氏拓本”著录了此墓志铭称：“苏轼撰，正书。元丰三年十月。明隆庆时重刻。”结合以上诸文献介绍，当年的情况似大致如下：

明隆庆元年（1867）苏轼手书乳母墓志被黄州人无意从土中挖出而轰动一时。人们纷纷前来攀拓此墓志铭，黄州官府担心墓志石受损便将它收藏入库，而翻刻了一块新的供人攀拓的墓志石，立于已填平的墓志出土处，并建亭其上以护之。由于攀刻逼真，新刻的墓志与原墓志的规格、大小及苏轼笔迹完全一样，故人们来此攀拓重刻的乳母墓志铭的热情不减，其拓本之一被浙江仁和县赵氏收藏。清代大家孙星衍的《访碑录》便是据此拓本著录的。

## 二、黄州文献为何不按原刻收录铭文

石刻苏轼乳母墓志及其拓本一直在黄州流传，石刻今嵌在黄州赤壁留仙阁壁上，较早时的拓本则见本文附录1。万历《黄冈县志》不仅在其《古迹门》介绍了乳母任氏墓志出土的情况，还在《艺文门》中收录了这篇铭文。依常理而言，万历《县志·艺文门》应该按照出土的乳母墓志上的铭文收录，即二者文字应该完全相同才是。然而将县志所录铭文与志石铭文对照，前者竟然出现了两处异文。即志石中“眉之眉山人”与“父遂母李”分别被县志所录铭文改为了“蜀之眉山人”与“父遂母李氏”。光绪十年（1884）《黄州府志·金石门》收录了标题为《乳母任氏墓志铭苏轼撰并书》（碑见存府署），与万历《县志》所录铭文的文字完全一致，存在相同的两处异文。1932年出版、由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题写书名的《黄州赤壁集》也收录了这份原书写于本地，并出土于本地的乳母任氏墓志铭。然而其所录铭文与墓志铭文比照，除沿袭了万历《县志》中的两处异文外，更多出了一处异文：又把出土墓志中“享年”改为了“享寿”。<sup>[2]303</sup>直到1996年黄冈人编辑的《苏轼在黄州作品全编》收录的此墓志铭，才较万历《县志》减少了一处异文，只有一处

异文——即将“母李”增补为“母李氏”<sup>[3]257</sup>。身边就有出土的乳母任氏墓志铭石刻与其拓本，万历《县志》、光绪《府志》、民国《黄州赤壁集》以及现代出版的《苏轼在黄作品全编》的编者，为什么不遵照出土的乳母任氏墓志原有的铭文收录而分别出现不同情况的异文呢？窃以为这是由于自宋以来乳母任氏墓志铭早已在许多种公开流行的有关苏轼的文集上刊发了，黄州这四种较权威的文献之编者似乎认为：晚明出土的乳母墓志上的铭文只是苏轼的初稿，而墓志出土前便流传下来的乳母任氏墓志铭文本很可能是依据苏轼后来书写给友人的文本，或者是经苏轼手订抑或过目认可的文本发表的。故都不以出土乳母墓志上的铭文初稿为准，而择其在社会流传的苏轼集子中之善者而从之（依据的是哪种集子则未注明）。但显然，黄州明清、民国、现代的文献之异文分别有两处、三处、一处之不同，它们依据的苏文集子当然有不同。究竟以哪种异文为善、为真呢？上举黄州四种文献并无客观统一的标准，而是各自择取。

志铭出土的黄州文献收录该墓志铭尚且如此，社会上自宋以来出版的多种苏东坡的文集、全集不胜枚举，其收录了乳母任氏墓志铭者存在着种种异文（与黄州出土的任氏墓志铭原文相比）自然在情理之中。对社会上流传的种种异文，本文不一一罗列，仅举出异文最少的、也是很权威的一种——孔凡礼重编校注的《苏轼文集》。该文集中乳母任氏墓志铭仅有一处异文：即紧接“父遂母李”后，增加了一个“氏”字<sup>[4]433</sup>。至于黄州现存墓志与其拓本的铭文上方横排标题只有“乳母任氏墓志”六字，而各种文献、书籍所录铭文的标题都变成了“乳母任氏墓志铭”七字，则算不上异文。因为前者是对整个墓志石的标名，后者诸书收录时对墓志石的规格、尺寸等等一字不提仅录入铭文而已，故编者自当在名称“乳母任氏墓志”后加上一个“铭”字才行。

### 三、历代流传的文本中，哪种是真迹，哪种是苏轼认可

黄州现存的乳母任氏墓志石刻、拓本和社

会上流传的种种苏子文集中，哪种才是苏轼书法真迹？又应该以哪种乳母任氏墓志铭的文本为准或者说为定本呢？笔者以为除影抄、影印外，凡刻印、排印的印刷物显然不能成为某人书法真迹的载体，故以规定字体印刷的各种文集均应排除在苏轼书法真迹之外。隆庆时在黄州出土并被翻刻的乳母任氏墓志及其拓本一直在黄州流传未绝，其石刻今嵌在黄州赤壁留仙阁壁上，且另有较早期的拓本尚存（见附录1），这当然是苏轼书法真迹。但鉴于铭文初稿刻于墓志入葬后至出土前，仍有大量文献刊发了有不少异文的乳母任氏墓志铭，故不能排除该铭又有经苏轼作过文字加工的新文本出现。因此黄州出土的苏轼亲书乳母任氏墓志铭，仍算不上是苏轼认可的定本。

苏辙在其兄逝世后，翌年入葬前撰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称：轼著“有东坡集 40 卷、后集 20 卷、奏议 15 卷，内制 10 卷，外制 3 卷……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 4 卷”等等。这些基本上应在苏轼生前已印行。宋人邵博《闻见后录》卷十九称苏轼之孙“苏仲虎言：有以澄心纸求东坡书者。令仲虎取京师印本《东坡集》，诵其中诗，即书之。”《四库提要》考定为“京师印本《东坡集》，苏轼自校其……字误者，不更见于他书。”<sup>[5]1360</sup>这就是说苏轼健在时，至少苏辙所撰铭文中提到的《东坡集》是经过苏轼本人校订文字的，而乳母任氏墓志铭正是《东坡集》中的一篇。苏文的宋、元集子佚失殆尽，仅有极少量残卷、残页珍藏于海内外少数大图书馆内。现存刊刻最古、保存最完整的《苏东坡全集》，为明成化四年（1468）江西吉州知府程宗编刻的《东坡七集》。收有乳母任氏墓志铭的《东坡集》便是其中的首集。程宗所编前六集的底本为宋代曹训旧刻本，其内容正是苏辙所撰铭文中提到《东坡集》40 卷、《东坡后集》20 卷、《奏议》15 卷、《内制》10 卷、《外制》3 卷与宋代《郡斋读书志》著录的《应诏》集 10 卷。程宗未打散而将原来的各集合编于一书中，合计六种集子共 98 卷。唯有排在最后的第七种集子是程宗重编的，除取自曹训旧本中的“和陶诗”120 首外，还补充了曹训本所无，由明早期洪熙时从麻沙书坊私刻的大全集中搜辑出的苏轼的大量佚文、佚诗、佚

束等等,题名《续集》编为12卷。全书总标题《苏东坡全集》总共110卷<sup>[6]</sup>。曾由苏轼手订的《东坡集》40卷便是其首集,该集的第39卷则收入了乳母任氏墓志铭。如果认可宋代曹训旧刻本中的《东坡集》当是依照至少苏轼认可的本子重刻的话,那么程宗于吉州重刻的《东坡七集》前六集(唯其续集系重编)中的《东坡集》,则应当视为苏轼认可过的《东坡集》之传本。故而收入该《东坡集》内的乳母任氏墓志铭则应该视为苏轼认可的定本。换言之,乳母任氏墓志铭当以现存明成化吉州刻本《苏东坡全集·东坡集》中收录者为定本。民国时出版的《四部备要》则把经缪荃孙批校过的吉州刻本《东坡七集》收进了这部丛书中,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四部备要》中缪荃孙校本编入了《四部精要》丛书中。前举孔老重新编注的《苏轼文集》中的乳母任氏墓志铭当源自成化吉州《东坡七集》刻本。丁永淮等1996年编注的《苏东坡在黄州作品全编》收入的乳母墓志铭<sup>[3]257</sup>,系直接从孔编《苏轼文集》中录入。此即苏轼认可的乳母任氏墓志铭定本自宋代至今的大致传承。

#### 四、定本中“氏”字系苏轼增补,其他异文系后人臆改

毫无疑问,黄州出土的乳母墓志铭是苏轼的初稿。将其与上举定本对照,定本仅见一处异文:出土志铭中“父遂母李”,其遂为父名,李为母姓,父名与母姓相连对举,语意别扭,补上一氏字,把“母李”增之为“母李氏”,文句便通顺了,既然收入了乳母任氏墓志铭的《东坡集》京师本经苏轼手订且在苏轼生前已经印行,那么苏轼在世时此处已补上的“氏”字,恐非他人所敢擅改而当系苏轼自补。黄州墓志铭初稿也仅此一处稍有小瑕,其他文字均无问题,苏轼无必要再作其他修订。流行苏文集子中其他种种异文恐均系后人臆改。

今举其他两处异文为例。万历《黄冈县志》与光绪《黄冈府志》将出土墓志中“眉之眉山人”改为“蜀之眉山人”,这也是苏子诸文集中最典型、也是最常见的一处异文。笔者可以肯定它必是后人臆改的。也许本地的府、县志

编者鉴于苏轼在黄大量文书中,未发现苏轼把黄冈县人称为黄之黄冈人之例,而有此修改。但却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先看苏轼在其《亡妻王氏墓志铭》中对出生于眉州青神县的妻子王弗,便称之“眉之青神人”、“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sup>[5]685</sup>,与乳母墓志铭中称乳母为“眉之眉山人”、“葬于黄之东阜、黄冈县北”的句法结构几乎完全一样!查《宋史·地理志五·成都府路》下的眉州辖有四县,上举两铭中提到的眉山、青神、彭山便是其中的三县。两铭分别用“眉之某某人”来记载了妻子王弗与乳母任氏的州、县籍贯,都将两人州籍的眉州,简称为眉且与其辖县名相连。因此州名眉,显然不可改为蜀。其次,对照乳母铭将“葬于黄之东阜”置于黄冈县前,而《亡妻铭》将“葬于眉之东北”置于彭山县前。由于前者“黄”指辖管黄冈县的黄州,那么与之对应的后者,“眉”显然只能指辖管彭山县的眉州了。故苏轼绝不会把将“眉”改为“蜀”。

另一处,即包括《黄州赤壁集》在内、收录有乳母墓志铭的集子竟将乳母逝于七十二岁之“享年”改为“享寿”,似乎搞错了时空,以嫁今人之说于古人,有点滑稽。因为自东汉蔡邕撰《郭有道碑文》中称“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sup>[7]801</sup>、欧阳修著录《后汉熊君碑》曰“建安二十一年卒,享年七十有一”<sup>[8]477</sup>起,历唐、宋至今“享年”是一个愈来愈流行的敬辞。它指逝世的人已活的岁数。同样指具体人逝世时的年龄通常接虚龄数字的“享寿”,作为“享年”的同义词却晚至近代才出现,主要流行于台、港地区。故不仅大陆的《汉语大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都只收录了“享年”而不收“享寿”,连收古文辞较多的《辞源》也只收录前者而不收录后者!笔者核查过手头的资料:如总集中梁昭明《文选》中有两处“享年”、《骈体文抄》(收先秦至隋代的骈文)与《古文观止》各有一处“享年”;唐代别集中的《韩昌黎集》“享年”凡四见,《柳河东集》则十二见,以上五种文献都未出现“享寿”一词。以上只是列举由汉至唐尚无词组“享寿”出现的例证。当然只有苏轼本人的作品最有说服力,与苏轼同时代大家的文集也有较高的旁证力。我早年收藏的《四部精要》其第19

册正载有《欧阳文忠公集》和缪荃孙批校的《东坡七集》。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核查过上举《欧集》，因该集中有十多卷专收墓志铭、神道碑，故其提到“享年”竟多达一百多处，却一次也未使用“享寿”。该集中已频繁使用早出现于《诗经》中形容高寿之词“寿考”，有两次使用动宾结构的词组“享寿考”曰“宜享寿考”与“享寿考而有终”。这两处均为享受高寿之意，而非今人使用的“享寿”一词。经仔细地核查：在《东坡七集》中的《司马温公行状》<sup>[8]679</sup>、《富郑公神道碑》<sup>[8]681</sup>、《司马温公神道碑》<sup>[8]683</sup>、《范景仁墓志铭》<sup>[8]685</sup>、《张文定公墓志铭》<sup>[8]732</sup>、《王子立墓志铭》<sup>[8]733</sup>、《赵康靖公墓志铭》<sup>[8]734</sup>、《刘夫人墓志铭》<sup>[8]925</sup>、《陈公弼传》<sup>[8]672</sup>、《书金光明经后》<sup>[8]736</sup>及《苏廷评行状》都使用有“享年”一词，均下接年龄数“几十几”或“几十有几”。综观此全集中苏轼称逝者已活的年龄，有两种形式：一种为“享年几十几”；一种为“年几十几”。前一形式已见上举。后一形式如《朝云墓志铭》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sup>[8]925</sup>、《保母杨氏墓志铭》曰“年六十八”<sup>[8]685</sup>、《宝月大师塔铭》云“年八十四”<sup>[8]736</sup>、《陆道士墓志铭》云“年五十”<sup>[8]736</sup>等等。总之从来没有使用过“享寿”一词。由此足见有些乳母任氏墓志铭文本将其中“享年”改为“享寿”，绝非出自苏轼笔下，甚至亦非宋人所为，只可能是近人臆改的。

至于在互联网上搜索“享寿”，显示出介绍唐代徐彦伯的《南郊赋》曰：“享寿千亿，传无穷兮。”使人以为今天台港流行的享寿一词早在唐代徐彦伯已使用过了。史实是南郊圜丘祭天，是唐代皇帝的重大祭祀礼仪，杜甫亦早上过《有事于南郊赋》。如《旧唐书》所言“景龙三年，中宗亲拜南郊”，时为昭文馆学士徐彦伯则作《南郊赋》以献。该赋文辞华美，对唐王朝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赋文中“享寿千亿，传无穷兮”，显然是祝福李唐王朝代代相传，享国千亿载。此处“享寿千亿”的主体是王朝、国运，并非指包括皇帝在内的个人。皇上充其量只称万岁而从未称其寿千亿。赋中言及的“享寿”与今天台、港流行的称逝世者

活在时年龄的“享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岂能以近人的习俗称谓转嫁在唐人名下。

### 注释

- [1] (明)周晖《金陵琐事》《续金陵琐事》，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
- [2] 汪荣《黄州赤壁集》，汉上中西印务馆印行1932年版。
- [3] 丁永淮等编注《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
- [4] 孔凡礼校注《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 [5]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
- [6] (明)程宗编《苏东坡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 [7] (梁)昭明太子编《文选》(全三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
- [8] 《四部精要》第19册。

### 附录1 清代旧拓碑帖：苏轼手书乳母任氏墓志铭



按：此帖，较建国之后才嵌于赤壁留仙阁壁上翻刻的乳母任氏墓志铭要早。此帖中“官于杭”之“于”字未错，明显与同帖中三处“子”字不同。帖中“黄之临皋亭”中的“之”也较壁上墓志中对应处的“之”字不清，又似“州”字为胜。

梁敢雄，黄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冈市政协文史专员。

# 苏轼与佛禅

晏 飞

**内容提要** 本文从苏轼参禅的前因后果、交往的禅僧大师、诗词中的禅理机锋三个方面出发，论述了苏轼与佛禅的因缘和苏轼参禅的特点。

**关键词** 苏轼 佛禅 因缘 特点

佛禅，是以禅作为主要修行方式的一个佛教流派，亦称禅宗。据说，佛禅的创立，来源于灵山法会上释迦牟尼佛祖与迦叶尊者之间一种心灵的默契。佛祖因此把“佛法”交付给了迦叶尊者。这种“佛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佛禅由此开创。

南北朝时，迦叶尊者第28代传人菩提达摩，从印度来到中土，将佛禅传入中国，成为中土佛禅的初祖。菩提达摩后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五代，“一花开五叶”后，传至六祖惠能，便“结果自然成”了。惠能开创的南宗禅，由于更加注重了人的本心，强调修行中人自身的力量，因此使得南宗禅成为一种极具亲和力的“方便法门”，在惠能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南宗禅被认为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发展壮大，对唐代以后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以及世俗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从佛禅传入中国以后，便与历代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佛禅对内心的看重，对智慧的寻求，对身外事物的淡泊，深深吸引着文人雅士们的高贵、敏锐并常常带着失意伤感的心灵。佛禅为他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使他们的精神得以自由飞扬。而在中国佛教史上，也出现过许多学问渊博的高僧，像东晋时期庐山东林寺的开山祖慧远大师就是一例。慧远大师通晓六经，尤其精熟于《易经》与《老》、《庄》。因此缘故，他在任东林寺主持期间，吸引了许多天下名僧名士齐聚于此。他创立的“白莲社”，参加的僧俗大众共有130余人。他在东林寺30年，“影不出山，迹不入市”，为佛教经典的研究、整理与弘讲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东林寺在当时便成为南方的佛教重镇，与鸠摩罗什所在的长安，并称中国的两大佛教中心。从那时起，

东林寺与文人的因缘连绵不断，历史上的许多文人名士，如陶渊明、孟浩然、白居易，以及苏轼等，都曾先后在东林寺留下影迹。而苏轼，正是这些文人中最具才华、最富魅力的一个。

## 一、苏轼参禅的前因后果

苏轼的家乡四川，可以说是一个天府佛国。他出生地眉州，紧邻着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峨眉山，并且离著名的乐山大佛也不远。又因为这里有秦岭与中原相隔，战祸较少，所以保存了许多佛寺、经卷文物。这是苏轼与佛禅的地理因缘。

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高中进士以后，有一次路经忠州的屈原塔时，面对前贤的遗迹，不禁心潮起伏，提笔写下《屈原塔》<sup>〔1〕22</sup>：

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  
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  
南宾旧属楚，山上有遗塔。  
应是奉佛人，恐子就沦灭。  
此事虽无凭，此意固已切。  
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析。  
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  
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

这是苏轼在歌颂屈原，也是在表明自己的心迹。他在踏上仕途的伊始，就已经懂得了世界上有许多东西，虽然眩目，但并不长久；另外还有一些东西，虽然艰难，但值得为之努力一生。

苏轼从22岁进士及第，至44岁遭遇“乌台诗案”，22年间，除少数几年担任“京官”外，其余的岁月，都是在“外放”中度过的。他先后担任过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的地方长官，在这些地方，他修水利、开病坊、捕盗贼、赈灾民，为百姓办了许多实事、好事。除了这些有口皆碑的政绩之外，还在民间留下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他为一位带孝的老实后生在白团扇上题诗作画，让他出售后来去偿还债务；他把朋友送给他的一笔“礼金”，

全部转送给了“安乐坊”(公共医院),还得意地告诉朋友这是“公事公办”;他常“微服私访”,出城巡视,了解民间疾苦,每每会在路旁草丛里发现啼哭的弃婴,便将他们带回由官府抚养;当他得知有位女仆在井边洗衣没能照看好主人家的孩子,致使小孩坠井而亡、女仆因此被判死刑时,他深感惋惜,却又无能为力……所有这些,都让他看到了官场险恶,人情淡薄。他开始萌生出远离官场、归隐山野、安度余生的愿景。他在熙宁六年(1073)所作的《新城道中二首》其二<sup>[1] 436</sup>中这样写道:

身世悠悠我此行,溪边委轡听溪声。  
散材畏见搜林斧,疲马思闻卷旆钲。  
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  
人间岐路知多少,试向桑田问耦耕。

在这首诗里,苏轼把自己比作“散材”、“疲马”。所谓“散材”,是指《庄子》中所说的一种树木,它生长在广袤的原野上,看上去高大舒展,却不适合作屋梁和家具。他自谓就是那种不材之木,因此畏惧匠人的砍伐;也如同疲惫不堪的老马,渴望结束征战,回归山野。虽然出仕做官,经国济世,也并非一定是“岐路”,但是这条路对人的种种束缚和扭曲,却也如同桎梏,令人痛苦不堪。

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先后上书,状告苏轼诗文中多有诽谤朝政的地方,要求将他撤职查办。舒亶更提出应当把苏轼诗文中所涉及到的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十人全部处死,把朝中的“旧党”一网打尽。他们还煞费苦心地收集了苏轼的三卷诗文作为“罪证”。其实,这些“罪证”,除了有极少数是缘事而发,议论新法实施中某些不合理之处外,绝大多数都是无中生有,恶意编造。但是由于新党连章弹劾,神宗只得御批御史台查办。当时苏轼正在湖州作知州,在沿途百姓们的哭声里,他被押上了官船,押解到了北宋的国都汴京。

苏轼到达汴京后,被关押在御史台监狱里。在这里,他受到了政敌们的侮辱欺凌、严刑逼供。但他自始至终没有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他保持着自己的气节,不允许有丝毫玷污,哪怕因此而遭到流放的命运也决不后悔。由于在御史台的大院里,种植了许多硕大的柏树,树上栖息着上千只乌鸦,因此御史台就有了一个“乌台”的别称,而苏轼遭到的这场冤枉官司,在历史上就被称作“乌台诗案”。

在这段被关押的日子里,苏轼反省了自己生命中的每个历程。他曾经是那么风光,文才传遍了整个京城;他胸中有万卷诗书,一下笔总是那么意气飞扬;他做过不少地方的父母官,受到百姓们交口称赞;就是下诏逮捕他的神宗皇帝,对他的文才也是刮目相看。但是,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自己身陷囹圄,前途未卜。直到这一年的年底才离开监狱,改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发往黄州安置。这是苏轼人生道路上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也是他开始接受佛禅的外因。

苏轼不是佛教徒,甚至连在家修行的居士也不是,但他却有着善良慈悲的心肠。这种慈悲心肠,就是他能与佛禅结缘的真正基础。因为真正的慈悲,是能够做到忘却自我、顺其自然。当他在二十余载的仕途生涯中发现自己的外在表现已经无法与内心保持一致时,他深感惊讶、不安和痛苦,他决心努力找回自我、回归本心,并且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佛禅,作为他精神的依托、生命的依托。

## 二、苏轼交往的禅僧大师

北宋初期的朝廷,对佛教采取了许多保护政策,到天禧五年(1021)时,天下僧尼已发展到46万余人,寺院近4万所。据史料记载,仅杭州西湖四周就有各种形式的寺庙360处,真可谓是盛况空前。苏轼一生中,交往过的禅僧大师少说也有二三十人,见于各种野史笔记、有名有姓的就有惠思、清顺、道潜(参寥子)、可久、辩才、云阁梨、守诠、思聪、佛印、玉泉、常总等人,其中尤以道潜与佛印两位与苏轼过从密切,情谊深厚。

元丰元年(1078),苏轼神交已久的道潜禅师来到徐州,与苏轼相聚。在这段知交相聚的日子里,两人朝夕相处,谈学论道,给后人留下许多佳话,像“放生鲤鱼”就是其中的一则:有一天,两人正在书房论道。突然有位苏轼的熟人送来一条鲜活的大红鲤鱼,请他品尝。苏轼感到进退两难,稍加沉思,便与道潜走出书房,带着这条大红鲤鱼来到城外的百步洪边,将它放进了水里。事后,道潜作了一首诗,记载这件事情的始末:

嘉鱼满盘初出水,尚有青萍点红尾。  
银鳃戢戢畏烹煎,倔强有时俄自起……  
传呼慎勿付庖人,百步洪边放清泚。

苏轼读过后,也和了一首《次韵潜师放鱼》<sup>[1]</sup>

法师说法临泗水，无数天花随尘尾。  
劝将净业种西方，莫待梦中呼起起。  
哀哉若鱼竟坐口，远愧知几移生醴。  
况逢孟简对卢仝，不怕校人欺子美。  
疲民尚作鱼尾赤，数罟未除吾颡泚。……

苏轼把这次放生的举动归功于道潜禅师的感化。因为在佛教的基本戒律中，“不杀生”是非常重要的。在他看来，放生鲤鱼，及时行善，便是在修“世福”，以免犯下杀生的过错。世上众生，虽然不一定是佛门弟子，但是都应当做一个善良慈悲的人。

苏轼因“乌台诗案”，于元丰三年（1080）被贬往黄州。在这里，他与离黄州不远的金山寺的住持佛印了元禅师过从甚密，两人之间的参禅论道，同样留下了许多佳话。其中非常著名的一则故事，就是关于“玉带”的公案：某日苏轼去拜访佛印，佛印开玩笑说，我这里没有您的座位，居士您就请便吧。苏轼接过佛印的话说，那么我就借您的“四大”作为我的座榻吧。佛印正色说，在下有一个问题，居士如果回答正确就请坐，如果答不出来，就必须留下您腰间的玉带。佛印的問道：居士您要借我的“四大”作座位，只是出家人“四大非有，五蕴皆空”，您要往哪里坐呢？苏轼知道自己在佛理的领悟上远逊佛印，只得留下玉带。佛印则把云山衲衣回赠给苏轼。

事后，苏轼作了三首偈子<sup>〔1〕1267</sup>：

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  
是故东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禅床。  
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  
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  
此带阅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  
锦袍错落差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  
为这场“玉带公案”，佛印也作了两首偈子：  
石霜夺得裴休笏，三百年来众口夸；  
争似苏公留玉带，长和明月共无瑕。  
荆山卞氏三朝献，赵国相如万死回。  
至宝只应天子用，因何留在小蓬莱。

“四大非有，五蕴皆空”，是禅宗基本的理念之一，这是为了破除修行者对事物的执着而言的。方外之人的苏轼，其时尚未能够把禅理完全参透。如果真的是破除了一切执着，那么佛印所说的“四大非有，五蕴皆空”，也只不过是一种话语，一种

“名相”，同样也是“空幻”的。既然是四大为空，那么且向空中坐，这便是“随缘自适”。

### 三、苏轼诗词的禅理机锋

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人生运势到了谷底，但他泰然自若，在这段时间里写出了许多篇脍炙人口的诗文，流传至今，像著名的《定风波》<sup>〔2〕351</sup>词就是其中之一：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时的苏轼，竹杖芒鞋，一蓑烟雨，无所畏惧。贵如王侯，贱如草民，在他眼里，都是一样。回首坎坷人生路，“也无风雨也无晴”。在御史台监狱里，他曾经灰心丧气到极点，而现在，他已经能够“一蓑烟雨任平生”，再也不会悲观失望了。这一转变，正标志着他的“禅境”又提高了一个层次。在黄州，他修筑了“东坡雪堂”，并自号东坡居士。除了这首《定风波》外，他还写了《念奴娇》（大江东去），以及《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两篇赤壁记游之作，这些都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他在这些作品里触景生情，借古讽今，抒写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颇有禅者旷达潇洒之风。

五年后，神宗亲自下诏，把他调离黄州，到离开京城较近的汝州任职。苏轼在调任途中，顺道参访庐山，并在离开东林寺不远的西林寺欣然命笔，写出了著名的《题西林壁》<sup>〔1〕1219</sup>：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这首七绝，常人皆以写景诗看待，其实蕴涵着深刻的佛理。他从自己这段人生低谷中领悟到：人人皆有佛性，只看你有没有信心、敢不敢承担？因为，生命中的所有挑战自己都要负责，没有什么神佛菩萨可以依靠。

那晚，他投宿庐山东林寺，与常总禅师彻夜长谈，颇有所悟。第二天一早，呈上一偈，这便是后世争论不休的《赠东林总长老》<sup>〔1〕1218</sup>：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所谓“广长舌”，是指佛教中所说的佛化身的三十二种庄严相之一。它柔软细薄，伸出来可以覆

盖整个面部，是佛善于说法的象征。“清净身”则是指清净法身，是佛法的人格化。苏轼在这首诗中说，山间淙淙的溪水，都是在宣讲着微妙的佛法；眼前连绵的青山，都是佛的智慧慈悲的显露。一夜之间，流水说出了无限多的偈子，我这凡人之舌，又怎么能把它们全部宣示于众呢？

遭遇“乌台诗案”以及随后的被贬黄州，是苏轼诗词创作、人生态度的分水岭。同时，在“玄学”的理解和运用方面，也更趋成熟，更具禅味。他在《书鄮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sup>[1] 1525</sup>中，谈论了诗画“形”与“神”的关系，就是一例：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  
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  
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苏轼在诗里说，评画如果以“形似”为标准，就是很浅薄的见解；做诗如果只是平实的描写，就不是一个高明的诗人。唐朝的边鸾，宋初的赵昌，擅长“写生”，但是那种如实的描摹，远不如王主簿的这两幅画，能以疏淡的笔墨传达出无限的韵味。因此，苏轼主张，富有禅心的中国文人，应当重“神”过于重“形”。因为外界的观察描摹，远不及内心的婉转求索重要。此外，苏轼还有一首关于音律的偈子《书彦正判官一首》<sup>(3) 1729</sup>，更有意思：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苏轼的这首偈子，曾被历代文人视为宋诗中富有“理趣”的代表之作。这种“理趣”，虽有老庄之理，但更多的还是禅理。琴声到底起于何处？是琴自己发出的吗？可是匣里的琴只能寂然无声。是弹琴人指上发出的吗？可是离开了琴，弹琴人的指上也只能毫无音响。只有当琴与指因缘相合，遂有琴声。琴与指因缘相离，琴声遂灭。琴声的“生”，只是暂时的“生”；琴声的“灭”，也只是暂时的“灭”。所以，琴声的有无，完全取决于外境因缘的变化。但是，因缘总是短暂空幻的，因此，“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声”才是根本的真实。

苏轼喜好佛禅，并自命“居士”，他的许多“禅言”还被收入禅门语录，他本人也被看作是临济宗黄龙派的门下。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他的一些作为，在严守清规戒

律的僧人看来，简直是惊世骇俗。这里可举一例：他在杭州做官时，有一次竟然带着伎女去拜访禅师，还即兴作了一首《南歌子》<sup>[2] 592</sup>，让伎女弹唱：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禅师听明白了曲中传出来的道理，阴云密布的脸上现出了笑容。事后，他还得意洋洋地对他人说，他给禅师上了一堂“密宗佛课”。由此可见，苏轼的禅境，遵循的是类似现代“生活禅”的理念，它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可能被多数佛教徒所接受，因此不足为怪。

同样，参禅后的苏轼，在对待自己政敌的态度上，也能做到慈悲大度，异于常人。他在离开黄州去往汝州的途中，路过金陵时，还特地去拜访了退居在家的王安石，两人谈诗论文，互赠手书，颇为相得。王安石劝他在金陵购地定居，他表示自己也很想和这位前辈做邻居，只是自觉世事未了，尚难从命。他赠诗《次王荆公四绝》其三<sup>(1) 1251</sup>，以表心迹：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诗里既有对王安石当年风采的仰慕，也有对王安石如今境遇的同情和不平，以及两人惺惺相惜的情感。苏轼这种宽广洒脱的胸怀，既往不咎的气量，正是禅者应当具有的慈悲心肠。

哲宗绍圣元年（1094），苏轼再次遭贬。在南迁的途中，他特地绕道广东曹溪南华寺，去瞻仰此处禅宗六祖惠能聚众说法、光大南宗禅的圣地。在这里，他见到了六祖大师的漆纁真身神色安详地端坐于塔中。一种神圣的情感，从他心底油然而生，于是便有了这首《南华寺》<sup>[1] 2060</sup>诗作：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  
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  
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  
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  
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  
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在这首诗里，苏轼运用了不少禅门的话语。“本来面”，是禅宗用来指清静本性的词语。这一本性，

人人皆有，却因世间的是是非非，纷然于怀，因此本性才会暗昧不明。“明上座”说的是六祖得传衣钵的故事。“饮水自知”是指参禅能否豁然开朗、明心见性，就如同自己饮水，冷暖自知。“指月无眩”，是说有人用手指圈成个圈对着月亮，愚昧者便以为指中的月亮是真的月亮；其实他看到的只是“第二月”，并非真月。苏轼的这首在禅宗祖庭所作的诗，一反过去谈禅诗的飞扬洒脱、风趣幽默的风格，写得又“平”又“直”。然而，这种“平”、“直”，却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诚恳而激动的心态。因此，这首诗也是他所有谈禅诗中写得最严肃的一首。

面对六祖的真身，苏轼泪如雨下。千百年来，也正是因为这些真诚的泪水、真诚的诗句，他才得以被视为是一个真正的禅者。

#### 四、结束语

2002年10月，台湾组织了一个由圣严法师作总领队、500余位善男信女作成员的大陆佛教古迹巡礼团，历时半月，行程六省，观光了26个古道场，作了一次空前规模的“禅宗溯源之旅”，一时传为美谈。

巡礼团以禅宗初祖达摩从印度东渡来到中国后的第一站光孝寺开始，以弘一法师圆寂的泉州开元寺作终点。在近代中国佛教的历史上，弘一法师享有崇高的声誉。甚至，有人这样夸张地评价这位历史人物：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整个中国文化是一个感叹号的话，那么，从神农伏羲到孔孟老庄、唐宋元明清，就是感叹号上面那个饱满的部分，而弘一法师就是下面那一个圆点。没有那一点，感叹号就不成其为感叹号；而就在那一点里面，包含了整个感叹号。

其实，中国的禅宗，所倡导的只是一种佛教的修行方式，希望通过内心的宁静安定而获得应对宇宙人生的智慧。它讲“破执”，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皆由因缘和合而生，缘散则归于寂灭；生灭离合，正如浮云闪电，因此无需贪恋执着。它讲“智慧”，认为应当祛除对外境的欲念，恢复清静明朗的本性；努力消除尘世间的焦躁，让生命坦荡从容。它讲“慈悲”，认为应当以宽容博大的心，面对世间人事；努力做到既无执于“物”，也无执于“我”，自然而然地与世界融为一体。一言以蔽之，禅即是

要发现并呵护一切有情终生的心愿。

近代禅宗中产生“生活禅”一说。所谓“生活禅”，即是将禅的精神、禅的智慧普遍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实现禅的超越，体现禅的意境、禅的精神、禅的风采。提倡“生活禅”的目的在于将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熔铸以后产生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精神，还其灵动活泼的天机。在人间的现实生活中运用禅的方法，解除现代人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惑、烦恼和心理障碍，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更充实，物质生活更高雅，道德生活更圆满，感情生活更纯洁，人际关系更和谐，社会生活更祥和，从而使我们趋向智慧的人生、圆满的人生。

现代苏学大家林语堂先生对苏轼的一生，曾经作出过这样精辟的评价：“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苏东坡传·序》）<sup>〔4〕</sup><sup>12</sup>因此，不妨说，尽管苏轼是位中国文化史上的儒释道三家兼顾的第一通才，但是，他能做到主次分明、毫不含糊：首先，他是大儒，研读“经史子集”是他的“主业”，从而才能为后人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书画精品。其次，喜好佛禅，他无师自通地吸取了近代禅宗“生活禅”的理念身体力行，旷达潇洒地对待人生、对待世事。再次，才是道家，它所占比例极小，几乎可以略去不计。苏轼的一生，尽管与玄学“水乳交融”，但他始终头脑清醒，适可而止。在这一点上，他同样是历代文人中用佛理来关照人生、在生活中体味禅悦的典范。

#### 注释

- 〔1〕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 〔2〕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3〕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 〔4〕 林语堂著《苏东坡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晏飞，常州市苏轼研究学者。

# 苏轼与径山“十方住持”交游考

达 亮

**内容提要** 苏轼与径山的因缘殊胜，曾多次上径山，与径山寺禅师交游甚密。由径山寺而始的“十方住持制”是苏轼首倡的重要举措，现在已经演变成更加合理的“十方选贤制”，对杭州佛教甚至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甚巨。

**关键词** 苏轼 径山 十方住持 禅师

## 前 言

唐代时已建有径山禅寺，大历四年（769）代宗赐额“径山禅寺”。宋真宗赐名“承天禅院”，政和七年（1117）徽宗改赐名“径山能仁禅寺”，南宋孝宗御题“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宋元时为杭州“禅林之冠”，有“东南第一禅寺之誉”。

古之士大夫学佛习禅者，一则研读佛经，二则结交禅僧。苏轼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与径山“十方住持”禅师交游即是一大因缘。

熙宁四年（1071），苏轼任杭州通判，其间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西湖诗词，更与径山古刹高僧交游甚密。苏轼曾于熙宁五年（1072）十月、熙宁六年（1073）两次登览径山，有两件大事影响着径山：一是苏轼改径山寺“世袭制”，首创“十方选贤制”（原名“十方住持”），推祖印常悟为径山第一代十方住持，宝月方为径山第五代十方住持，推澄慧用渊为径山第六代十方住持，推无畏维琳为径山第七代十方住持，为推动径山佛教文化交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元祐五年，内翰苏公知杭州，革为十方（即十方住持制），祖印悟公为第一代住持；绍兴七年，大慧禅师来主法席，纳子云集至千七百众，末年南归重来，跣而复振人境相与映发，道俗趋仰，龙神亦随指麾而定。”<sup>〔1〕10~11</sup>二是苏轼两次上径山作诗十首，对径山感情至深，难舍难分，是宣传径山的第一人。第一次写下《游径山》《次韵杨次公惠径山龙井水》《自径山回，得吕察推诗，用其韵招之，宿湖上》《初自径山归，述古召饮介亭，以病先起》；第二次写下《再游径山》《与周长官、李秀才游径山，二君先以

诗见寄，次其韵二首》《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在湖州知府任上作《送渊禅师归径山》，在常州任上写了《答径山维琳长老》。苏轼曾两度守杭二上径山，在游赏题诗、广结高僧的同时，发现各个佛寺的住持由各寺自袭的制度，容易滋生许多弊端。苏轼提出由官府出面招请各地的著名高僧住持名刹，先后延请常悟、净慧、妙堪三位高僧住持径山，在他调任密州后，得知径山住持之位空虚，又邀请澄慧用渊禅师，直至病笃，还写信给径山寺无畏维琳“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

苏轼改径山“世袭制”为“十方选贤制”。宋代寺院的种类按住持产生方式可分为甲乙寺和十方寺，甲乙寺住持由同寺师徒相授，十方寺住持则可延请诸方名德。唐代并非没有这种继承法。将它们制度化，并固定为一种寺院的形式是宋以后的事。<sup>〔2〕62~63</sup>十方住持院是邀请佛教界名德的制度，因此其寺格较徒弟院更高。

## 与祖印悟禅师交游

祖印常悟，号慧林，俗姓许，杭州人，原系儒业世家。二十二岁时厌尘世而出家，嗣法于法云善本，受云门宗法。元祐五年（1090）苏轼五十五岁时，知杭州。其实，苏轼于熙宁与元祐初，苏轼两度来杭，常与常悟禅师交游，评论韩愈非佛理论，苏轼认为：“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韩愈论》）<sup>〔3〕114</sup>常悟禅师云：“人有乐孟子之拒杨、墨而以斥佛、老为己功，庄子所谓夏虫不可语冰，斯人之谓乎！”两人意气相投，互为信服。苏轼倡导“十方住持”时，首推祖印常悟禅师为径山第一代十方住持。

有关祖印常悟禅师，其他文献记载如下：

祖印悟禅师，本州人，姓许氏。世宗儒业。师既冠，好与名流游，遂有厌尘意，于是出家。年二十二，师于湛，尽得道。

及内翰苏公轼知杭州，与师论及韩退之非佛，云：‘退之于圣人之道，知好其名而未乐其实，至于理而不精，往往自叛其说。’师曰：‘人有乐孟子之拒杨、墨而以斥佛、老为己功，庄子所谓夏虫不可语冰，斯人之谓乎？’由是苏公深契之，举师为兹山第一代住持。（《径山志》卷三）<sup>〔4〕 279~280</sup>

《径山志》卷一祖印为十方住持，乃本年事。又祖印“三月十日示寂”，然不知何年。

《宋僧录》亦有载，《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载：“东京法云寺大通善本法嗣。住东京慧林寺。见《嘉泰普灯录》八、《五灯会元》一六、《五灯全书》三六、《续传灯录》一九。”<sup>〔5〕 640</sup>

### 与宝月方禅师交游

径山第五代“十方住持”宝月方禅师，《径山寺》卷一载：“宝月方禅师，杭州人，五月十六日示寂。”<sup>〔4〕 86</sup>此处的杭州宝月方禅师并不是眉山惟简宝月禅师。有关苏轼与惟简宝月交游详情，请参阅拙著《苏东坡与佛教》（增订本）中《眉山惟简》。<sup>〔6〕 87~90</sup>

### 与澄慧用渊禅师交游

澄慧用渊，安徽泗州（今泗县）人，人称泗州用渊，出家后至江西隆兴府（今南昌）黄龙山从建隆绍庆学临济宗黄龙派教法。北宋嘉祐年间云游来浙，遍访名山。熙宁八年（1075），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听说径山住持虚席，曾函请用渊继席。元祐四年（1089）苏轼再度守杭与用渊相交，敬之如师，并亲送用渊归山，题有《送渊师归径山》该诗石刻题作《寄澄慧大师》，下书“东坡居士苏轼”。该诗表达了苏轼对径山、对用渊大师的深情厚谊、充满崇敬之意。

### 与维琳无畏禅师交游

苏轼在径山结识了怀琬弟子维琳无畏禅师（1036~1101）<sup>〔4〕 957</sup>，字无畏，湖州（浙江）武康人，俗姓沈，得法于育王怀琬禅师，为南岳十一世弟子。好学能诗，性刚直，戒行清严，精通医术，号“无畏大士”。维琳禅师“行峻而通，文丽而清”，被苏轼举为径山寺“十方住持”制后第七代住持。苏轼两度守杭，前后不过五年，治水浚湖，救荒赈灾，政绩斐然，期间崇佛护法的轶闻遗事甚多，对杭州佛教发展有影响的的重要举措有倡导“十方住持”制。《苏轼文

集》卷七十二载：

始，径山祖师有约，后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谓以适事之宜，而废祖师之约，当于山门选用有德，乃以琳嗣事。众初有不悦其人，然终不能胜悦者之多且公也。今则大定矣。<sup>〔3〕 2300</sup>

宋初寺院分“甲乙徒弟院”与“十方住持院”等不同类型。所谓“甲乙徒弟院”，即“世袭制”的寺院，指那些在原住民死亡或退隐后，由其所度弟子按入门的先后秩序继承职位的寺院。“十方住持院”，即“十方选贤制”的寺院，寺院不走嫡系世袭的路子，而是聘请全国各地德高望重的高僧当住持。此外，还有“敕差住持院”，是指由皇帝亲自任命住持的寺院。在所有寺院中，“敕差住持院”地位最高。《庆元条法事类》载“十方制寺院”住持之产生程序及任职资格：

诸十方寺观住持僧道阙，州委僧道正司，集十方寺观主首，选举有年行学业、众所推服僧道，次第保明申州，州审察定差。无，即官选他处为众所推服人。非显有罪犯及事故，不得替易。<sup>〔8〕</sup>

新住持之候选僧人必须具备的任职资格：

一是“年行”，有一定的教内年资，僧腊合格；二是“学业”，佛教修学出众；三是“众所推服”，在教内，不一定是在原寺院内威望崇高，足以服众；四是由参加期集之人们保举。根据这四条原则，如本寺（或当地）无合适人选，则由州政府（一般由僧正司具体负责）组织，遵循相同程序，从其他地方寺院中物色并推举人选。并强调按此程序，无论从本寺、本地或他寺、他处选出的候选人，只要不是有过前科的罪犯，任何情况下不得替换易人。此条多因其系近千年前之法规而被忽视，但是这可能正是其获得僧俗两界肯定的一条重要法律原则。

维琳长老落脚的这寺院本是按资排辈的“甲乙徒弟院”，苏轼认为维琳有才，应该破格提拔，于是他废除寺里祖师爷定下的旧制改成“十方住持院”，让维琳当住持。宋朝的州长官，有权参与处理辖区内寺庙的重大事务。维琳因有苏轼的支持当上径山寺住持。维琳接掌径山寺，修缮佛殿，整修经藏，集徒传教，开堂说法，名播四方。

苏东坡和维琳的私交相当不错，他两次上径山都是维琳禅师亲自接待的。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三日，苏轼游金山，至苏州。下旬，至杭州通判任。熙宁五年（1072）苏轼通判杭州入住径山。据传，当时有寺僧大明者自恃资深，曾向维琳诘难：

僧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师曰：不在燃灯前，亦非释迦后。曰：莫便是育王儿孙也无。师曰：神岳峰高，尾间水急。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神鸾顶上轩眉坐，黄鹄岫中昂首行。曰：未审意旨如何。师曰：会即便会，觅甚意旨，僧珍重便行。师曰：听取一偈：槽枥火残飞白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炉冥坐人不知。苍狄山西叫明月。<sup>〔9〕 0709c12~c19</sup>

维琳申述自己的来历和主张，寺僧大明者口讷离寺而去。《补续高僧传》又载：

维琳，武康沈氏子，约之后也，好学能诗。熙宁中，东坡倅杭，请住径山，继澄慧渊公法席。丛林蔚然，众心归附。久之惮烦，退静于邑之铜山，结庵名无畏，自号无畏大士。建中靖国初，东坡自儋耳还至毗陵，以疾告老。师往问慰，坡答之以诗。始师之居铜山也，院有松合抱，县大夫将取以治廨。师知之，命削皮题诗其上曰：大夫去作栋梁材，无复清阴护绿苔。只恐夜深明月下，误他千里鹤飞来。尉至，读其诗乃止。宣和元年，师既老，朝廷崇右道教，诏僧为德士皆顶冠，师独不受命。县遣使谕之，师即集其徒，说偈趺坐而逝。众以二岳覆其躯，瘞山后。<sup>〔4〕 0492b05~b15</sup>

苏轼至晚年仍与维琳保持亲密的交谊。在他贬岭南时，维琳极表关切，并“知为默祷于佛，令亟还中州”。<sup>〔3〕 1867</sup>元符三年(1100)苏轼遇赦北归，在自己生前就很喜欢的毗陵(常州)病逝，时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维琳曾咏诗问候：

其(东坡)常州《与东坡问疾》诗云“扁舟驾兰陵，自援旧风日。君家有天人，雄雄维摩诘。我口吞文殊，千里来问疾。若以默相酬，露柱皆笑出。”

苏轼在病中接诗，念与维琳同庚(丙子年出生)，感慨身世，抱病作答：“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sup>〔11〕 2</sup><sup>459</sup>据苏轼《答径山惟琳长老》的“与君同丙子，各已三万日”，可知他与苏轼同岁，皆生于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岁(1036)，三万日是概数，不会是八十岁以上，应是超过二万日的说法，在六十岁以上时写的。

《径山志》卷十一《外护·苏轼》亦载：

苏轼子瞻径山维琳禅师问疾，云：学士生平践履，至此更须著力。公应声曰：著力，便差，语绝而逝。游径山诗及与宝月无畏诸师书另见。<sup>〔4〕 983~984</sup>

不久，苏轼即逝，但在上述遗言中依然表

达了乐观超脱的精神，寄予深邃的禅意，并嘱维琳“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语重心长。维琳晚年退居余杭铜山院，政和七年(1117)朝廷崇道排佛，诏命僧尼蓄发顶冠，维琳抗不从命，县令遣人劝谕，维琳仍然不从，始终不忘苏轼临终遗言“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而身体力行。

## 结束语

世人投迹寺院寻求精神寄托，或畅游名山，寄宿寺宇，与高僧谈禅论政，闻风附雅。苏轼与径山的因缘殊胜，曾多次上径山，与径山寺禅师交游甚密。由径山寺而始的“十方住持制”亦是苏轼首倡倡导的重要举措，现在已经演变成更加合理的“十方选贤制”，对杭州佛教甚至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甚巨。

## 注释

〔1〕 楼钥《攻媿集》(第16册)卷五十七，《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记》。

〔2〕 高雄义坚著，陈季菁译《宋代佛教史研究》，华宇出版社1986年版。

〔3〕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4〕 杜洁祥主编《径山志》，明文书局印行1980年版。

〔5〕 《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6〕 达亮《苏东坡与佛教》(增补本)，《眉山惟简》，文津出版社2010年版。

〔7〕 李国玲著《宋僧录》，线装书局2001年版，第903页。《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957页，两书生卒年为？~1119。

〔8〕 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五十，《道释令·住持》，燕京大学图书馆藏版印行本。

〔9〕 《卍续藏》第七十八册，《建中靖国续灯录》卷十一；又见《卍续藏》第八十二册《五灯全书》卷第三十四，《杭州径山无畏维琳禅师》，第0008a12~a18页；又见《大正藏》第五十一册，《续传灯录》卷十一，第0530c29~0531a08页。

〔10〕 《卍续藏》第七十七册，《补续高僧传》卷第十八《宋·维琳传》。

〔11〕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达亮，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某杂志副主编。

# “东坡诗中词说”的前世今生

饶晓明

**内容提要** 曾文与拙文争论的焦点主要是词学观的对立。历代文献证明《竹枝歌》、《归来引》等40首“东坡诗中词”是客观存在的。笔者钦佩和感谢《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的正义和胆量，发表许多有见地的争鸣文章，维护了学术生命和学术尊严。

**关键词** “东坡诗中词说” 词学观 争鸣 学术尊严

## 前言

关于“东坡诗中词说”的争鸣过去了整整10年。10年时光弹指一挥间，收获的启示则是珍贵永恒的。笔者非常钦佩和感谢《乐山师范学院学报》和参与争鸣的专家学者的正义和胆量。是你们打开“东坡词”研究的自由之门，发表许多有见地的争鸣文章，维护了学术生命和学术尊严，为学术界、学报界树立了价值典范。

2005年第6期《乐山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笔者《新近发现东坡新词考辨补正》。依据“史有表态，入乐可歌，又属长短句”的原则，让“东坡诗中词”40首从诗文中分离出来，回归《东坡乐府》原籍，在苏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同年第10期“学报”发表曾枣庄先生《需“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评〈新近发现东坡新词考辨补正〉》，对拙作全盘否定。“学报”展开争鸣，并加了两个“编者按”，前后发了8篇文章。赞成“东坡诗中词说”的有孔凡礼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朱靖华教授、中华书局刘尚荣编审、盐城师范学院王文龙教授等，反对者有四川大学教授曾枣庄、复旦大学研究生田苗等。

“学报”2006年第1期发表笔者《东坡体，中国词发展的方向——答曾枣庄对〈新近发现东坡新词考辨补正〉责难》、朱靖华《东坡〈竹枝歌〉可入词集——与曾枣庄先生商榷》、刘尚荣《亦诗亦词话〈竹枝〉》等批驳文章；第6期发表田苗《试论词体的起源及特征》，反驳朱、刘和笔者的观点。2007年第2期发表笔者《再谈东坡“乐府、歌词、楚词”及其它——兼答田苗女士》；第9期发表朱庆才《“中国旋宫”与

质疑“燕乐词源”说——兼论苏轼〈竹枝歌〉可入词集》。2014年第3期发表饶学刚《东坡文化研究上的惰性思维》，呼唤学术良知，或许也在为“东坡诗中词说”10周年祭，“一樽还酹江月。”

## 回顾：争论的焦点

回过头看，曾文与拙文争论的焦点主要是词学观的对立。

曾文“文体分类学”规定：其一，诗是诗，词是词，曲是曲，歌词是歌词，琴曲词是琴曲词，楚词是楚词，壁垒森严，不可逾越。笔者秉承的是苏东坡的词学观：词是“诗之裔”、“长短句诗”、“无柳七郎风味”、“自是一家”的“东坡体”。其二，说有词牌可依的是词，无词牌可依的是诗。而《竹枝歌》、《归来引》等已进入清代万树《词律》和王奕清《钦定词谱》，曾先生不认可。其三，说“诗注”本中说词不算，“词注”本中说词才算。

东坡《祭张子野文》说：“微词宛转，盖诗之裔。”就是说，词是诗的持续、后嗣。凡入诗可歌者皆可入词。清代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一种“调近绝句，借其声律以歌之”的诗中词极为常见。东坡“以诗为词”便是。如《竹枝歌》、《阳关曲》、《瑞鹧鸪》、《玉楼春》、《木兰花令》等。就以《瑞鹧鸪》来说吧。清代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指出：“考本集《瑞鹧鸪》词凡二首，此其一也。王注<sup>(1)</sup>、施注<sup>(2)</sup>强以为诗，今姑仍其旧耳。”孔凡礼先生《苏轼诗集》校注前言也指出：“施注倅杭卷内之《寒食未明至湖上》一首，本集为《瑞鹧鸪词》，而强作七律。”他们所说“强作七律”的两首《瑞鹧鸪》词是指“城头月落尚啼鸟”和“乌啼鹊噪昏乔木”。

东坡《与蔡景繁十四首》其四<sup>(3)</sup> 1662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新词”之所以采用长短句形式，是为了适应人抒发情感而配乐的需要。东坡长短句包涵诸多称谓，如词、曲、阕、歌词、歌辞、乐府、楚词、自度曲，大大地解放了词体。东坡在《江城子》（梦中了

了醉中醒)中称“长短句”;在《东坡乐府》词集名上称“乐府”;在《临江仙》(细马远驮双侍女)中称“词”;在《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中称“曲”;在《浣溪沙》(风压轻云贴水飞)中称“阙”;在《满庭芳》(昵昵儿女语)中称“歌词”;在《减字木兰花》(惟熊佳梦)中称“歌辞”;在《瑶池宴》(飞花成阵)中称“琴曲”;在《醉翁操》(琅然)中称“楚词”。即是同一首词,在不同的吟咏场境下就有不同的称谓,如《阳关》、《阳关曲》、《小秦王》,可以分别称诗、词、歌、曲。东坡《阳关曲》(暮云收尽溢清寒)<sup>(4)</sup> 198说:“中秋作。本名《小秦王》,入腔即《阳关曲》。”又《书彭城观月诗》<sup>(3)</sup> 2150说:“余十八年前中秋夜,与子由观月彭城,作此诗,以《阳关》歌之。”又《书林次中所得李伯时〈归去来〉〈阳关〉二图后》<sup>(5)</sup> 1598说:“两本新图宝墨香,樽前独唱《小秦王》。为君翻作《归来引》,不学《阳关》空断肠。”

“东坡诗中词”其实早有定论。《襄阳古乐府三首》、《太白词》、《美哉一首》、《鸣泉思》、《老人行》、《白鹤吟》等,清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明成化《东坡七集》“续集”将其列入“歌辞”类,商务印书馆《苏东坡集》“续集”和中国书店《苏东坡集》“续集”,将其列入“歌辞”或“词”类。上述各首加上《竹枝歌》、《山坡陀行》、《辘轳歌》、《虚飘飘三首》等,世界书局《苏东坡集》“续集”将其列入“歌辞”类。《〈归来引〉送王子立归筠州》、《黄泥坂词》、《清溪词》、《上清词》、《和陶归去来兮辞》、《山坡陀行》、《辘轳歌》等,清冯应榴将其列入“乐府”类,明成化《东坡七集》“前集”将其列入“词赋”或“歌词”类,商务印书馆《苏东坡集》“前集”将其列入“词”类,中国书店《苏东坡集》“续集”将其列入“歌辞”类。

东坡《与鲜于子骏三首》其二<sup>(3)</sup> 1560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段话表明东坡不遵守正统的诗词理论与因袭的词风,与以柳永为代表的“艳科”“媚体”词唱反调,有意创立如“隳括、集句、回文体、自度曲”等“自是一家”新词体和“狩猎词”般的新词风。表现为:在《哨遍》(为米折腰)中为“隳括”;在《定风波》(雨洗娟娟嫩叶光)中为“集古句”;在《菩萨蛮》(落花闲院春衫薄)中为“回文”;在《双荷叶》(双溪月)中为“自制腔”。笔者推出的“东坡诗中词”大多属于这种多体式的为歌而作的长短句。

## 铁证:《竹枝歌》、《归来引》等是词

“东坡诗中词”,历代东坡集校注本都定归宿。笔者在答辩文章中都一一阐明过。这里仅就争论大的诗中词再精确梳理,增补新证。

其一,《竹枝歌》、《黄泥坂词》与“歌词”、“楚词”。

清代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说:“《竹枝》,其声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九歌》作《竹枝新歌》。”

清代张德瀛《词徵》说:“竹枝词多以相和成曲。《巴渝词》之竹枝、女儿,《采莲曲》之举棹、年少,其遗响也。”

黄中骏《湖北民歌曲体结构与“楚辞”体式因素》说:“《竹枝词》和《杨柳枝》和声的起源与《楚辞》中‘兮’字比较固定出现的模式有关,因为《楚辞》中出现于句中的‘兮’和出现于句末的‘兮’,分别与《竹枝词》出现于句中的和声和《杨柳枝》出现于句末的和声相符。”<sup>(6)</sup>

“终身学习网”“文学天地”“词牌格律”栏,把“楚词”列入词牌中,放在“长相思”词牌之后,“翠楼怨”词牌之前。

朱靖华《东坡〈竹枝歌〉可入词集》说:“《竹枝歌》可入东坡词,而非曾文所说的‘楚声即楚辞’的纯诗。”“宋人和苏轼自己也认为《竹枝》是词。清代万树《词律》和康熙《钦定词谱》都在卷一首列了《竹枝》词牌。”

刘尚荣《亦诗亦词话〈竹枝〉》说:“《竹枝》原是巴歙民歌,经刘禹锡改造后盛传于晚唐五代,并成为教坊曲,演化为词牌名。《花间集》、《尊前集》、《全唐五代词》均收《竹枝》;《词律》、《词谱》开卷即见《竹枝》。《竹枝》是诗也是词。”

朱庆才《“中国旋宫”与质疑“燕乐词源”说》说:“苏轼作词,有其‘见微知著’的发展过程。《竹枝歌》应属填词性质,它是苏轼‘通判杭州后大量写词’的前奏表现。”

纵观上述,可见民歌与“楚词”是《竹枝歌》之滥觞。难怪清代秦恩复《词林韵释跋》说:“词也者,骚之苗裔,而歌行之变体也。胚胎于唐,滥觞于五代,至南北宋而极盛”;难怪东坡《竹枝歌》说“竹枝歌,本楚声”,《归朝欢》说“竹枝词,莫徕新唱,谁谓古今隔”,《白帝庙》说“破甑燕山麦,长歌唱《竹枝》”;难怪清代万树将《竹枝歌》录入《词律》,且视为最短的“词”。可见《竹枝歌》、《归来引》、《黄

泥坂词》、《清溪词》、《上清词》、《和陶归去来兮辞》、《山坡陀行》等“东坡诗中词”是“楚词”，亦是“词”。

曾先生说《竹枝歌》“是诗而不是词”，“它们连词都算不上，当然更不会有人为它们定词牌”。古籍专家不知《竹枝歌》为何物，深感失望。曾一面指责笔者“错把文体辞赋《黄泥坂词》等当作词”，另一面却说《醉翁操》虽是“骚体辞”，“歌诗曲操”，“属楚辞体或叫骚体”，但又是“双调”，可以入词集。曾先生怎么自己否定自己呢？

其二，《归来引》与“歌词”、“楚词”。

清代王奕清《词谱》说：“《归去来》调见《乐章集》词二首，因词有‘歌筵舞，且归去，休惆怅，好归去’句，取以为名。”

吴宁作《榕园词韵》说：“词肇于唐，盛于宋。溯其体制，则梁武帝《江南弄》，沈隐侯（约）《六忆》已开其渐。诗变为词，目为诗余，乌得议其非通论？屈子《离骚》名词，汉武帝《秋风》，陶靖节《归去来》名词，以词命名，从来久矣。”

东坡仿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写《和陶归去来兮辞》。清代查慎行注：“先生《和归去来词》，施氏原注，今既附和陶卷中，此亦有韵之词也，何独遗之。”又仿楚词作《〈归来引〉送王子立归筠州》。东坡《与子明兄一首》说：“记得应举时，见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作词。近作得《归去来引》一首，寄呈，请歌之。”

可见，《归去来》词源远流长，缘于“歌词”、“楚词”。世传东坡《哨遍》，即此《归去来引》也。《词律》、《钦定词谱》、《全宋词词牌》分别称为《归去来》、《归去难》、《归去曲》、《归去来兮》、《归去来兮引》、《归来引》、《归田乐》、《归田》。

其三，《六言乐语》与“歌词”、“子夜歌”、“琴曲”。

清代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说：“五言乐语，歌咏五德之言也。乐语，所歌之文词。”

东坡的《六言乐语》（桃园未必无杏），清代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说“此仿《子夜歌》意”。《汉语大词典》第4卷第169页说“《子夜歌》，乐府吴声歌曲名。”“《子夜歌》，词牌，《菩萨蛮》的别名，有南唐李煜词；《忆秦娥》的别名，见宋贺铸词。”与东坡《醉翁操》同姓的琴曲词《子夜歌》已入《词律》、《词谱》和《全宋词词牌》。《于潜僧绿筠轩》为僧乐语，《太白词》为郊祀乐语，《襄阳古乐府三首》为六朝楚歌乐语。“乐语”已列《全宋词词牌》“浪淘沙

慢”词牌之后、“离别难”词牌之前。

可见，《六言乐语》与“歌词”、“子夜歌”、“琴曲”同属一家族，都是付诸歌喉的“东坡诗中词”。

### 珍惜：收获、启示与反思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10年前，笔者有幸推出“东坡诗中词”，取得极为宝贵的收获，也尝到难以言尽的酸涩味，或许能给世人以深刻的启示与反思。

其一，学术研究要真实、客观、科学。

学术研究的生命是客观、真实、科学。笔者是“东坡诗中词”新近发现者，而不是最早发现者。最早是：南宋辛弃疾发现《醉翁操》“东坡诗中词”并仿作；南宋陆游，清代查慎行、冯应榴、王文诰发现《〈归来引〉送王子立归筠州》、《黄泥坂词》等“东坡诗中词”，将它们移入“东坡乐府”；清代朱彊村发现《阳关曲》和《渔父》等“东坡诗中词”，将它们引入“东坡词集”；唐圭璋发现《奉安……导引歌词》和《迎奉……导引歌词》等“东坡文中词”，将它们编入《全宋词·苏轼词》；曹树铭从东坡《登桓山记》中发现《履霜操》文中琴词，将它转入《东坡词》；李国平院士在东坡诗集中发现多首诗中词，就分离并编成《苏东坡诗中词百首》；薛瑞生发现《四时词》“东坡诗中词”，将它移入《东坡词编年笺证》。它们大都进入了《词律》和《词谱》，你无法否定。笔者只是以新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多发现几首“东坡诗中词”。

其二，学术研究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主席说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是在人们不断探索、争鸣中得到肯定的。学术上有不同的见解是极其正常的。

其三，学术研究要相互尊重、人人平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认为：在学术争鸣问题上，应当让人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即使遇有不适合自己口味的不同学术见解，也应宽容的胸怀待之。

### 结语

10年过去了，笔者推出的“东坡诗中词”40首，被海内外学术界逐渐认同。（下转第59页）

# 苏味道故里追述

苏士福

**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苏味道的祖籍在栾城、墓地在苏邱村、祖居地在苏家庄、南赵村不是苏味道故里的观点并论证，分析了原苏家庄一带居民的来源、苏家庄遗址的范围，并且介绍了打造苏家庄东坡小镇文化的情况。

**关键词** 苏味道 故里 追述

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出生在四川眉山，眉山苏氏始祖苏味道祖居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苏家庄，墓地苏邱村。千百年来，苏味道的祖居是哪地哪村，很少被人知晓。近二十年，经过苏学专家的潜下心来努力探讨，据实证辩，才理出了一个头绪。

## 一、苏味道的祖籍在栾城

《旧唐书》和《新唐书》苏味道列传记载：“苏味道，赵州栾城人”。“历任凤阁舍人，检校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神龙初，以亲附张易之、昌宗，贬授眉州刺史，俄而复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未行而卒，年五十八，赠冀州刺史。”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在《苏氏族谱》中明确地写道：“味道，圣历初为凤阁侍郎，以贬为眉州刺史，迁为益州长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归，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苏氏。”从族谱中可以看到苏味道与苏洵的世系关系。苏洵自认苏味道是眉山苏氏始祖，苏味道的故里河北栾城当然是眉山苏洵、苏轼、苏辙的祖籍地。

苏味道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既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又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武则天称帝时，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前后三度为相达十年之久。中宗神龙时，贬为眉州刺史，复授益州长史，未行而卒。味道四子：佃，膳部员外郎；份，未仕；倜，山东兖州刺史；惋，太原府司录参军、职方员外郎。次子份，咸亨四年（673）正月初一生，未仕，开元十七年（729）六月歿，葬眉州彭山

县安镇乡，子孙留居眉州，眉山之有苏姓自此始。

1995年《栾城县志》132页记：

苏邱村系唐时置，原为武则天时宰相、著名文学家、初唐“文章四友”之一的苏味道的墓地。

四川眉山“三苏”源于河北栾城，不仅是当世专家学者所公认的，而且“三苏”本人及宋朝当时的著名学者早已认可。

苏东坡本人在《苏廷评行状》中说：

公讳序（苏东坡的祖父），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盖赵郡栾城人也。

苏辙在《东坡公墓志铭》中写道：

苏自栾城，西宅于眉。世有潜德，而人莫知。

苏轼的同年友、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在《赠职方员外郎苏公墓志铭》中亦写道：

君讳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盖赵郡栾城人也。

凡此种种，俱证眉山“三苏”原本出于赵郡栾城苏味道。苏味道是眉山苏洵、苏轼、苏辙的始祖，眉山“三苏”对其先祖苏味道和祖籍地栾城怀有真挚深沉的感情，对其先祖苏味道的根脉传承有着深厚的眷念。

苏洵为其家族编写的《苏氏族谱》自署“赵郡苏洵”，其著作《嘉祐集》中有110篇署名“赵郡苏洵”。苏轼在《苏轼文集》、《晚香堂苏帖》等著述中有20余篇署名“赵郡苏轼”，并盖有“赵郡苏轼”的印章。苏辙所留文集，定名为《栾城集》、《栾城后集》和《栾城应诏集》，其孙苏籀刊刻的苏辙生前言行集取名《栾城遗言》。四川省眉山市的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里，三进四合院中有启贤堂，中央塑像端坐着的是苏东坡的始祖苏味道，两侧贴金楹联为“金生丽水三苏怀乡系赵郡，玉出崑岗眉山发迹源栾城”，苏洵、苏轼、苏辙的牌位设在苏味道座下的子嗣后裔中。公元2000年，来自国内外上百名苏学专家与苏氏后裔在栾城举行了中国第十

二届苏轼学术研讨会，系统地论证了苏味道是眉山“三苏”的始祖。现存各朝代《苏氏族谱》、《眉山苏氏本宗谱系》以及栾城所收集的苏姓族谱等，均证明苏东坡为苏味道第十一代孙。

## 二、苏味道的墓地在苏邱村

清同治十一年（1872）《栾城县志》载：苏味道“赵州栾城人”。“唐鸾台苏味道墓，在城西北十八里苏邱村。”

栾城县城位于河北省会石家庄市东南 20 公里，2015 年县改区，划为石家庄市栾城区。栾城文化历史悠久，苏味道墓就在栾城区苏邱村，距石家庄市市区不到 10 公里，墓葬于公元 706 年，距今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至今保存完好。

据村中年长者和知情人介绍，苏味道原墓高一丈二尺多，大致由墓田、墓冢、墓井、墓碑、墓墙五部分组成。墓四角有井亭四口，井亭的对角线长度约为 40 步。墓冢下有墓穴。墓地曾出土宝剑一口，陶器若干件。明崇祯十一年（1683）兵部右侍郎、蓟辽总兵范志完视察栾城时，书写了“眉山发迹”四个大字，刻碑于苏味道墓前，寓意眉山三苏源于栾城，发迹于眉山。1941 年日本人加赖谷正一带兵进驻栾城，在苏味道墓前立了一通“三苏发祥”碑，并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解放后墓地被荒废。1998 年栾城县人民政府根据苏味道墓现状资料和初唐时期有关墓葬制度，重新修复了苏味道墓。2002 年修建的“苏东坡祖籍纪念馆”对外开放，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为其题写了馆名。2002 年 8 月世界苏姓宗亲总会历届理事长苏岳章、苏世庆、苏世选莅临栾城参观拜谒了苏东坡祖籍纪念馆和苏味道墓，捐刻了四通石碑。2014 年扩地 100 多亩在苏东坡祖籍纪念馆周围建起了文化公园。

2015 年栾城区政府加大了对苏味道墓地所在村苏邱的整治力度，打造一条 1200 米长的仿唐朝特色街道，在街东口塑造了 8 米高的苏味道巨型雕像，街中心制作了 6 米高的“一代文豪苏东坡”大型雕刻，四面底座均为大理石东坡画面雕刻。2016 年苏邱村被市政府定为省级重点片区村，由江苏设计院进行整体规划设计，投资 4300 万元，打造“弘扬历史文化，发展休闲旅游业”为一体的旅游观光村。目前苏味道墓区已扩建了广场、亭楼、碑林、苏祠，苏相府和诗韵公园已完成框架建筑，不久即将修建完工。

## 三、苏味道的祖居地在苏家庄

据史料考证，从汉末到唐初，栾城居住着一个大家族——苏氏家族。东汉顺帝时，苏章为冀州刺史，有子孙在邯鄲作官，有功于民，其子孙有一支迁居于赵郡之栾城。当时栾城归赵郡管辖，所以称为“赵郡苏氏”。到了唐代武则天时期，苏氏家族出了个有名的宰相苏味道。他的弟弟苏味玄也入朝为官，管理皇宫的膳食，陪太子读书。家有庄田万亩，兄弟俩可以说是显赫一时，是栾城的一大望族。

苏味道祖居那个村，据《河北省地名志》和《栾城地名志》记载是在现在的大裴村一带，明朝以前叫苏家庄。

有关“苏家庄”的记叙，很早以前大裴村就有燕王扫北时“马踏苏家庄”的传说，1983 年《河北省地名志》、1992 年《栾城县地名志》以及 1999 年《河北省村镇辞典》等书籍中以及村名碑文中都印刻有“苏家庄”的记载。

1983 年《河北省地名志》第 141 页记载：

据传说，今小裴村附近曾有一村名苏家庄，系苏味道故里，后毁于战乱。

1983 年《栾城县地名资料汇编》第 98 页曾记载小裴村的来历：

传说，此地原有一个苏家庄，是唐代宰相苏味道的故里。明永乐年间燕王扫北时毁于兵乱。后皇上下诏在此地另设一村，民间认为是赔偿之意，取其谐音，得名裴村。清雍正年间分为二村，一曰大裴村，一曰小裴村。

1987 年大裴村地名碑文：

此原有唐相苏味道故里苏家庄，明初兵毁，后又建村，得名裴村。清雍正时分为大、小裴村。

小裴村地名碑文：

此原有唐相苏味道故里苏家庄，明初兵毁，后又建村，得名裴村。清雍正时分为大、小裴村。村东有栾武子墓台和栾武庙。

1992 年《栾城县地名志》第 151 页记载：

裴村，雍正时为二村，传说，附近原有苏家庄，系唐圣历宰相苏味道故里。

1999 年红旗出版社《河北省村镇辞典》记载大裴村的来历：

传说该处原有一个苏家庄，明永乐年间燕王扫北时被平灭；当年皇帝下诏在此另设一村，民间认为是赔偿之意，取其谐音，得名裴村。分两处，大、小裴村。

2010年《栾城县志·苏味道与栾城》第680页记：

苏味道的故里是位于县城西北苏家庄，明初毁于战火，后来官方知道是宰相故里，于是赔款修建村落，人们谓之“赔村”，故取其谐音曰“裴村”。大裴村村民在村南耕种时，犹见苏家庄遗迹。

《苏味道·三苏与栾城》一书中登载苏邱村人崔一《关于唐代苏味道墓苏丘的回忆及考释》：

据史料记载，苏味道为栾城苏家庄人，死在四川眉州，后家人运回灵柩，葬于苏邱村。

中国谱牒专家常州苏慎在《三苏家族世系汇录》中曰：

苏味道，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戊申年生于赵郡栾城县苏家庄，神龙元年（705）年乙巳年卒于眉州任所，寿58岁，葬于河北栾城县西北九公里处苏邱村。

凡此种种，俱证苏味道的祖居地昔日在苏家庄，今之大裴村。

#### 四、南赵村不是苏味道故里

2000年有人无视1983年和1992年《地名志》史料所记，在《苏味道故里考》一文中提出：“有人说大裴村是苏味道故里，这是毫无根据的。从目前掌握的史志资料看，大裴村从未叫过苏家庄”。反而偏听一个已故老先生之说，未经县、市地名办公室批准，擅将苏味道故里改换为“南赵村”，同时列举出六条证据。其一，《眉山发迹》碑原立在清明桥畔。据县教育局勤管股长檀承琳先生说，南关白洪范先生在世时曾告诉他，《眉山发迹》碑起初（明末）立在南北赵村之间洹河上的清明桥畔，因而苏味道的故里是南赵村。因为白洪范曾参加过民国时期修志，手头上有充分资料。其二，从地理位置上分析，南赵村距苏邱村3公里，苏味道做为一朝宰相，家中良田很多，苏邱至南赵村可能均为苏味道家农田。其三，南赵村为唐或唐以前所置。南赵村何时置村无明确记载，但根据所建寺庙与置村关系看，凡有寺庙的村多在唐或唐以前置。而南赵村曾有镇海寺、兴隆寺和龙王庙，所以说该村为唐以前置村。其四，清明桥起初为苏轼后裔祭祖之桥。洹河上清明桥可能为苏氏后代于清明节时从南赵村出发，跨过洹河去苏邱扫祖塋所建，所以命名为“清明桥”。其五，南赵村为苏姓居民聚居地之一。南赵村苏氏现有32户157人，对于他们是否是

苏味道后裔，他们既不能肯定，又不能否定。由于南赵村苏氏既无族谱可考，又无传说可追，他们是否苏味道后裔成了不解之谜。其六，现在栾城苏姓居民，一部分是赵郡苏氏即苏味道之后，一部分是由山西洪洞县迁来的。南赵村、西留营、东许营苏氏均为赵郡苏氏，即苏味道、苏味玄之后。”

说“南赵村是苏味道故里”，看似有理，其实不然。首先2000年之前的《河北省地名志》和《栾城县地名志》中已有“苏家庄是苏味道故里”记载，根本见不到“南赵村是苏味道故里”的任何历史资料记载，且无族谱记载及民间传说，只据一个《眉山发迹》碑立在洹河上的清明桥畔，就推测南赵村是苏味道的故里，不免证据不实使人难以置信。

《故里考》所列的几点证据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证据一说，《眉山发迹》碑起初（明末）立在南北赵村之间洹河上的清明桥畔，因而苏味道的故里是南赵村。试问，明末兵部右侍郎范志完视察河北时不将《眉山发迹碑》立于味道墓前而立于远离苏邱墓3公里远的清明桥畔合乎情理吗？清中叶被村民从清明桥畔打捞上来，可能是因防洪从苏味道墓前搬运到了洹河桥畔挡水患，不足以说明明末就立在南洹河上的清明桥畔。清道光十九年（1839）当时任栾城知县的桂超万把疏通洹河时挖出的眉山发迹碑立于县城城内龙冈书院门口，能说苏味道的祖籍就是龙冈书院吗？说“白洪范曾参加过民国时期修志，手头上有充分资料”。民国时期并没有修成栾城县志，何来充分的县志资料。证据二、三说：南赵村因寺庙多，故为唐以前置村。寺庙多的村就是唐前置村吗？不一定。据《栾城地名资料汇编》和南赵村地名碑记载，明初山西洪洞赵氏二兄弟分迁居古洹河南北两岸，此在南叫南赵村。南赵村是山西洪洞县移民村，并非唐前就有南赵村。《栾城县地名志》记载：“南赵村，因居洹河故道南侧，故名”。此亦没说南赵村是苏味道的故里。证据四曰：清明桥起初为苏轼后裔跨过洹河去苏邱扫祖塋所建。可是根据明成化二年（1466）《创建赵村河石桥记》碑文记载：“乡人尝用木架荆茅以土覆为梁，徒步可济，而车马弗便。景泰六年十有二月，释氏福成因公务经于此，值桥毁日甚，乃克蔬食水饮，量工度布，朝夕奔走，多方化缘，故贵人巨室推心乐施，倩工凿石，倾力搬运，历岁月之久，成桥一座，接南北之坦道，下通五窍以泄水势”，“经始于景泰七年三月，落成于天顺三年五月。”当时任元氏县儒学训导

的李理，在桥成七年之后的明成化二年，撰写了《创建赵村河石桥记》的碑文。清楚地记载，清明石桥“经始于景泰七年三月，落成于天顺三年五月”。《栾城县地名志》亦记：“村北洹河故道上有明成化二年建的清明桥”。这座桥在明代曾叫过青明桥，到了清代才叫清明桥。事实说明，清明桥在唐宋时为木桥，并非唐代“苏家于清明节从赵村去苏邱祭扫祖茔所建”的石桥。证据五曰：南赵村为苏姓居民聚居地之一。栾城县有苏氏村庄27个，不能说姓苏的村庄就是苏味道故里。1999年县景点办人员采访南赵村苏姓村民时，“对于他们是否是苏味道后裔，他们既不能肯定，又不能否定。由于南赵村苏氏既无族谱可考，又无传说可追”，因而不能说南赵村就是苏味道故里。

面对史料事实，翻开省、县《地名志》的记载，都没说南赵村是苏味道的故里。

1983年《栾城县地名资料汇编》记述：南赵村，传说，明永乐年间燕王扫北后，山西洪洞县赵氏二兄弟迁来此地，分居古洹河两岸，以姓氏冠以方位分别命名为南、北赵村。该村又据洹河石桥，亦称桥赵村。

1987年南赵村地名碑文：明初，山西洪洞赵氏二兄弟分迁居古洹河南北两岸，此在南叫南赵村。又近洹河清明桥，曾称桥赵村。

1999年《河北省村镇辞典》：南赵村，据传说，明永乐年间燕王扫北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赵氏两兄弟来此建村，分居洹河两岸。因该村位于古洹河之南岸桥下，称南赵村，亦称桥赵村。

1992年《栾城县地名志》记载：“南赵村，因居洹河故道南侧，故名”。此亦没说南赵村是苏味道故里。

2000年10月，原县景点办崔冰岩经过实地调查，撰文《关于苏味道故里的探讨》，指出“南赵村不是苏味道故里”。文曰：“明永乐三年（1405），从山西泽、潞二州迁大批农民移居栾城。南赵村属于栾城县明初及以后从山西迁入移民，大约在苏味道出生750年之后栾城才有了这个南赵村，因此，南赵村不是苏味道的故里”。

## 五、苏味道故里之争辩

苏味道故里是“苏家庄”还是“南赵村”，十数年来一直存有争论。

焦点之一是，近年有人翻出1983年《栾城县地名资料汇编》中所写的文字：“传说，该处原有一个苏家庄，系唐开元年间宰相苏味道的

故里。明永乐年间燕王扫北时平灭。事后，皇帝下诏在此地另设一村，民间认为是赔偿之意，取其谐音，得名裴村。清雍正年间分为二村，一曰大裴村，一曰小裴村。”从中挑剔字眼怀疑“苏家庄”之说，挑出的弊病是，苏味道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已过世，不可能开元间任宰相，与史实不符。理由二，燕王扫北是在建文年间，不是永乐年间，此时燕军没进军栾城，村庄没有被平灭，更无赔偿之说。县地名办为避讳这一点，1992年正式出版《栾城县地名志》时，修定为“传说，附近原有苏家庄，系唐圣历宰相苏味道故里。”纠正了开元年号的错误。1987年10月5日栾城县地名办公室在大裴村村南立的地名碑写道：“此原有唐相苏味道故里苏家庄，明初兵毁，后又建村，得名裴村。”地名碑一将“传说”删去，二将“明永乐年间燕王扫北时平灭”修订为“明初兵毁”，其事实更加确切。焦点一的论点早在1992年修《栾城县地名志》时被订正，无须挑剔。

就在2000年有人提出南赵村是苏味道故里不久，2003年苏士福依据《栾城县地名志》等史料和传说，就搜集编写了《苏味道故里记叙》一文，对“苏家庄”进行了记叙，刊印在《苏氏源流录》一书中。文章曰：苏味道，生于公元648年，河北栾城人，官至武则天时宰相。705年卒于眉州，留一子于眉，后裔中出了有名的宋代大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栾城县志》记苏味道归葬河北栾城苏邱村，但没提及苏味道的故里是何村。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县《地名志》均记载苏味道的故里是苏家庄，即今之大、小裴村。走进大裴村，也会听到村干部和老年人讲“靖难之役”“马踏苏家庄”的故事。据大裴村老年人说，过去大裴村（原苏家庄遗址）往西北有一条小路通往苏邱苏味道墓地，墓地原是苏味道的庄田。苏家庄东南以及苏家庄西北的赵台、赵村、苏邱都有苏味道家族的庄田。老年人讲，过去大裴村曾有苏氏居住，村中五道庙前立有以“苏家庄”命名的乡亭，是马踏苏家庄的遗址，此亭在1956年被拆掉，拉到西营乡沿村洹河桥挡堤，后下落不明。解放后在大裴村村东挖出过瓷器、陶罐及开元通宝铜钱；在村西挖出过瓦罐、灶火坑和铜钱。大裴村有顺口溜曰：“栾武台西大村庄，相传村名苏家庄，传说马踏苏家庄，燕王扫北平灭光，村民皆逃难，空留荒草荒。原来好村庄，变成瓦砾场，后来移民者，重建名赔（裴）庄。”大裴村是否居住过苏姓，村人说：“解放以前几百年，苏姓住在大学街道脖子边，苏家西边有松柏，松柏西边有碑匾。

民国三十年，苏家人贫寒，携家往山西榆次挖煤炭，名字苏勇子，现在有信传。”村民说，该村出过大官，“东南有庄田，西北好莹畔，清明去祭祖，有路通坟前。”无论是从地方志资料看，还是从民间传说讲，均说栾城县过去有个苏家庄，且是苏味道的故里。大裴村南口现立有《地名碑文》，上面刻着“此原有唐相苏味道故里苏家庄，明初兵毁，后又建村，得名裴村。”由此推想，苏味道家族初居苏家庄，后遇兵乱而散居于周围数村或迁徙异地。

曾任解放军报社记者、编辑的苏邱人陆地，2000年在《关于唐代苏味道墓·苏邱的回忆及考释》一文中写道：

据史料记载，苏味道为栾城苏家庄人，死在四川眉山，后家人运回灵柩，葬于苏邱村。

2008年2月28日燕赵晚报刊登了《苏东坡的祖籍在栾城》一文，曰：

靖难之役中苏家庄被毁，后人改名为裴村。

2010年《栾城县志·苏味道与栾城》记：

苏味道的故里是位于县城西北苏家庄，明初毁于战火。

2016年10月12日在大裴村举办了由省、市、区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栾城苏氏祖居文化宣传研讨会》，公认苏味道的祖居是苏家庄。

2016年11月29日在栾城区委、区政府的关注下，召集了区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举办了“栾城区苏氏祖居研讨会”，重申了苏味道的祖居是苏家庄的观点，基本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栾城县地名志》是根据河北省地名委员会关于《地名志》出版方案的要求，在1983年地名资料汇编和1988年地名资料更新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在编纂过程中，参阅了栾城、正定、获鹿、井陘县志以及历史档案文献、家谱、碑文等大量资料，广泛走访知情人士，历时三年，在省市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予以出版。其中阐明：

今后任何单位或个人使用栾城县地名及有关资料，应以本志书为准”，“本书是推行地名标准化。具有法定意义的地名工具书。

县地名办公室是县人民政府管理地名工作的部门。栾城县人民政府1988年27号文件规定：

地名机构编辑出版的地名图、录、志、典等书籍，是提供社会使用的具有法定意

义的地名工具书，使用地名时，都应以此为准。非地名机构编辑的有关本县地名书籍，如历史沿革、旅游图，须经地名机构审核同意，报省、市地名机构备案。设置地名标志，由县地名机构组织协调，村、庄、古迹、纪念地、游览地要设置地名标志。地名标志的维护管理，由设置部门负责。对涂改、覆盖、破坏和擅自更改、移动的，责令纠正、修复。

## 六、马踏苏家庄与山西移民

有关燕王扫北和“马踏苏家庄”的传说，1983年《河北省地名志》、1992年《栾城县地名志》以及1999年《河北省村镇辞典》等书籍中都载有苏家庄的记叙，在大裴村“马踏苏家庄”的传说流传甚广。《明史》与《明实录》都有记载。

明初，朱元璋即帝位，立长子朱标为太子，封四子朱棣为燕王，镇抚北平。朱标早死，续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允炆即位，为建文帝。允炆年幼，怕控制不住局面，帝位不稳，听信侍臣齐泰、黄子澄之言，进行削藩，欲夺诸叔父兵权。惠帝支持黄子澄，遂先后废除了周、齐、湘、代、岷五位亲王。又派员控制燕王，燕王恐受其害，举旗反抗，出师靖除建文帝身边的奸佞之臣。首先迅速攻取了北平以北的居庸关、怀来、密云和以东的蓟州、遵化、永平（今河北卢龙）等州县，扫平了北平的外围，挥师南下。

惠帝建文元年（1399）封驸马都尉李坚为栾城侯，与耿炳文率兵三十万北征，阻挡燕军南下。建文元年八月，师至河北滹沱河地区，双方几十万大军在滹沱河沿岸展开激战。壬子燕王棣兵攻正定，突破雄县。壬戌燕王与耿炳文战于滹沱河，大败南军，斩首三万，伤亡无数。李坚被掳。耿炳文逃入真定城中，闭门固守。此役真定府所属各县是这次战争的主要战场，明代真定府辖今正定、藁城、栾城、获鹿、灵寿、行唐等县，栾城是其中战场之一。

建文帝听到耿炳文军败，任李景隆为大将军，代替耿炳文对燕军作战。东至沧州，北至燕京，南至德州、邢台一线，双方在此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拉锯式”争夺战。

建文三年（1401）二月，朱棣率军出击，先后于滹沱河、夹河、真定等地打败南军。《明史·太祖》：“闰月戊戌，遇于藁城。己亥，与战，大风拔木，杰、安败走，追至真定城下。”接着，又攻下了顺德、广平、大名等地。战争

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时间，南北交战主要在河北、山东。

此役栾城县志、正定府志、赵州州志均有记载。

同治《栾城县志》载：“己卯惠帝建文元年秋八月，封驸马都尉李坚为栾城侯，副耿炳文北征”。“八月己酉，耿炳文兵三十万驻正定。壬子燕王棣兵攻正定。壬戌耿炳文及燕王战于滹沱河北，败绩。燕将薛禄引槊中坚，禄挥刀直取，坚大呼曰：‘我李驸马，勿杀。’禄掳以见燕王，叩首乞降。”《藁城县志》载：“藁城当燕赵之墟，古今必争之地也。兵燹之后，人物凋耗，土地荒旷，户口田有存者仅三分之一。永乐十四年山西诸户以实藁城”。明代《赵州志·杂考》中载：“本州与宁晋县境内田地，国初大半抛荒，永乐间山西屯田，长子等民实之，听令开垦，永不起科”。《南宫县志·兵事篇》载：“燕王每攻一地，便屠其城，赤其地，残无人道地屠杀百姓，即所谓燕王愤甚，燕京以南，所过为墟，屠戮无遗”。战争期间人民大量外逃，造成河北人口急剧减少。史书上记载“青磷白骨，怵惊心目”，“长淮以北则鞠为草莽”。栾城“草来千里十室九空”，当时景状之惨，可想而知。

四年的“靖难之役”，给明初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经济以较大的破坏，而直接遭到战争践踏的地区，破坏更为严重，“长淮以北鞠为茂草”，马踏几个村庄并不为奇。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是一首在河北一带流传很广的民谣，而移民与“燕王扫北”导致的人口骤减亟待补充有直接的联系。元末明初屡经战乱，北京、河北、山东、河南人口锐减，为恢复农业经济，明初洪武年间从山西大举移民10次，永乐年间移民8次。其中：永乐三年九月，移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于北平、真定栾城；永乐十五年五月，移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民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县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真定府各县是重点充实的地域。明朝政府从人口密集的山西组织大批乡民，在洪洞县大槐树下集结，发给凭照川资，强行迁往各地。栾城的移民后裔多数笼统地说自己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其实是从山西各州县集中到洪洞县办理民手续后前往河北等地的。据族谱所记，栾城区聂家庄聂氏从山西榆次县迁来，岗头郭氏从山西马邑县迁来，南高陈氏从山西辽县迁来的。

苏家庄明初因遭兵毁，永乐间在原苏家庄一带重建一村，移民居住。《栾城县地名志》所记的南赵村、北赵村以及永安、王村应属此时的山西移民迁入村。

“裴村”是“赔村”的谐音，利用谐音命名或讨取吉利，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普遍做法，比如绘画的《猫蝶图》寓意为耄耋之高寿，蝙蝠题材的五蝠玉雕寓意五福临门，新婚夫妇床上撒大枣、花生、桂圆、莲子，寓意早生贵子。再如博野县东伯章村，原名东摆渡，因居漳河渡口以东而得名，明燕王扫北后，从山西夏县迁来此地的居民认为村名不雅，取摆渡与漳河首子的谐音，改名东伯章；保定市完县因为“完”字不吉利，于1992年改名为顺平县。

## 七、苏家庄遗址及范围

据《栾城县地名志》记载，栾城在唐前建置21个村，唐代建村6个，宋元建村30个，到洪武时已有村庄57个。同治《栾城县志》记，洪武十四年，栾城1480户，7634人。苏味道既然出生在唐初，那么苏家庄必是在唐以前建村。

苏家庄坐落在哪？新旧唐书载苏味道是赵郡栾城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初居在那个村，古书上没有记载，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也没说。只有到了1983年以后河北省各级《地名志》才说是“苏家庄”，即今之大裴村。

据2000年栾城县景点办崔冰岩调查分析：“传说中的苏家庄距当时栾城县县城焦家庄只有二、三里路，应属栾城之畴”。焦家庄往北三里正是大裴村，这与史书记载中的苏家庄相吻合。

苏家庄范围有多大，要看苏味道的庄园有多大。据《唐六典》记载，唐代官员的俸禄一般由禄米、职田、人力、月杂给、常规实物待遇几部分组成。唐前期正三品京官每年禄米400石，职分田9顷，杂役38人，月杂给8000文。另有公廨田11顷，以所收地租充作办公经费。《唐六典》还规定，三品官员还可有永业田25顷。以此计算，三品宰相苏味道可拥有庄田45顷，即4500亩地。若加上其长子膳部员外郎苏佃，三子山东兖州刺史苏佃，四子太原府司录参军苏惋以及其弟太子洗马苏味玄的庄田，何止上万亩。偌大的庄田覆盖了周围的苏邱、永安、王村等村。但在唐前，苏家庄临近的南赵村、北赵村以及汪家庄尚未置村。苏味道于唐神龙元年（705）卒于四川眉山，归葬河北栾城故里。除次子苏份留居眉山外，其他家族成员及其弟苏味玄的子孙仍居栾城。与苏味

玄的后人一起，在这块土地上勤劳耕作，繁衍生息，绵延至今，成为了今天的“赵郡苏氏”。

苏家庄有无遗址？据大小裴村村民讲，在建国前后农家打坯挖壕时，在“大跃进”时代号召“深耕细作”深挖土地时以及一些偶然的事件，在大裴村村东、村南、村西北乃至在南赵台和大裴村交接一带，都发现过残垣断壁、灶台和砖瓦遗址。遗址呈现出了散居村落的特点，这样的村落很容易在战事中遭“马踏”，被摧毁，这恰好为口碑相传的“马踏苏家庄”提供了印证。

大裴村原有“乡亭”，相传碑高2米左右，碑基方形，莲花座样，四方立体碑身正面的碑文刻印有篆书“苏家庄”三字，其他三面为篆体文字，方帽盖顶。乡亭为“乡中公舍，汉制，百户为一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每亭设公舍一间，供行人止息。”“汉制列侯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由此可知置村于汉代的苏家庄，按照规制其受封者属于食采乡亭的级别。汉顺帝时苏章任冀州刺史，其后裔有官于邯郸者，因功于民，遂家于赵郡。到了唐代，栾城苏氏发展成为赵郡苏氏最显赫的一支。苏德聪《中华苏氏十八位宰相》、苏慎《三苏家族世系汇录》等苏学研究专家的文章均明确指出赵郡苏氏的聚居地为苏家庄，与大裴村的石碑资料和赵郡苏氏源流相吻合。

河北师范大学刘昭文教授在苏味道祖居宣传研讨会上发言说：“古代殡葬制，人死后都要归葬在自己家的田地里，苏味道墓在苏邱村，那无疑是苏味道的庄田，但那时还没有苏邱村庄，苏味道不可能出生在自己的墓地苏邱，应另有他处，过去既有《地名志》史料记载和村名碑，那就是苏家庄。说苏家庄是苏味道祖居地也符合常情”。苏味道的庄田很多，将其庄田村称为故里也是值得探讨的。依据《栾城县地名志》和《栾城县志》所记剖析，苏家庄（今之大裴村）是苏味道所居之地，苏邱是苏味道故里庄田的墓地，南赵村苏氏只能说是苏味道的后裔。

一千多年来，栾城的苏氏后人历经了朝代更替、战火硝烟、天灾人祸，默默无闻地过着平凡的生活，几经迁徙流变，苏氏一脉如今已经繁衍到了栾城县的29个村庄，后遇兵乱，苏家庄人散居于周围数村或避难于外地。朱棣称帝后，从山西洪洞移民迁入苏家庄一带，附近的赵台、王村、永安以及南赵村、北赵村就有山西移民。也有许多人迁徙到了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山东、山西、江苏、福建等地。除此之外，在栾城县数村生活的仍有苏味道、

苏味玄的后裔。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苏氏文化也是不断向纵深发展的，他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的。原有的地名过时了或有不妥由新的名字代替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栾城初名栾邑，寺下原名台头寺，乏马曾名杀狐林，他们的更替是正常的。提出苏家庄是苏味道的祖居地，是栾城苏姓文化传承的发展。

苏家庄是赵郡苏姓始祖的起源地，栾城眉派苏氏的发源地，也是栾城苏氏文化的源泉，在中国乃至世界苏姓宗亲中，都已知道栾城原有一个苏家庄。2003年在栾城县政协代表大会上发放的《苏氏源流录》，书中记有“苏味道的故里是苏家庄”。2006年在第七届世界苏姓宗亲总会代表大会上发放了1000本《苏味道传与苏姓史话》大会资料用书，书中就有关于苏味道故里“苏家庄”的史料，人手一册，传至大陆各省及东南亚各国。2012年由世界苏姓宗亲总会编修出版的《新编苏氏总族谱》26本中第三册刊载：“（始祖苏味道）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三月十一日生于赵郡栾城苏家庄”。中国谱牒专家常州苏慎又在《三苏家族世系汇录》中选定：“苏味道生于赵郡栾城县苏家庄”。栾城正是抓住这些机遇，有效地利用这张名片，倾力打造，就会使栾城文化更具传统化。倘若将苏东坡纪念馆、苏味道墓地故里、苏味道祖居地、苏园以及清明桥连成一体，进而与赵县的大石桥、柏林寺联合形成一条旅游线，就会加速中国乃至世界赵郡苏氏和眉山苏氏后裔的联系，促进其来栾认亲谒祖，进而牵动栾城的经济的发展。

## 八、打造苏家庄东坡小镇文化

目前，大裴村的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村支部书记彭国林、村委会主任张军伟昼夜谋划、跑项目，搞设计，邀请市区专家领导指导。2016年10月12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苏氏文化研究会和栾城区大裴村村委会联合主办的“栾城苏氏祖居宣传研讨会”在大裴村召开。省市历史学家、苏氏文化研究专家、评论家、作家、诗人等专家学者，苏轼后裔、京冀两地关注东坡文化产业的企业家和媒体记者，栾城区农工委、宣传部、文广新局、史志办、栾城镇镇长共计60余人参加了这次研讨活动。研讨会公认苏家庄为苏味道祖居地，就如何打造“栾城东坡文化片区”为主题，栾城区苏氏文化研究会会长苏士福先生就“靖难之役”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燕王扫北（碑）”与“马踏

苏家庄”，以及明永乐年间“洪洞大移民”时在苏家庄遗址重建大裴村的情况进行了解读。大裴村八旬老翁裴双亭就位于大裴村、小裴村一带的苏家庄遗址情况和原立于五道庙附近的“苏家庄”乡亭情况，边说边画进行了追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苏氏文化研究专家、河北出版集团精品部主任王书华就如何打造栾城东坡文化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中国著名诗人刘章先生就东坡文化的价值和栾城东坡文化的天时、地利、人和，谈了开发栾城东坡文化旅游的紧迫性；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河北大学刘邵本教授就如何让苏味道归葬地苏邱村和唐宰相苏味道故里苏家庄（大裴村）等共同发力联合打造东坡文化片区谈了自己的建议；原河北电视台党委书记梁靖华、燕赵东坡诗友社社长李宗昌、河北省文史馆馆员、中国苏东坡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苏新平、味道诗词学会理事长王增强等专家学者都先后发言，对开发栾城东坡文化旅游的可行性、紧迫性做了充分论述，并提出了很好建议。栾城东坡文化片区是全省重点打造的12个美丽乡村片区之一。计划将位于城区柴武台公园的苏东坡祖籍纪念馆升级改造，在赵郡苏氏祖居地苏家庄（今大裴村）打造苏府和苏氏赵郡堂，依托南赵村、北陈村的农业产业园区苏园并延展到清明桥打造东坡文化生态公园“苏园”，在苏味道归葬地苏邱村依托苏味道墓规划苏氏祠堂和三苏文化街。会上，石家庄三苏文化旅游开发总公司张运红董事长赞同和支持栾城苏学文化旅游总体的开发。莅临研讨会的区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新喜、农工委副主任张振山、史志办主任段广平、栾城镇党委书记张彦国等领导对本次研讨会给予高度肯定，并就不断拓展研究思路和挖掘研究深度、结合美丽乡村打造东坡文化旅游、发挥地方史志作用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等谈了具体的推进措施和指导意见。

2016年11月29日区政协受栾城区政府委托组织召开了栾城区三苏祖居地研讨会，栾城区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负责人，文化界人士以及大裴村（原苏家庄）、苏邱村干部40多人参加。大裴村、南赵村双方代言人各述己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大裴村（原苏家庄）代表张斌亮出《栾城县地名志》一书，理直气壮地进行举证苏味道故里是苏家庄，南赵村没人参加，十多年没举行过任何苏氏研究活动，而提出南赵村是苏味道故里的代言人则互相推诿，杨梅山说是听檀承琳说的，檀承琳则说他是听已去世的白洪范先生说的。最后，杨梅山拿不出史料根据，当场承认提出南赵村是苏味道故里的

证据都是听别人说的“旁证”，真相大白。

2017年2月11日栾城区苏氏文化研究会在大裴村成功地举办了苏味道正月十五元宵诗会暨大裴村东坡学校揭牌仪式，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安徽、陕西等地苏氏文化联谊会会长莅临，世界苏姓宗亲总会驻大陆联络处主任苏振武揭牌致辞。现场察看了大裴村地名碑和“苏家庄”乡亭遗址。1350年前眉山苏氏始祖苏味道曾在此地生活就学，300年后其后裔苏洵、苏轼、苏辙眉山三苏横空出世。苏味道十一代孙苏东坡无论在为官、为民、文化、教育、诗书、绘画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为世人所景仰。苏轼是北宋文坛上一颗耀眼的巨星，也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罕见的通才、奇才。他的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更以文名驰骋于北宋文坛。他是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特殊人物。无论是宦海几起几落传奇般的人生经历，还是在诗词文赋上开一代风气之先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旷世才华，都令世人瞩目。栾城区拥有着千年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成立东坡小学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理应秉承东坡精神，传承东坡文化，打造特色教育名校，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在这片文化沃土上，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文化治校”的办学理念，致力于兴办一所现代化、国际化、本土化的社区优质学校，以“爱满天下”的教育情怀，培养富有爱心的学子，以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学子报效祖国和人民。上海苏氏联谊会会长苏寿梁、天山集团经理李强对东坡小镇的筹建表示大力支持，苏寿梁当场捐资1万元。

2017年3月11日栾城区苏氏文化研究会带领天山集团和大裴村支部书记赶赴上海，求助上海苏氏联谊会会长、上海园林设计院院长苏寿梁设计规划栾城区东坡小镇方案，受到了上海苏氏联谊会苏寿梁、苏永祁、苏兴良宗长的热情款待和支持，同程参观了上海沈湖生态农庄和两个东坡小镇，交流了设计项目及申报程序，苏寿梁坦率表示全力支持栾城区东坡小镇的筹建工作。大裴村支部书记彭国林则表态，自己做为一村之主责无旁贷，决心竭尽全力打造好苏味道祖居“苏家庄”的景区建设，不负全村村民及社会的期盼。

苏士福，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苏氏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 苏轼对河北地域文化的贡献

李占才

**内容提要** 苏轼在定州任职期间，对河北地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过积极影响。其官品文化、治军文化、兴业文化、爱民文化、育人文化、善艺文化、风物文化至今被人所称道，已成为该地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苏轼 河北地域 文化 贡献

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贡献，则是指对国家或公众做出的有益的事情。按照这个定义来衡量，文化巨人苏轼，于元祐八年（1093）十月至元祐九年（1094）闰四月到河北定州任职，虽然只有短短六个多月的时间，但其对河北地域文化做出的贡献则几乎是全方位的。特别是他的官品文化、治军文化、兴业文化、爱民文化、育人文化、善艺文化、风物文化尤为鲜明，至今被人所称道，亦对河北地域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该地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

## 一、官品文化

在北宋中期之后，统治阶级内部主张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之争一直没有停歇。苏轼属于旧党，其官职也不断随党争而起伏。元祐八年（1093）九月，亲近新党的宋哲宗开始亲自主政，时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的苏轼被冷落。他知趣赶紧要求下派。宋哲宗便乘机把他打发到了当时处于边地的定州。

北宋时的定州有定州路和定州两种建制：定州路属军事机构，统辖8个州（军）的军事防务，包括定州、保州、深州、祁州、广信、安肃、顺安和永宁；定州属行政区划，管辖7个县，包括安喜、曲阳、唐县、望都、北平、无极、新乐。路、州两种建制共辖今河北省24个县市，可见其涉及河北地域面积不小。苏轼这次下派，在保留“双学士”的基础上，宋哲宗又新任了他两个职务：一是军事职务“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相当今天的军区司令；二是行政职务“知定州军州事及管内劝农

使”，相当今天的市长。所以，本文中所提到的定州，包括宋时的定州路和定州。

苏轼此次下派定州赴任军地两职，虽然百感交集，心情复杂，但他到了新的任所之后，仍然坚守了自己一贯的为官信条和做法，体现了他的官品文化。

首先是忘身忧国。苏轼向定州出发时，曾说“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东府雨中别子由》）<sup>[1]1991</sup>但是，他深知自己所去之地是“沿边重地，此为首冠”<sup>[2]1018</sup>，作为朝廷命官，自己理当心怀国家，以事业为重。启程前连夜写了《朝辞赴定州论事状》<sup>[2]1018</sup>，以老师的口吻对新皇帝今后的执政治国，诚恳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表达了自己强烈的“臣不胜忘身忧国之心”。在去定州的路上，又给宋哲宗写表状表示：要“强力安邦，当思所报”。到定州后，又立即写了《定州谢到任表》<sup>[2]704</sup>，表示自己“兵民重寄……臣敢不勤恤民劳，密修边备。苟无大过，以及期年。”还说“坐食何功，扪心知愧。”（《定州到任谢执政启》）<sup>[2]1333</sup>一定要干一番事业。后来又说：“我亦旗鼓严中军，国恩未报敢不勤”。（《子由生日……为寿》）<sup>[1]2015</sup>

其次是敢于担当。他到定州后经过调查了解，发现由于其前任的不负责任，造成当地“军政坏弛，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廩赐”。<sup>[3]10638</sup>军内盗窃、酗酒、赌博、贪污比比皆是，“事不可悉数”。针对这一现状，苏轼敢于担当，果断法办了有勒索军人行为的云翼指挥使孙贵，又发配了有监守自盗行为的军队管库员田平和张全。对于不听指挥装病不参加检阅的副总管王光祖，当即让秘书写了罢免他的奏折，王光祖赶紧“惧而出”。<sup>[3]10638</sup>并严刹了军人参与赌博的歪风，定州军政机关风气大变。

再次是团结同僚。工作时，苏轼积极发挥各班子成员的作用，点检营房，调查案件，修理营舍，施工备料，都放手让大家去干。就连到各庙宇给百姓祷雨祈福都要带上班子成员大家一起去。如“苏轼祷雨岳庙，同李之仪、李士龙、郾长卿、孙敏行、□□（笔者注：当为管勾刘焘）、贾温之”。<sup>[2]</sup>除此之外，闲暇时，

他就与班子成员们一起切磋书画、吟诗作文。有时还互相小有馈赠酬答,例如书画、器玩、土特产、一首好诗,在情不在物,很有文人文化气息。班子成员们团结得就像一个大家庭,苏轼就像一个很有凝聚力的家长。

还有,始终保持廉洁从政。苏轼的廉洁是有名的。到定州后,他仍然坚守“应笑来时无一物,手携拄杖却空回”的廉洁信念,把为官清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表现了他“廉者为我廉,我以此名为”(《廉泉》)<sup>[1]2054</sup>的决心。他不仅不贪不占不盘剥百姓,还拿出俸禄帮助和施舍给百姓,导致他家生活常常出现困难。这一点是苏轼最无隙可击的,他的政敌多次往死里整他,都是从其它问题入手,从没能以腐败为理由。

这些官品文化,常被当地历代官员所赞颂,成为定州官员的楷模。给定州历代官员勤政爱民,廉洁自律,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 二、治军文化

### (一) 从严训军, 提高战斗力

哲宗时期,北宋已经“承平百年烽燧冷”。苏轼到定州后,看到这里“边政颓坏,不堪开眼。”(《与钱济明十六首》其一)<sup>[2]1549</sup>“沿边诸郡,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他甚至发现,这里的军队“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为此他忧虑,“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猝。”(《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sup>[2]1024</sup>苏轼知道要改变这一现状,必然颇费锄治,难度不小。但他还是下定了决心,不做太平官。他采取了整顿军队,严明纪律,检阅部队,布勒战法等一系列措施,很快使定州禁军面貌焕然一新。定州百姓看到检阅时部队整齐的步伐,惊赞“不见此礼至今矣。”<sup>[3]10638</sup>

### (二) 恩威并重, 关心士卒

苏轼治军并不是一味采用严刑峻法,他也有温情的一面。视察中他看到定州禁军“营房大段损坏,不庇风雨,……诸营军号,例皆暗敝,妻子冻馁,十有五六。……上漏下湿,不安其家。”(《乞降度牒定州禁军营房状》)<sup>[2]1021</sup>“禁军大率贫窘,妻子赤露冻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坏,不庇风雨。”(《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sup>[2]1024</sup>苏轼立即向皇帝报告了整个部队需要修缮的房屋间数和必要的款项,及时改善了禁军和家属的住房和生存条件,大大鼓舞了士气。

### (三) 发展“弓箭社”, 寓兵于民

苏轼知道,保卫边疆的安全,光靠军队不行,一有情况,军队根本顾不过来,必须动员当地百姓,主动参与进来。他发现当地民间早有一种叫“弓箭社”的民兵组织,这种组织在保护家园和财产方面曾发挥过很好作用,很受百姓欢迎。经他了解,这种组织在定州沿边588村中有651个,有成员31411人。但是,这种组织由于和王安石变法时制定的《保甲法》存在冲突,熙宁年间曾被北宋政府宣布为非法。苏轼便冒着反对变法的危险,连上两个奏折,强烈要求恢复这一组织,说“臣再三思虑,惟有整葺弓箭社一事,名不张皇,其实可用,若早获朝旨施行,令臣更加意拊循激励,其人决可使,北贼望风知畏,不敢于地分内作过。”(《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sup>[2]1034</sup>奏折中还申请皇帝拨款支持这一组织。因这事涉及到国家安全,苏轼又说得有理有据,宋哲宗不好不答应,便诏谕准奏,连申请的支持经费也批下来了。弓箭社合法了,人们又可以合法的保卫家园了,百姓欢呼雀跃。

弓箭社的合法化,大大鼓舞了定州一带民间的尚武之风,历代战争中河北民兵积极参战,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近代抗日战争中,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平原游击队、雁翎队等都是民兵的杰作。定州曾涌现出著名民兵战斗英雄“三山”(郝庆山、甄凤山、杨银山),其中郝庆山于1950年被选为全国民兵战斗英雄,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 三、兴业文化

苏轼非常重视定州一带经济活动的振兴、发展和推广,他尤其注意在开发本地资源方面着力,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他为此作出努力的同时,还常常让具体的经济活动体现出当地特有的文化色彩。

北宋时,定州一带松树茂盛,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木材,还提供了全国最好的松膏(松香,也叫松脂)。苏轼一生爱松,对松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苏轼对定州一带的松树评价极高,说这里的松树“其木理坚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凛然孤清,不能无生。生此伟奇,北方之精。霜中之英,以洗我瘴。”(《偃松屏赞》)<sup>[2]616</sup>

如此好的树木,必然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他在来定州的路上,夜渡漳河时,见兵士燃松明照路,如此“千岁之妙质,而死斤斧于鸿毛。”(《中山松醪赋》)<sup>[2]12</sup>像人才一样被浪费,觉得

太可惜了，遂有了用松树给当地经济做些贡献的想法。

到定州后，他试吃这里的松膏，据说此物可以治皮肤病，聪耳明目，壮腰补肾，轻身健体。“余为中山守，始食北岳松膏，为天下冠。”（《偃松屏赞》）<sup>[2]616</sup>他还研究出了一套服食松脂的方法，并将自己发明的这方法向人推广：

细布袋盛清水为沸汤煮，浮水面者，以新篲掠取置新水中。久煮不出者，皆弃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制，但削去皮，捣罗拌匀，每日早取三钱匕着口中。用少熟水搅漱，仍以脂如常法揩齿。毕，更啜少熟水咽之，仍漱吐如法。能坚牢齿、驻颜、乌髭也。——（《服松脂法》）<sup>[2]2353</sup>

在向世人宣传当地松膏药用价值的同时，苏轼还想用松树给当地生产一种新酒。他自己研究采取“出肪泽于烹熬。与黍麦而皆熟”（《中山松醪赋》）<sup>[2]12</sup>的方法，即将松节（松树的结节）煎熬取得油液，再将黍子和小麦与此油液一起酿造。酒制造成功后取名“中山松醪”。为了扩大知名度，他专门写了《中山松醪赋》，到处抄录给朋友。还给外地朋友和京城高官作为礼品赠送，并介绍此酒的诸多功效。经过他的这番努力，从此定州又多了一种远近闻名的酒产品。

苏轼当年酿造的中山松醪酒，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定州名酒。它以“一口品三酒（白酒、米酒、药酒），五味（醇、香、蜜、酸、苦）归一盅”的特点，名响国内外。1915年曾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国际酒赛，与茅台酒一道获金奖，之后又多次荣膺国内外大奖。

另外，定州是宋代五大名窑——定窑所在地，是当时定州经济的一大支柱。苏轼对定州的陶瓷也注意做宣传推介。过去曾有“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评价，到定州后，他常把定瓷产品作为礼物赠送给亲友，赠送时还要作诗宣传一番。例如，他曾给弟弟苏辙寄去定瓷礼品并写诗说：“小甌短瓶良具足，稚儿娇女共燔煨。寄君东阁闲蒸栗，知我空堂坐画灰。约束家童好收拾，故山梨枣待归来。”（《寄榴合刷瓶与子由》）<sup>[1]2010</sup>是说这瓷器如何有用，一定嘱咐家人好好保存。

应该说，定州瓷器的名气因苏轼而更有增益。现在，定窑遗址在保定的曲阳县，定瓷产品至今生产不衰。以制作技艺精湛、造型精巧、瓷质莹润、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而著称，产品畅销国内外，现是该县的重要产业。

#### 四、爱民文化

作为一州之首，苏轼还把体察民情、关心人民疾苦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到定州后他通过视察发现，元祐八年（1093）定州水灾严重，减产五成。第二年，定州部分县便出现春荒，多数百姓断粮。在宋朝，地方遇灾荒给皇帝写奏折请求救济，是地方官救灾方式之一。年前，苏轼刚为修营房和恢复弓箭社写了两次奏折要款，以苏轼当前的政治处境，是不宜反复给皇帝找麻烦的。何况在救济百姓方面他过去曾吃过亏，朝中的政治对立面曾以他向朝廷要钱“妄赈饥民”为由，多次弹劾过他。现在正是这些对立面得势掌权，宋哲宗又对他没有好感，在这个当口再写奏折要款风险极大。

可是，苏轼最见不得百姓受苦，他决心将政治风险置之度外。便毫不犹豫地写了《乞减价糴常平米赈济状》，上书皇帝用低价出售国库粮的办法救济灾民。因没花国家的钱，哲宗准奏。可是落实中苏轼发现，这些灾民因实在太穷根本无钱购买这些减价粮食，此法失败。望着饥饿的百姓，苏轼不顾个人安危，赶紧又想了个把已快损坏的军粮让富户担保，先借给饥民再还的办法，给皇帝写了《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的奏折。

其实，反复给皇帝写奏折找麻烦，苏轼也知道容易给自己找麻烦。一次他给朝中的同事写信谈起这事，说自己“频读朝听，悚息待罪”（《与刘仲冯六首》其六）<sup>[2]1472</sup>，意思是为了定州的事频繁干扰亵渎朝廷，自己也是每日恐惧地屏息等待，不知是否又会被问罪。可见他也知道，为了定州，为了百姓，在自己政治处境十分不妙的情況下，还反复为百姓写奏折，这是一种冒险之举。

救灾正在进行中，定州又遇到了严重春旱。在那个时代，由于生产力、思想认识和科技知识水平的局限，一遇天灾，地方主官们除去申请皇帝救济，其他就是逢旱祷雨、遇雨祈晴、求神禳灾等。对此今天我们应该理解，苏轼也不例外。他先是在定州城内各庙宇祈求神灵，然后他又三次去五十里外的曲阳县北岳庙进香祈祷。在定州期间，他写的谒庙和祈雨祝文就有十一篇。

苏轼经常微服出巡，深入民间，与百姓建立了很深的感情。隆冬季节，苏轼去望都县视察，途中见一衣衫褴褛少儿上前哭诉自首。原来此儿名刘丑斯，自幼丧母，与病父讨饭为生，夜宿破窑。一日，有二歹徒入窑强将父亲身上的一件棉衣抢走，致病父冻死。某日夜，刘丑斯潜入二歹徒家，趁二歹徒熟睡将其杀死。苏

轼顺便把孩子带回衙门，又询问核对了情况，恻隐之心顿生，当即决定，给此儿救济两万钱，并留州衙做了一名小吏，让他认字习武，希望他将来成才。

特别让人感动的是，苏轼还专为这孩子写了一首长达四十行的五言诗《刘丑斯诗》<sup>[1]2003</sup>。在诗的最后，苏轼语重心长的对刘丑斯说：“笔砚耕学苑，弓矛战天骄。壮大随尔好，忠孝福可徼。相国有折肋，封侯或吹箫。人事岂易料，勿轻此焦侥。”举国闻名的大文豪给一个农村孩子专写一首诗，可见苏轼对百姓的感情之深，这是他浓厚的爱民情愫的真情表露。

苏轼的爱民文化，给后世官员树立了楷模，其影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

## 五、育人文化

定州禁军原来存在的赌博之风对民间影响很大。苏轼经过对军队赌博歪风强力整顿，赌博现象已经销声匿迹，但是社会上此风仍然存在。有人公开在定州大街上设“柜坊”（赌场），“城中有开柜坊人百余户，明出牌膀，召军民赌博。”（《乞降度牒定州禁军营房状》）<sup>[2]1021</sup>苏轼认为整顿世风、化民育人是自己的职责，必须倾力抓好。他立即对“开柜坊人，出榜召人告捉。有王京等四十家，陈首改业，其余并走出州界。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sup>[2]1021</sup>定州民风迅速改观，百姓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定州古有尚学之风，曾有“教子向学，朝诵暮读”之景，只因这里政怠治散，使定州教育荒废多年。相传苏轼整顿军队和民间的赌博之风后，立即着手恢复学校。苏轼还亲自到学校具体指导，与学生见面交谈，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他的诗文中留下了一首《定州学生砚盖隐语》，保留了他恢复整顿学校的些许信息。一次，苏轼去学校视察，来到学生中间，他高兴地以砚台的盖子为谜底，给孩子们出了一个谜语让大家猜：“碑石犹在，岷山已摧。姜女既去，孟子不来。”<sup>[2]2538</sup>意思是“碑”字去了“卑”，只剩了“石”，“岷”字去了“山”，只剩“见”，二字相合为“砚”。“姜”字下边去了“女”，“孟”字上面去了“子”，剩下的字相合为“盖”，这便是“砚盖”两字。可见当时学校形势不错。

苏轼在定州期间，除去发展当地教育外，不忘亲自教授生徒，培育学子。他曾在这里收过一个门生王安中。王安中为农家子弟，一日从曲阳步行五六十里来州衙登门求见，执意要做苏轼的学生。当时国家形势复杂，苏轼政治处境也不明朗，况家庭经济也不富裕，实非收

徒之时，家人便建议他是否婉拒。

可是苏轼历来喜欢提携晚生，诲人不倦，乐于助人，便没有当即回绝。又见眼前这后生五官清秀，举止稳重，性情淡定，面善谦卑，浑身透着英气，当下便有了几分好感。接着问过姓名、贯址、年甲，又问过他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知识，均能对答如流。苏轼惊讶不已，当即决定收留。对此，典籍有记载：“始，东坡帅定武，安中未弱冠，犹及师事焉。”<sup>[4]523</sup>收徒之后，苏轼无所不教，王安中无所不学，因获真传，心慕手追，长进很快。王安中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公亦自谓得师也”<sup>[5]1143</sup>。

可是不巧，到第二年（1094）闰四月，苏轼突然被贬谪南行。王安中“未卒业而坡去”。<sup>[4]523</sup>求同行，苏轼突受打击，对未来心中无底，恐性命难保，不宜耽误安中前程，未允，无奈师徒分手。

毕竟王安中已在苏轼处得膏腴沾溉，打下了基础，经继续努力，六年后即中进士。后历任大名主簿、秘书省著作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尚书右丞、转尚书左丞，官至副相。王安中擅长作诗和骈文，徽宗对其诗作曾“赏叹不已”，<sup>[3]10721</sup>被时人誉为“南北宋间佳手”。因其诗文成就斐然卓群，成为南北宋之交文坛上的苏门殿军。

定州尚文之风滥觞于宋代，自宋之后，府学、州学、县学历代不断，有“中山庙学甲天下”之美誉。此地至今教育发达，学风蔚然，人才辈出。这些，都能在苏轼那里找到源头。

## 六、善艺文化

苏轼在定州虽然只有六个多月时间，却写出了赋、诗、词、文达138篇，而且其中有许多名篇佳作。可惜书法绘画未见存，当也不在少数。其可见之作今已是定州文化的宝贵遗产。除去赋、诗、词、文之外，苏轼在定州还有许多其他艺术方面的贡献。例如音乐“秧歌”就是其中之一。

苏轼来定州后，就知道了安喜县北部有一片著名的黑龙泉湿地。一次视察来到这里，见村中的百姓们正在水田里弯腰插秧，个个满脸是汗，十分劳累。苏轼想给百姓做点事的念头又涌现了出来，他考虑百姓插秧时一声不响，闷头劳动会更累，何不边插秧边哼个曲调？回到州衙，他便参考老家眉州百姓唱的劳动曲子，以及江浙一带民间的小调，将其互相融合，创作了一首适合插秧时哼唱的曲子。他再次回到黑龙泉一带，将此曲子教唱给了当地百姓。

由于该曲子节奏与插秧的动作吻合，且调子不高，适合弯腰时唱。人们边插秧边唱，注意力转移了，大大缓解了劳累。从那以后，这《插秧歌》在安喜人中迅速唱开，不仅插秧的人唱，不插秧的人也唱，成了这一带百姓文化娱乐生活的一项内容。这首插秧歌经过历朝历代的丰富完善，后来竟演变成了一个地方剧种——“定州秧歌”。该剧种现流行于石家庄、定州、顺平县、唐县、望都县一带，2006年还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苏轼是一个兴趣爱好极其广泛的人，他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除去做好应做的官场之事外，他的业余爱好常常填充了他的所有业余时间。到定州做了“军区司令员”和知州，这些兴趣也不减，给河北文化增加了新的内容。比如，他还是一位赏石家。

一日工余，他到衙署后边的“中山后圃”逗留散步，忽然发现在一棵已枯的大榆树底下，堆着一堆过去打仗时当武器用的抛掷石头。苏轼用手搬动石块，忽然发现有一块石头很奇特，他用手擦去浮土，发现这块石头黑质白脉，光滑润泽，图案如江河奔流，又若平川飞雪浪，精致中透着雄伟。多美的石头啊！苏轼欣喜不已，遂喊来勤务兵，将石头抬到室内，经过刷洗，焕然一新，当即给它取名“雪浪石”。

后来，他还让人用曲阳白石做大盆一个盛之，并为此石专建雪浪斋一处。并邀同僚共同赏石赋诗。这期间苏轼以此为题写下了著名的《雪浪斋铭》和《次韵滕大夫三首》，还将诗广寄友人，求和诗。没想到这块石头竟然在北宋文坛引起不小轰动，文人墨客争相赋诗，当时，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许多名士都有和诗寄来，一时竟成为北宋文坛一件众人瞩目之事。

此石和石盆现定州有存，为定州八景之一，是游客必观之物。盆唇刻着《雪浪斋铭》<sup>[2]574</sup>：“尽水之变蜀两孙，与不传者归九原。异哉驳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飞空漱其根。东坡作铭岂多言，四月辛酉绍圣元。”因这段铭文首尾相接没有标点，毛泽东主席1952年视察定州时，曾让陪同的省委书记和省政府副主席朗读，他俩因文化低都读不出。毛主席告诉他们哪里是头，哪里是尾，然后用湖南口音读给大家听，并叮嘱他们要注意多学习文化。

苏轼重视节庆文化。北宋时，汴京城元宵节盛行“鳌山灯”文化娱乐活动。“鳌山灯”就是用木料等物搭成一个大龟的形状，在龟身上再搭起一个隆起的山形，在龟身和山上放置灯

碗。“山上”有山石、牌坊、宫阙，上面结彩悬花，灯碗有几百盏。为表现传说中的神仙及仙境，上摆设佛、仙、神的纸型，形如真人大小。山左右各设有一个露台，是乐师奏乐之处。这种文化活动一般在元宵节时举行。据《武林旧事》载：“时取旨起立鳌山，灯之品极多。……禁中尝令作琉璃灯山，其高五丈。”<sup>[6]50</sup>苏轼为了给定州百姓节日期间增加一项文化娱乐内容，把在京城元宵节盛行的鳌山灯传到了定州，并曾经成功的举行了一次这样的活动。在他写的《上元夜》<sup>[1]2098</sup>中曾提到：“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兴。牙旗穿夜市，铁马响春冰。”现在，鳌山灯是定州一带至今保存的节庆文化娱乐活动。

定州一带，后世文学、绘画、音乐、演艺人才群星灿烂，有的还享誉全国。这些，与苏轼的影响也是有关的。

## 七、风物文化

苏轼远祖是河北栾城人，他本人虽在南方出生、长大，但他和家人一直对河北怀有追远之情。苏轼的书画常常落款“赵郡苏轼”，弟弟苏辙的诗文集亦取名《栾城集》。据说栾城苏氏和眉山苏氏至宋时还有来往。所以苏轼来到河北，对这里的地理位置、山川草木、包括季节气候都特别欣赏，并觉得亲切，期间为此倾注了不少文字，抒发了自己对远祖地的深深情愫。

比如地理位置，他说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燕南垂，赵北际，其间不和大如砺”。（《送将官梁左藏赴莫州》）<sup>[1]846</sup>“燕南赵北，昔为百战之场；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谢监司礼启》）<sup>[2]1337</sup>“沿边重地，此为首冠。”（《朝辞赴定州状》）<sup>[2]1018</sup>“中山保塞两穷边，卧治雍容已百年。”（《次韵李端叔送保倅……寄子由》）<sup>[1]2016</sup>“中山古战国，杀气浮高牙。”（《三月二十日多叶杏盛开》）<sup>[1]2021</sup>

对山川草木，他说“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岱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黄昏。削成山东二百郡，气压代北三家村。”（《雪浪石》）<sup>[1]1998</sup>“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临城道中送别》）<sup>[1]2024</sup>

季节气候，河北的环境气候与南方迥异，但他仍把他看做自己的家乡一样去观察、欣赏和描写。他写春天，“春工了不睡，连夜开此花。芳心谁剪刻，天质自清华。”（《三月二十日多叶杏盛开》）<sup>[1]2021</sup>“西园牡蓂夜沉沉，尚有游人卧柳阴。鹤睡觉时风露下，落花飞絮满衣襟。”（《三月二十日开园三首》）<sup>[1]2022</sup>“郁郁苍髯真

道友，丝丝红萼是乡人。何时翠竹江村路，送我柴门月色新。”<sup>[1]2022</sup>

他写定州的冬天：“边城岁暮多风雪，强压春醪与君别。玉帐夜谈霜月苦，铁骑晓出冰河裂。断蓬飞叶卷黄沙，只有千林蒙松花。”（《送曾仲锡通判如京师》）<sup>[1]2011</sup> 真是“燕南赵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峰，地裂冰谷。”（《偃松屏赞》）<sup>[2]616</sup> 甚至对大风沙都怀了别样的感情。例如他这样写这里的风沙：“冲风振河朔，飞雾失太行。相逢不相识，下马须眉黄。洗眼忽惊笑，见此玉节郎。喜有贤主人，共惜残烛光。”（《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中北使》）<sup>[1]1992</sup> 在河北历史上，如此大量系统的描述、欣赏和讴歌这里的山川景物，苏轼是第一人。

他不仅对河北如此倾情，还在公事之余，在州衙内外及庙观场所亲自种松植槐，为装点这里贡献自己的力量。苏轼作为一个文人，以文入仕，以文而显，自然对孔子顶礼膜拜，他到定州后曾两次参拜定州著名的文庙，即孔庙。为了体现自己的虔诚，除去焚香叩头，祭供礼品，宣读祝文外，他还在庙中亲自动手栽下了两颗槐树。现在定州城内文庙院内的这两棵槐树，今人称之为“东坡双槐”。又因这两棵槐树一棵树冠庞大，如飞舞之风，一棵姿态挺拔，矫健如龙，人们又称之为“龙凤双槐”。现在两棵槐树虽经千年风雨，至今仍郁郁葱葱，枝叶茂盛，生机盎然，成为定州的一道风景，也是游人来定州文庙必观赏凭吊之物。

岁月虽然远去近千年，燕南赵北之际，这里的山水风物依然美丽，且更加丰富多彩；地理地位更加重要，只是不再因是边关重地——“中山（今定州）保塞（今保定）两穷边”的境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尤其是当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宋朝定州所管辖地域之内，特别是其中的保定，正处于协同发展的核心区域，保定也已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更是北京疏解承载之地，地位十分重要。由此可以告慰苏轼的是，他当年的为官之地，在这种地域地位的新的变化中，他对此地的诸多文化贡献必定会继续得到彰显，其文脉亦会源远流长，这里的明天会更好。

#### 注释

- [1]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2]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3] 脱脱等《宋史》，延边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社2005年版。

[5]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

[6]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李占才，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上接第45页）《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曾刊发笔者关于东坡《竹枝歌》、《归来引》等9篇诗中词新证文章。苏学研究专家韩国强先生撰文赞许。当年这场争鸣，贵在学术界、学报界遇上多年难逢的良机，贵在地方高校学报开拓“东坡词”研究新领域。正如王兴全先生所说：“‘三苏研究’成为了学术领域一个争鸣的平台，从而推动了相关研究向深入发展，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学报及特色栏目的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有利于该特色栏目后期进一步建设和发展。”

习近平主席号召我们：“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让我们坚定地沿着党中央指引的科技光明大道向前奔去。

#### 注释

- [1] （南宋）王十朋《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  
[2] （南宋）施元之父子、顾禧合编《注东坡先生诗》。  
[3]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4]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6] 《文艺研究》，1990年第4期。  
[7] 《特色栏目，重在建设——地方高校学报走特色办刊之路的再探讨》，《编辑之友》2011年第8期。  
[8] 习近平2016年5月30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饶晓明，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

杨江帆

**内容提要** 只有深入经典，强调知行合一，强调行胜于言，强调质文并重，强调文道精神，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

**关键词** 浅谈 中国文化 “学”

苏轼论书曾云：“见狭、识浅、学不足，终不能见妙”，此为至理也。

相当长一段时间，一提到加强文化修养，书法圈内很多人就认为是读古诗文或写古诗词等。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诗、书都属于君子“六艺”的范畴，虽然可以“文以载道”、“艺以载道”，但文艺并不等同于道。

要真正理解中国文化所指的“学”，只有深入经典。南怀瑾曾讽刺有些不读原典信口开河的人：“有些人要革中国文化的命，可惜你连命都没有，怎么革命？”这就好像书法圈有些人，不深入临帖，却妄自尊大一样可笑。宋以后，《四书》替代了《五经》，钱穆曾说：“我敢直率讲一句，倘使我们读了《四书》，就不必读《五经》。”因此，我们现代人适合从《四书》而入，去窥见中国文化精髓。

我们来看看下面几段话：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知行合一，强调行胜于言，强调质文并重。孔门有四科，曰：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子夏文学优长，但孔子嘱咐他要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就是告诫他不要溺情文学而心忘世道。孔子早年门人大都积极用世，多重实践，故孔夫子晚年论及门下弟子时曰“吾从先进”。中国文化所指学问首在“心地修养与人格完成之两义”（钱

穆），次在修齐治平的本事手段，所以清人有名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将学问狭隘的理解为文学艺术，尚玄谈轻实是对中华文化极大的误解，历代大儒莫不对那些只会空谈诗文，无法落到实践的腐儒深恶痛绝，清初颜元曾说：“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道精神就是艺术标准。以《书谱》为例，开篇便言：“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文道精神来看当下的书风，明显就觉得质朴、厚重、沉雄不够，弊病就是过于姿媚，过于巧饰。所有的视觉艺术都是心的外化，即心象，有什么样的精神取向，就有什么样的审美追求，读经典、学“国学”的目的，就是通过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来改变我们的审美追求。以我个人为例，我的书法审美追求比较倾向于中间路线，既不偏于丑怪、也不偏于姿媚，坚持拙巧之间，这种审美追求应该说是个人自觉的行为，依据就是论语的一段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多年前曾看过一篇石开的访谈，他希望年轻人应多去做一些对社会有实际贡献的事业，不要总想当一名职业艺术家。文章很短，但可见石开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书法要想写好，你首先要成为一个文人，中国传统文人，总是以天下为己任，有这样的胸怀格局，就不会被功利所蒙蔽。

今天书坛的各种问题，很多都是文化缺失造成的。我们强调书法作者加强诗文的学习，这是没错的，但是如果没有文道精神的确立，其实还是在“技”的层面加强书法家的“技术多样性”而已。我相信，更多的书法作者通过学习传统经典，一定可以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进而促进我们的艺术实践！

杨江帆，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办公室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获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三等奖。

## 读《东坡志林》（十四）

徐 康

### 子由梦塔与信佛、崇佛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梦与弟同自眉入京<sup>[1]</sup>，行利州峡，路见二僧，其一僧须发皆深青，与同行。问其向去灾福，答云：“向去甚好，无灾。”问其京师所需，“要好朱砂五六钱。”又手擎一小卵塔<sup>[2]</sup>，云：“中有舍利<sup>[3]</sup>。”兄接得，卵塔自开，其中舍利灿然如花，兄与弟请吞之。僧遂分为三份，僧先吞，兄弟继吞之，各一两，细大不等，皆明莹而白，亦有飞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却吃了！”弟云：“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sup>[4]</sup>。”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无缝塔。”僧笑，遂觉。觉后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梦中甚明，故闲报为笑耳。

#### ——《记子由梦塔》

#### 注释

[1] 自眉入京：眉，指苏轼家乡四川眉山。京，指北宋都城汴京，即今河南开封，因城临汴水，故名汴京。

[2] 小卵塔：卵，木制器物上安榫（sǔn）头的孔眼，也叫卯眼。小卵塔，用木榫卯合成的小塔。

[3] 舍利：又名舍利子。相传为佛祖释迦牟尼火化后骨灰中烧结留存的珠状之物，晶莹剔透。后泛指佛教人士的骨灰烧结物，亦称佛骨、佛牙。

[4] “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吾三人，指僧人与苏轼、苏辙兄弟二人。肩上置塔，喻指肩上承担着责任。

#### 赏析

先须解题。题为《记子由梦塔》，子由（苏轼）的一个梦境，却由东坡来记写，然又用子由之口吻叙说。梦塔，即梦中见塔也。文章出自苏轼之手，却以苏辙的口吻自称为“弟”，称苏轼为“兄”，这样换了个角度，叙述则颇

为明晰。苏辙是“做梦”（梦塔）者与述梦者，苏轼作为“记梦”者，客观记叙，故题为“记子由梦塔”，是切题的。不过这种记叙方式，在苏轼文章中亦较为罕见耳。

苏辙叙说道：明天就是东坡兄生日了，昨晚梦见轼兄与弟一同从家乡眉山赴京师。行至利州（今四川广元）峡中时，路上遇见两位僧人，其中一位头发、胡须都是深青颜色，与我们同行。我问他前去是灾是福？他回答说：“此一路前去，甚为平安，无灾无难。”又问他去京城所需何物？他答曰：“只要上好的朱砂五六钱。”又见他手上举着一座卵塔，他说：“塔中藏着舍利子。”苏轼兄接在手中，卵塔竟自然开裂，只见其中的舍利子灿然如花，轼兄与我均请求吞食之。僧人便将舍利子分成三份，每份约一两，大小不等，都明亮晶莹而灿然发白，也有飞迸于空中的。由僧人先吞食，轼兄与我接着吞食。吞毕，该僧遗憾地说：“本来想要起塔的，却将舍利子吞食了！”弟说：“吃了也罢！我们三人肩上各放置一小塔，不也可以么！”（苏轼）兄说：“我们三人，便是三座无缝之塔。”僧人听了发笑，我不禁梦醒。梦醒后觉得胸中像是有食物噎住似的，有点像先前所吞之舍利子。刚才的梦境甚为清楚，特地作为闲谈趣事，告知吾兄（苏轼），以博一笑。

这篇短文，借子由的口吻叙事，托付梦境，写了兄弟俩吞食舍利之事。这与苏轼信奉佛教有关。舍利，又叫舍利子，本指佛祖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的坚硬珠状物。后由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献香花，表敬慕，名曰“舍利塔”。以此相传，佛教徒逝后焚身所结坚硬珠状物，皆称舍利或舍利子。由于苏轼终生信奉佛教，《记子由梦塔》中兄弟吞食舍利一事，似幻似真，亦寄托了苏轼信佛、崇佛的虔诚理念。

# 明祭春牛，暗讽官绅

元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梦数吏人持纸一幅，其上题云：请《祭春牛<sup>[2]</sup>文》。予取笔疾书其上，云：“三阳既至<sup>[3]</sup>，庶草将兴，爰出土牛<sup>[4]</sup>，以戒农事。衣被丹青<sup>[5]</sup>之好，本出泥涂；成毁须臾之间，谁为喜愠？”吏微笑曰：“此两句复当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唤醒他。”

——《梦中作祭春牛文》<sup>[1]</sup>

## 注释

[1] 本文系苏轼于元丰六年（1083）十二月二十七日作于黄州。

[2] 春牛：即土牛。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

[3] “三阳既至”：即俗话说三阳开泰。三阳，每年春日（正月）之始。阴历十一月冬至日，昼最短，此后，昼渐长，古人认为是阴气渐去而阳气始生，故称冬至为一阳生，阴历十二月为二阳生，正月为三阳开泰。

[4] “庶草将兴，爰出土牛”：庶，众也；将兴，即将蓬勃生长。爰：乃，句首语气词，无实意。爰出土牛，指土牛纷纷出动。

[5] 丹青：丹与青，是两种可制颜料的矿石，此泛指颜色。

## 赏析

苏轼因元丰二年（1079）的乌台诗案而谪居黄州已整整四年，但他不以自身之遭遇为念，仍然关心着乡间农事与农民疾苦。到元丰五年（1082），他已在黄州一块叫“东坡”的地方自筑雪堂，躬耕于兹，自号“东坡居士”。至元丰六年（1083）十二月，他又挂念着即将开始的春耕生产，于是有《梦中作祭春牛文》。

这一夜天将晓时，东坡梦见数名吏人“持纸一幅”，请求他作一篇《祭春牛文》。春牛者，春天耕作之牛也；另，春牛亦即土牛，旧时以土牛出耕表示春耕开始。故东坡梦中祭春牛文即（梦中）祭春耕之辞也。在梦中，“我”（东坡）欣然命笔，疾书于纸上，曰：三阳开

泰，新春伊始，众草繁衍，百物将兴，土牛纷纷出动，以劝（戒）农事。春牛身上穿着画有丹青颜色的漂亮的衣服，但你（春牛）本是泥土做成，而你被人做成或被人销毁也只在须臾之间，谁能为你的命运高兴或气恼呢？《祭春牛文》念诵至此，静听着的一位吏人微笑着提醒“我”（东坡）说：“这两句话，又当有为此而发怒的人了。”旁边另一位吏人则说：“此话无妨，只不过是唤醒那些昏聩的官人啊！”

文章到此，戛然而止，而东坡的影射之义，已跃然于字里行间：可不是么，富人的衣食之需，哪一样不是出自劳动人民之手？我本来讲的是真话，可这些不劳而获者听不进去，若不趁此春耕开始之际，敲敲警钟，给他们一个提醒，行吗？

按照古时乡村习俗，每到新春伊始的农耕时节，均要用土牛来祭祀，以祈祷当年农事顺利，粮食丰收。东坡则以梦中祭春牛为名，坦荡直言，实则托梦而抨击、讥讽官绅之徒，替贫苦农民说话，“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涂”，实乃真理。东坡亲农、悯农而敢讲真话，明祭春牛而暗讽官绅，指向明确，爱憎分明，亦足见其痛快淋漓、正直敢言之文人风骨也。

## 讽刺小品的精炼之作

有二措大<sup>[2]</sup>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当饱吃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一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吾来庐山，闻马道士善睡，于睡中得妙。然吾观之，终不如彼措大得吃饭三昧<sup>[3]</sup>也。

——《措大吃饭》<sup>[1]</sup>

尝有三老人相遇，或问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记，但忆少年时与盘古<sup>[4]</sup>有旧。”一人曰：“海水变桑田时，吾辄下一筹，尔来吾筹已满十间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sup>[5]</sup>，弃其核于昆仑山下，今已与昆仑齐矣。”以余观之，三子者与蜉蝣朝菌<sup>[6]</sup>何以异哉？

——《三老语》

## 注释

[1] 《措大吃饭》，系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五月作于庐山。本文有“吾来庐山，闻马道士善睡”

之句，据《苏轼年谱》，元丰七年四月，苏轼尝游庐山开元观；五月，复游庐山简寂观、白鹤观。马道士即居于此三所道观之一。故本文当作于是时。

〔2〕 措大：指贫寒失意之读书人。唐《朝野僉载》：“江陵号衣冠薮泽（衣冠薮泽言指人员集中之处），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称人为“措大”一般有轻蔑之意。

〔3〕 三昧：在此借指事物的诀窍。

〔4〕 盘古：我国神话中开天辟地、首出创世之人。据《太平御览》：“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

〔5〕 蟠桃：传说中的仙桃。据《太平御览》：东海之中有度索山，山上有大桃，屈蟠三千里。又据民间传说，西王母送蟠桃与汉武帝，曰：“此桃三千年一结子，非下土所植也。”

〔6〕 蜉蝣朝菌：蜉蝣，虫名。寿命极短，短者数小时，长者六七日。朝菌，菌类植物，寿命极短，朝生而夕死。

### 赏析

苏东坡的这两篇讽刺小品都极为精短，也都颇含讽刺意味。

先说第一篇《措大吃饭》。据《苏轼年谱》，元丰七年（1084）四月，东坡告别黄州贬所，偕友渡江过武昌，至九江，游庐山，此篇即于元丰七年（1084）五月作于庐山，故本文有“吾来庐山，闻马道士善睡”之句。

措大，旧指贫寒失意的读书人，亦可称之为“寒酸学子”。这类人一般较为迂腐，也往往志大才疏，好说大话，亦好空想。于是出现了两位“措大”相与“言志”的一幕。一个说，我平生感到最不满足的是两件事：一是饭未吃饱，二是觉未睡足。若一日志得意满之时，我一定吃饱了便睡觉，睡醒了又吃饭。另一个说，我与你说的不同，我当吃了又吃，吃个不停，哪有工夫睡觉啊！这当然是一则“饿”极无聊的笑话。你想想，一者，吃了便睡，睡了又吃，岂非猪仔乎？二者，吃了又吃，不歇不睡，岂不撑死乎？这正所谓：将生活中并不“现实”的极端的事，直白地描摹出来，便成了“讽刺”。这其中蕴含的幽默与韵味，足能令人捧腹。这

便是讽刺的效果。至于结尾处，苏东坡故意拿现实中的“马道士善睡，于睡中得妙”来对比，而且不失风趣地说“终不如彼措大得吃饭三昧也”，这就更加强调和加重了前面故事的讽刺效果。所以，结尾这几句话，绝不可以当“闲笔”看待。由此亦足见苏东坡行文布局之谨严。

再看第二篇《三老语》。开篇仅说曾有三位老人相遇“或问之年”，即彼此询问“高寿几何”，接下来便是关乎“年龄”无限增长、三老竞吹牛皮的故事。一个说，我的年龄已不复记忆，只记得少年时与开天辟地的盘古王有过交往。这牛吹得可谓“神”也。另一个说，记得当年沧海变桑田时，我曾插下一根竹签作筹码记时，从那时至今，不觉间竹签已积满十间屋子也！第三个说，我在天宫吃过蟠桃，将桃核丢弃在昆仑山下，如今桃树已长得与昆仑山一样高啰！你看这三个吹嘘“高寿”的吹牛大王，不是一个比一个吹得更加神乎其神、更加玄而又玄么？最后轮到苏东坡加以“点评”了。一句“以余观之”，接下来的观点犀利尖锐：我看这三个吹牛大王，其寿命短得与瞬间夭折的蜉蝣、与朝生夕死的菌类有什么区别呢？先生之语，真是一语击中要害啊！

这两篇小品，有极其类似的地方，其一，都采自民间，带有很强的民俗性。其二，短小精悍，极具幽默与讽刺意味。其三，塑造的人物（即被讽刺的对象）颇有典型性。其四，都在故事的结尾处，分别用“然吾观之”、“以余观之”，极其精炼地道出作者的观点。读这样的小品，如沐春风，如饮佳醪，使人于品玩中体味到幽默的快感。

徐康，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职称。

# 东坡味道三味鲜

## ——王晋川《东坡味道》的乡土情结

方永江

1月16日（阴历腊月十九），苏东坡诞辰980周年。我随一众同好早早肃然于三苏祠飨殿院内，奉香献花、致敬先贤。礼成，晋川大哥在门边柜前奉书一卷，乃是他新近出版的诗集《东坡味道》。辞旧迎新之际，不啻上佳的年货，我得以在年前年后随时咀嚼一番，享受之极。

其实，我在当天的匆匆一瞥中，便留下亲切敬佩的会心一笑。集中东坡家宴第一道菜“程夫人豆芽”，有云：呵呵！豆芽不过小菜一碟，却留下一盘有滋有味的传奇。晋川大哥的呵呵，在我却变成了一串串的哈哈。山野传闻，说一粒发胀豆子，业务精而资格老，栽他培他提他拔他都在情理之中。果然。组织找其谈话，诚之低调。其人曰：请组织放心，豆芽就是长上了天，也不过小菜一碟……

从桌上抽取一张“心心相印”面巾，擦干情不自禁溢出的泪，透过朦胧的双眸，却分明看见了十九年前的场景。建区之初，血性而壮盛的晋川大哥在文化界大展身手，同样血性而青葱的我等一帮小兄弟在舆论场意气风发，不分官大官小、不分钱多钱少，不分孰长孰幼、不分白天黑夜，逮着空闲，找一个苍蝇馆子，便整成波澜壮阔的诗酒江湖。那真个是激情燃烧、风起云涌、奋厉当世的快意人生！不经意间，晋川就调研了，就退休了，而我辈也白了少年头、走马兰台类转蓬……正当彷徨无措，又兼雾霾重重、致人咳咳吭吭备受煎熬之际，晋川带给我乡土乡味，着实格外惊喜。

他的调研旅程，是马不停蹄的扑下身子，为“文化立市”呕心沥血。他的退而不休，是爱东坡入骨入心，为“东坡味道”废寝忘食。

“无论是寂寞沙洲冷，还是死灰吹不起，苏东坡都将生活的苟且，过成了远方和诗。”（《甑脚菜》）同样，无论是喧嚣，抑或寡欢，王晋川都将生活的平凡过成了非凡。品读《东坡味道》，我感觉到，王晋川在腾挪辗转、煎煮蒸炒间把自己也烹调成了一名大厨。

《东坡味道》因其缘定东坡，心系乡梓而闪爆我们的味蕾，刺激我们的神经。在王晋川

东坡味道四季的深情吟唱中，我们喜出望外地接受了每一款东坡味道产生发展的清晰图谱，它是对“乡野食趣”的借鉴、提炼、提高和创新，经过“眉山菜谱”的恒久发酵和深厚积淀，经过一代又一代“大厨印象”的薪火相传与推陈出新，才有了东坡味道美味、品味、回味的酣畅淋漓，才有了东坡味道至真、至善、至纯的历久弥新，使之既能登上大雅之堂，又为百姓津津乐道。

东坡味道是眉山的文化符号，人间美味，闪断舌头。东坡家宴、眉山菜谱的独特性，王晋川在序中用六大特色给予了客观而精准的勾勒，虽于东坡味道的进一步规制和标配尚有距离，却因晋川学者和美食家兼具的修为，不可不认为一种良好的开端和示范。东坡味道之不可替代性，一如东坡品牌之于眉山文脉的唯一性，既是食物的狂欢，更是文化的盛宴，已然成为眉山的城市记忆，一箸一勺都是我们舌尖上的舞蹈。

东坡味道文化是她的底色和底气。有了这样的底色，眉山儿女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会守住家乡的根，守住做人的本。有了这样的底气，眉山儿女无论顺风顺水还是艰难困苦，都能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不单是她的制作工艺，就是其选材的功夫，莫不传承了眉山这方山水这方人的文明。东坡赞曰：“吾郡之俗，有近古者三。”乡风民俗对于一方文化的养成，对于一方美食的造就，居功至伟。这深为历代先贤所敷扬，也必为后世子孙所传承。倘若东坡味道不以文化美其美，她与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汤汤水水有啥区别？而这样的食客，又与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吃货有何两样？“从不想登大雅之堂/也不愿标榜吹嘘/美食来自民间/佳肴流传至今。”（《德元楼醉粉子》）“先生吃鱼原来不吐刺，却吐出一首首绝妙的诗”，美哉：品东坡味道就是品文化！

东坡味道至真。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无比接近真理。东坡味道正是美到极致的真实裸露。美在“炒一锅诚信感恩的菜，一定能收获香喷喷的人生”，美在“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人生的

味道需要慢慢品鉴”，美在“山民纵然变成了渔民，不变的依然是一腔真诚，人情好喝口水都甜”，美在“爆腰花变妖花，地木耳奉献羞涩的初吻”，美在“治大国不也如烹小鲜耳”。不仅每一道菜蕴藉着丰富的真知灼见，而且淬炼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饱含了精彩绝伦的人生故事。在此人间美味面前，真堪“值那一死”！

东坡味道是眉山的情感密码，用心品味，闪了喉咙。囫囵吞枣，纵然天天都是山珍海味，也是味同嚼蜡。食物的精致，需要经过舌头，慢慢品味，品出酸甜苦辣、真善美丑。牵扯我们情感最敏锐部分，那是命运的本质，所有的感触也是因此而生。原味的遗弃：“如今招牌从乡下挂进了城/大餐厅明晃晃满桌佳肴/我却时常怀念当年的味道。”（《马旺子》）“喝再多雄黄酒也不管用/雄不起的不只是男人/年年的棕叶裹着年年的棕米/再也吃不回童贞的回忆。”

（《粽子》）原乡的无存：“最是那翻碗扣盘的一瞬/撩人的香味引来赞扬声声/当筷子夹来遥远的乡愁/可想起故乡的日落月升。”（《咸烧白》）“昨夜梦见红萝卜烧牛肉/醒来时嘴角还挂着口涎/今早起提篮赶去菜市场/不知能否买回香喷喷的当年。”（《红萝卜烧牛肉》）原来的迷失：“弱者不会恒弱/强者不会恒强/人在做天在看/世事有轮回/看谁在世界末日呱呱叫。”（《呱呱叫》）“派头十足的绅士总爱在月色朦胧的星光下歌唱，却在眨眼之中被捕杀，装进土豪贪婪的皮囊。”（《石鹅》）

劝君莫取天下珍，劝君惜取盘中餐。“谁知一别江团好多好多年/儿孙们从未见过你的尊颜/如果就此和这个世界拜拜/哭泣的不只是唐朝的那些诗篇。”（《清蒸江团》）“落了毛的凤凰照吃不误/我想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风鸡会不会变成疯鸡/不是人吃鸡而是鸡吃人。”（《风鸡》）这使我想起了十余年前吴建堂先生馈赠的《江团图》。其题存“唐时河山今时鱼，李白遥去激浪新。旨望守候和呵护，与尔共存阅人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东坡味道至善。人心思善，人心向善，眼见得天下粗茶淡饭皆是人间美味；心存善念，感恩万物，一粥一饭也能品出大千世界。科学研究表明，许多过去盲目追崇的奇珍异禽，其营养成分与普通食材无异，东坡味道传递下来的情感密码，就是切不可为饱口腹之欲而妄开杀戒、大开杀戒，而是要心怀敬畏，感恩天地间所有供给我们营养、营生的生灵。“愿天下所有餐馆删去这道菜谱/愿人间有缘听到石鹅的歌唱。”这是心的呼唤也是情感的皈依。

东坡味道是眉山的生命基因，一生回味，

闪在心尖。“来自山野的爱/绵长而坚韧/最具生命的张力。”（《蕨菜》）“浸入骨髓的，是乡愁，是亲人的爱，是故乡的情。爱是天下百味的魂。”

（《水晶鸭脯》）行遍万水千山，最难忘的是乡间小路；尝遍人间百味，最难忘是妈妈的味道。回锅肉、蚂蚁上树、家常鲫鱼、鱼香肉丝、苦笋烧鸡、粉蒸肉、炒鸡菌、锅巴肉片、烂肉豇豆……都是房前屋后、沟边地角、坡上坎下的生长，都是井台塘湾、土锅土灶、袅袅炊烟的营生，都是逢年过节、生朝满月、奠基上梁的人情。不说吃起来魂牵梦萦回味无穷，就是看到这些乡土气息浓郁的字眼，也是情满山野思绪绵绵。“吃着儿时熟悉的菜肴/仿佛走向昨日的家园/夕阳下外婆佝偻的背影/把我牵回梦中的童年。”（《外婆菜》）

东坡味道至纯，来不得半点虚伪和矫情。在徐志摩笔下是“在康桥的柔波里/我甘愿做一条水草”；在艾青的笔下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在王晋川的笔下是“雪白的心情不要稀释/更不要添油加醋/贵在原汁原味。”（《砂锅鱼头》）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在人生跌宕起伏中，我们也许有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有一帮诗酒年华的哥们，有一幕刻骨铭心的背叛和疏离，有一些虚情假意的豪情与看似轰轰烈烈实则轻佻浮夸的交情，经历过、疼痛过、冷静后，才能撕心裂肺地感受到，只有故乡的老井水味道至纯，只有故乡的青菜萝卜味道至纯，只有亲人的牵挂和对故土的回望味道至纯！

自1月4日至今，84岁高龄的母亲病重住院，三十、初一都在医院，这个春节就过得分外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晋川的《东坡味道》在浓烈的福尔马林气味中使我嗅出别样的色香味，无疑是我精神上的牙祭。迨至2月1日（正月初五）下午六时，苏学泰斗张志烈先生一通电话和一则短信，予我以春节最好的礼物。2015年，拙作《且行：苏祠外仰视》出版，张先生病榻之侧手书高文宏论《笃行：德艺双馨的不懈追求》以鼓励。今又于脑梗初愈之际亲撰《慎思：德艺双馨的前行基石》为拙作《且思：苏祠外浅尝》不吝溢美，是先生奖掖后学、提携后生一以贯之的本色。此番“东坡味道”，使我于无边无际的黑暗和诚惶诚恐的陪护中，涌起一股一股的暖流，瞧得见远处灵动的曙光照亮来路……

方永江，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

## 三苏文化的虔诚使者

### ——兼读方永江《且行·苏祠外仰视》

廖文凯

认识永江始于报社，那时我俩互为同事。同一楼道，平平相交，后来频频相交，竟至成了盟誓的挚友。至于何时因何种缘由让友情升华，我现在都不记得了，也回忆不起。友情这东西，不是一道刻板的数学题，它微妙得就像菌类，遇到适合的温度就会疯长。我最敬佩永江的为人。我想，大抵因为至今长达十六年的肝胆相照，永江的人格魅力始终在无形地牵引着我砥砺前行，他的耿直为人以及大度胸襟，常常将我的瑕疵接纳、遮掩抑或改良。用心交友是他的原则。挚友间相互敬重，且行且珍惜。

忽一日，永江递给我一本他的新著：《且行·苏祠外仰视》。典雅的封面犹如他朴实无华的人品，“苏祠”二字勾起了我对他事业的回忆。2007年，永江受命调离报社，去做三苏文化的使者，去实现他人生第二次创业的辉煌。屈指算来，永江离开报社已经八载。期间我也受邀参加过在眉山举办的全国苏轼研讨会，有幸认识了邱俊鹏、曾枣庄、张志烈等苏学大家，对三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今，方永江不仅是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而且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自然，接到永江这部以三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大作，当有一睹为快的冲动。

然则，做记者这份职业性质却不容许我有这样的冲动，不容许我对一本书的阅读就像畅销书“快枪手”那般一气呵成，倒如永江著述里言及的只能“断断续续地阅读”，内心始终“对书籍充满感激”（《阅读之今昔》）。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对永江在这本书里恰如其分地还原和评述苏洵、苏轼、苏辙的快言快语所折服。本书散文诗的风格、精辟的连珠妙语，常常撩拨着我的心弦，让我的阅读变得更

加酣畅淋漓。一个在颂扬三苏的语境下充满忧思的永江跃然纸上，他似乎常常站在面前与我们掏心对话。

“渡河芳草王孙去，过岭梅花使者愁。”肩负着传承和弘扬三苏文化的重任和使命，方永江徒步于三苏文化传承与弘扬的道途上，一心铺路搭桥，他无愧于三苏文化最虔诚的使者。

#### 引吭高歌的使者

“苏东坡属于人民”、“苏东坡属于大自然”、“苏东坡属于全世界”（《东坡今年 970》）。这是方永江这本书的开篇力作，是对苏东坡一生的中肯而鲜明的定论。其实，这篇力作我很早就阅读过了，记得当年在《眉山日报》文化版发表后，反响很不错，后来还获得四川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这是苏东坡诞辰 970 周年之际，三苏文化使者方永江为苏东坡毕生伟绩高唱的一曲激情澎湃的史诗般的颂歌！

疏浚西湖、徐州抗洪、密州收养弃婴、登州五日三事、惠州推广秧马、儋州开馆授徒、常州焚券还宅，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具有普世情怀和亲民形象的“大写意”的苏东坡，所以他“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祉”。至此，永江对东坡先贤直抒胸臆：“你属于人民：人民创造历史，人民创造奇迹，你的名字不是刻在石碑上，而是刻在人民心里，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艾青的诗歌《有的人》。永江与艾青在某些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杭州、惠州修堤建桥，一首咏庐山诗让庐山扬

名，东坡赤壁更是山水之幸，老家巨笔书法连鳌山，唤鱼联姻中岩寺，深情挥毫远景楼，还有在密州建超然台，在徐州建黄楼，在黄州筑快哉亭，在儋州掘东坡井……从政为官屡遭贬徙的曲折经历，却一次次激发了苏东坡对大自然的热爱，成就了他成为一名山水建筑大师，给后人留下无数可以享用千千万万年的名胜瑰宝。永江写道：“他在大自然中乐以忘忧，撷取养料，激扬文字，成就了艺术辉煌；他的不朽的华彩丽章，又生动了大自然，思越千载，情动万里，景因人名，人随景传，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一个“大仁大智，乐山乐水，其乐无穷”的苏东坡形神可掬。

苏东坡为官遭贬却炼就了“他乡是故乡的博大胸襟”，“坎坷曲折的仕宦生涯，磨砺了苏东坡，又把他放到了一个更宽更广的舞台上，由此，他从老家启程，走出夔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千百年来，每逢东坡寿辰，在日韩等东南亚国家都要举办“寿苏会”，苏轼研究在美国和欧洲等国方兴未艾。“他卓越的文学成就和辉煌的艺术人生，已经融入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苏东坡因此被评为世界千年英雄。“不仅是眉山的骄傲，中国的骄傲，而且是全世界的骄傲。”

上世纪八十年代港澳录像片风行的时候，我也看过一些苏东坡题材的喜剧片，调侃中不乏歪曲历史丑化先贤之嫌。大抵是为了矫正历史吧，永江在《苏东坡的正能量》一文中作了回击和回应：“（苏东坡）始终秉持着信念坚定的政治操守，始终坚守着‘奋厉当世’的人生追求，始终笃行着爱民忧民的仁政观、轻赋裕民的惠民观，是一位为民的典范、务实的楷模、廉洁的榜样，成为历代有志于俯首甘为孺子牛、永葆本色为公仆的仁人志士心目中最敞亮的镜鉴。”在这里，永江对于以东坡为代表的三苏文化深远意义和影响的诠释，显然对当今颇具针对性和指导性。

永江在本文里对苏东坡作了更为深邃的评述：“苏轼的一生，尤其是在地方官任上，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怀、为人民抒情的诗词歌赋，是他文学艺术成就中熠熠生辉的鸿篇巨制。”“东坡就是这样矢志不渝为民而歌，传道授业文化使者、求实创新开山立派，成为有道德、有筋骨、有温度的文化高峰，巍然屹立接受人们千秋万代的顶礼膜拜。”“东坡就是这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常怀慈悲之心、化腐朽为神奇，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教诲芸芸

众生热爱生活。”

对于苏洵、苏辙父子俩，永江在本书中用的篇幅较苏轼而言虽然吝啬了点，但是对于他俩的评述却也十分公正客观、独具特色。

且看苏老泉苏洵。“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是我们儿时就耳熟能详的《三字经》中的几句。永江却对此给予炮轰：“一部《三字经》，误读苏洵一千年。”足见永江使者对先贤的敬重和“不可辱”的忠心耿耿！误读先贤不说，永江道，更让误读先贤的无数学龄儿童荒废了学业！可见误读误解的危害之大。于是，永江洋洋洒洒，一篇《饮泉就饮苏老泉》，全然拂去了积淀于苏洵身上长达千年之久的厚厚的历史尘埃，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苏洵：“老泉不仅有杰出的政治才能，而且有卓越的鉴识人才的能力”，他的“任人唯贤、用人唯才”的人才观，“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治观，以及对于行贿受贿危害家国的论述，对于当下社会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老泉不仅有杰出的政治才能，而且有卓越的鉴别人才的能力。”“特行独立而不自弃，发愤攻读，刻苦治学；不屑蹈袭前人成说，往往据尽人皆知之史事，发新颖独到之见解，创新精神贯穿文化苦旅始终，这就是苏洵的价值所在。一泓清泉，滋养了苏东坡、苏子由，滋养了虞允文、彭端淑，滋养了黄汲清、石鲁……”足可见苏洵对后人的光辉照耀，三苏的光芒将会继续照耀一代又一代前行。

永江叹曰：“苏老泉无疑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光彩照人的巨星。只是他的两个儿子太优秀了，长时间遮蔽了他的光芒，使我们难得一见；只是千年的误读积累了太多的尘埃，涓涓斯泉潜龙在渊，竟使我们视而不见。”虽是叹惋，但是透过纸背，是永江对身为父亲的苏洵对两个优秀儿子的极力呵护与托举的颂扬。设若苏洵是一个私欲十足的父亲，那么，苏轼、苏辙就不可能会有至今的在历史上的闪耀。是苏洵甘把自己作人梯，让苏轼、苏辙踩在他的肩膀上，这才成就了当今的世界“千年英雄”。多么伟大的父爱啊！这是苏洵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这是苏洵对全世界的贡献！

再看子由苏辙呢？方永江坦言自己“多年以来，服务三苏研究，常把苏辙萦绕于心。”身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的他，就在苏辙仙逝900周年纪念日这个时刻，以三苏文化使者的身份为苏辙举办隆重的学术研讨活动，让一直“被边缘化”而

寂寞不已的“子由辙”不再寂寞。于是，方永江提笔写就《寂寞子由辙》一文，一是纪念苏辙仙逝 900 周年，二是借此向世人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苏辙。

“子由真乃大英雄”，900 多年前过燕山，他就感于“澶渊之盟”的耻辱，“悲愤化为自强之音”；年仅 20 岁的他，如炬的目光就能洞穿北宋的历史；“他亲手编定的《栾城集》收诗约 2000 首，文 1100 余篇”。足见苏辙著述颇丰，与父兄同列唐宋八大家之位无可非议，且在文学的星空占有一席之地……

殊料，他却一生颠沛流离，始终没能逃脱命运的捉弄，“在空间的标尺上辗转了大半个中国”，竟沦落到“寂寞知谁问”的尴尬。即便这样的处境，他却始终恪守“爱国爱民、奋厉当世的崇高理想，求实求真、探索创新的不懈追求”，方永江直言，“先贤的智慧将是我们理性爱国、潜心发展的不竭动力。”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使者虔诚，研究不懈。虔诚使者，还将继续为千年先贤传唱激情豪迈的颂歌，而且永远传唱下去！虔诚使者，还将继续引领今生今世更多的人热爱三苏、传承三苏文化，而且永远引领下去！

### 倡导阅读的使者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心路历程的记载，人生的七情六欲、悲欢离合，都有了。读书，可以从中体味人情冷暖、人世沧桑。书籍是作品主人公或作者人生的记录，是鲜活的生活写真，艰苦卓绝、平坦如砥，或平凡或辉煌，全齐了。读书，可以使人从中感悟生存艰难、人生苦短。书籍是精神的食粮，是心灵的营养，春江秋月、惊涛骇浪，牛奶和面包，都有了。读书，可以从中享受高钙的滋润，可以反刍橄榄的青涩。读书有如许好处，真是乐莫大焉！”

这是方永江《且行·苏祠外仰视》一书排在第三篇的大作《阅读之今昔》中对阅读的精彩论述。字字玑珠，如同格言。足见书籍的高贵，足见阅读的重要。阅读，是方永江在本书中馈赠给我们的又一丰盛大餐和精彩大戏。

推崇三苏文化，传承三苏文化，永江在向我们隆重推出三苏文化激扬颂歌的大戏之后，为何又要为我们设计这么一出看似与三苏文化不怎么着边

际的大戏呢？我不禁纳闷，用心揣摩，终究还是在本书中觅寻出了答案。

永江《阅读之今昔》为我们坦白了他为什么要如饥食渴地读书。“我的读书始于无书可读。幼年家贫，果腹尚且不易，哪有‘闲钱’购书来读？每每看到邻家的孩童拿着课外书读得津津有味，眼中的羡慕、妒忌，已不仅仅是羡慕、妒忌了，那分明是一种仇恨。恨不得……好把书据为己有”。以致后来他把奶奶为他添置的灯芯绒帽子跟同学置换了一本《官渡之战》连环画。

我与永江同一个年代，都出生于贫困的农村，所以深刻理解永江对“无书可读”的无奈和对“有书可读”的渴望。

方永江在他的《东坡书楼》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我自有我的天堂。很小的时候，就领教了没有知识文化受人欺负的痛楚。奶奶给我讲，爱书惜书的人，老天爷也是保佑他的。有一年发大水，一位落魄书生独立滔滔洪水中，锦罗绸缎不捡，金银首饰不捞，只把一本本一张张载有文字的书籍纸片捡起来，龙王老爷子、洪水猛兽退避三舍，俨然中流砥柱。”这段文字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某一年，成都发大水，淹没了青羊宫到人民南路的区域，成都市新华书店的库房没能躲过这大自然的一劫。那时，酷爱读书热爱文学的我，正处于学生懵懂彷徨时期，发大水的时候我正在成都嬢嬢家耍。大雨停歇过后，我坐公交车路过人民南路广场新华书店门市，看见门市外一溜烟摆放着无数的摊位，摊位上都是摆放的书籍。我急忙在附近一个站台下车，赶紧灰回到摆满摊位的新华书店。

门市外，那一幕幕情景简直让我撕裂心肺！一本本中外名著以及其他书籍像是落水者才被抢救上来，个个水淋淋的。新华书店员工站在高处高喊：“快来买呀，中外名著！一元钱一本，快来买呀，把它买回去晾干，一样的阅读，文化知识永远不过时呀！快来买呀！”我在水湿书的摊边忘乎所以，尽情地选呀选呀，最后竟把嬢嬢给我买酱油的钱都用光了。现在我只能用“一麻袋”来形容我当时的购水量和对书籍的敬畏与渴求。

记得那次通过成都到仁寿的客车，再从仁寿换乘汪洋的客车，之后我用自行车把一麻袋水湿书驮回四公镇老家。我现在已故的老奶奶，为我把从成都好不容易才运回来的水湿书一页一页地翻开，再

一页一页地晾干，不识字的老奶奶那认真劲，简直不亚于她对待生病的儿女那般精心照料，现在想起来，我都会从内心涌动起一阵酸楚，情不自禁地流泪。

这些水湿书，至今尚留存于我的书橱里，我将终身保存并铭记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和惩罚！在此抄列部分目录以示纪念：《郭沫若选集》、《死水微澜》、《约翰克里斯多夫》、《何其芳诗集》……

这种对书籍的敬畏与生俱来并延续至今。每年我订阅的杂志总额都会在千元左右，选择的杂志多为纯文学杂志，目录包括《人民文学》、《小说月报》、《诗刊》、《散文》、《美文》、《大家》、《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当代》、《收获》、《十月》等。

我不是在炫酷，而是写到这里情不自禁，以表达一种与永江同样的对人类精神食粮的渴慕的情怀。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热爱书籍？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阅读、填补自己空空如也的头脑而把自己变得充实起来？

扯远了，话锋回转。方永之所以要在这本书里设计这么一出阅读的大餐和大戏？是因为他从小对书籍“浸入骨髓”的热爱。这是我的揣摩。现在想来，这只是方永江在这本书的“表象”而已，他更深层次的用意远远不止这些。

“生活品质之城，不在于修了几条大道……不在于修了几座豪宅……街可以少修几条，楼可以少盖几幢，东坡书楼却是不能不用心专筑的。”“惟有书香可以照亮我们这个城市脆弱的人文生态”。（《诗书城缺位读书日》，引用下同）

这里已经不难看出永江的良苦用心。假若，眉山这座诗书城缺乏了书籍，缺乏了阅读，那么，它可能就沦落为“到处是地动山摇的麻将桌”了。假若，眉山这座诗书城缺乏了书籍，缺乏了阅读，将会是“前人的遗产成为我们负重前行的巨大压力”了。假若，眉山这座诗书城缺乏了书籍，缺乏了阅读，我们言及的三苏文化谈何传承和弘扬？

我现在才真正地理解永江在这本书里谈论阅读的良苦用心！传承三苏文化，第一要务就是要提倡全民阅读。“这就意味着拯救地球、呵护家园，惟一可以依赖的就是书香，就是学养，就是通过知识的不断丰富从而净化心灵、提升道德。惟有读书，才可能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开可能有开放合作的胸襟，信息充分共享，环境共同治理，臻至天人合一的境界。”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但我深信，读书可以使人接近高尚。”我怎么才能够尽情地感谢你？永江，你这位三苏文化最虔诚的使者！你穿越千年，为当今搭建起三苏文化的传承与共享的桥梁。你以身示范，用阅读检验了传承三苏文化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全民阅读。

### 忧思漫漶的使者

如果把方永江的《且行·苏祠外仰视》这本书喻作一棵“大树”的话，那么，他的忧思便是“坠在枝头”的一枚枚沉甸甸的果实，便是“苏东坡永远也流不到嘴边的那一滴泪”。方永江在本书中呈现给我们的忧思是善意的至始至终的，是最自然最率性最真挚的情感流露，美丽极致的忧思常常迸发而出，浸盈于本书的字里行间，不乏理想主义与罗曼蒂克。那是一个有着良知的文化人对于民族文化的忧思。

其一，对于节庆文化的忧思。

诗歌是最神圣的，是民间劳动者智慧的结晶。然而，“不知是文明的缺陷还是无心的失落，偏偏没有诗人节”。永江在《诗人节》一文中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但我更愿意把它叫做诗人节。”“我们惬意享受人类文明成果的时候，早已把文明的源头忘得干干净净。”永江由当下节庆的“变味”联想到三苏文化的传承。

永江说：“今天的五月初五，传统的东西少了，新的花样多了，文化是拿来搭了台了，功利性十足。”“表面上热热闹闹，骨子里却有一层与生俱来的隔膜。需要‘搭台’的时候，奉之若神明；不需要时，弃之如敝履。”“花钱买吆喝，我们连吆喝也没有赚到一个。”

作为“吃‘三苏’这碗饭”的文化使者，永江不禁发出诘问，“眉山是三苏的故乡，今日眉山人对三苏又有多少了解的呢？除从课本上知道他们是‘唐宋八大家’之外，于他们的人文精神和爱民情怀恐怕就知之甚少了。三苏祠是‘三苏’的故宅，东坡故里人是否视之为心目中的圣地呢？虽是对外宣传的窗口，但远没有达到发扬光大的境界。”

永江忧心如焚，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普及和弘扬三苏文化的问题。他自我作答，“眉山如何才能重新焕发历史文化名城的光彩呢？追根溯源，首要的是要以科学和创新的精神鸿篇巨制三苏文化，使天

下好学之士见贤思齐、心向神往，有‘秭’来归。”

永江告诫：“对苏轼的喜爱，肯定不是简单地种种东坡地，泡点东坡菜，吃吃东坡肉。而是要把东坡文化的精髓浸入我们安身立命的城市的血脉中。苏轼的学识人品、道德文章、千秋功业，才是这个城市的灵魂啊！”（《“潘基文”归来》）

其二，对于读书的忧思。

方永江对于读书的忧思，在《诗书城缺位读书日》、《东坡书楼》诸篇中表现得尤为浓烈和深切。

《阅读之今昔》是他对于人类读书状态的引领。读书状态亦如生活态度。永江的阅读亦如他的生活，始终奔放，充满激情。

然而，当下的社会状况却让永江异常忧虑，“熙来攘往中，有几人尚在读书？不该缺乏读书日的恰恰无动于衷了，到处是地动山摇的麻将桌，却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是今人的不幸，还是民族的悲哀？

对于读书的忧思，永江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彻底地绝望，而是循循善诱，极力地把全民阅读的意识唤醒，并把希望寄托于“东坡书楼”上。值得提出的是，我所理解的“东坡书楼”，莫非是永江托物言志？莫非是永江无法安放又终将安放的梦想？“在宋城之内，还要建造东坡书院、东坡书店，使之成为城市的精神地标，使之成为眉山文化基因的载体。”

其三，忧思下的罗曼蒂克。

尽管永江对当今物欲下的社会风气充满忧患、充满鞭挞、充满批判，但是他并没有一味地就曝光而曝光，并没有就鞭挞而鞭挞，并没有就批判而批判，而是在忧思中注入了更多的冷思考。这种冷思考又以一种罗曼蒂克与理想主义的形式张扬出来，极具创新性和先锋性地引领充满正能量的文化回归和繁荣。

且看，“可不可以搞个东坡节呢？以虔诚的情愫缅怀乡贤。甚而至于，先天下风气确定一个诗人节，把教化和娱乐的功能结合起来，使每一个眉山人士视弘扬三苏文化为天职。”

且看，“唐宋八大家眉山占三家，古老的眉州散发出经久不息的书香。可以想见，那片生机勃勃的土地天天都是读书日；那些元气淋漓极富生命张力的人，个个都是读书人。眉山俨然是一座以诗词歌赋为经，以琴棋书画作纬的城池，相信相爱的人们在这里诗意栖居。”

且看，“‘两宋荣光’方兴未艾，‘东坡宋城’横空出世，使他们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连接二者的桥梁，该是一座众望所归的东坡书楼吧。那一天，我们能够异口同声地说，眉山最好的建筑就是东坡书楼。我们的生活就真的春暖花开了。”

且看，“东坡书楼必定聚集和裂变极大能量，我们以此为辐射源，把书楼的养气功能和宋时的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的历史价值，植入有眉山春熙路美誉的街道，建成东坡书市……吸引国际国内知名出版社落户眉山，乐意到眉山开直销店，成为书界品牌，成为国内外读者和游客买好书、买正版书的首选。”

且看，“苏东坡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千年英雄，是全世界的十二分之一，是中国的唯一。他是世界的骄傲，中国的自豪，眉山的荣光。既然如此，眉山何不建一个世界英雄园呢？……其他地方都不合适，惟有眉山占尽先机。建成英雄园，形象直观地展示世界英雄们的光辉业绩和生平事迹，既缅怀先贤，又启迪后人，更可以让眉山成为一处举世无双的文化旅游胜地”……

对于永江之于眉山三苏文化未来的独具匠心的设计和罗曼蒂克的遥想，我们深信不疑，感动万分，感谢他作为三苏文化使者的良苦用心，并期待着在不远的将来变成现实。

冬日的午夜，瑟缩地站在修葺一新的三苏祠外的寒风中，我静静地站着，仰望那一轮永远也无法合拢的“阴晴圆缺”，我看见了千年的苏洵，我看见了千年的苏轼，我看见了千年的苏辙，我看见了真实的三苏及他们的慈眉善目，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念想与东坡先贤不谋而合的许多人生际遇，回味永江在本书中为我们呈现的关乎三苏文化传承与弘扬的诸多忧患忧思，我抑制不住从眼眶里滚落出热望的泪水……

方永江，三苏文化最虔诚的使者，站在眉山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坐标上，他背后是回响天际的读书声，是书香四溢的地标建筑东坡书楼书市，是回归原味的端午节，是“朝圣的人们只能步行而去”远远凝望东坡先贤的诗人节，是蓝眼睛黄头发摩肩接踵前来朝拜的世界英雄园……

廖文凯，眉山日报记者。

# 九百年来天地变，斯民始终爱坡翁

## ——读陈弼编著《千年东坡百家赞》

许植基

苏东坡是中国千古第一文人，世界千年英雄；苏东坡，人类文化宝库中一个最伟大的文化元素。苏轼的著作，苏轼的人格，苏轼的文化艺术世界，浩如瀚海，史称苏海。这苏海，其广，“波澜浩大，变化不测”（《吕氏童蒙训》）；其深，“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宋孝宗《御制文集序》）。千年来，无数文化人或在苏海中遨游，或在苏海之滨鉴赏，常州日报社原副总编、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原会长、现名誉会长陈弼先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最近，他的著作《千年东坡百家赞》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引起苏学界的热切关注。

苏海浩渺，研究的书刊也同样浩繁，和其他的书刊不同的是，《千年东坡百家赞》是一部普及书，一部工具书，一部鉴赏书，又是一部学术著作。这部书实际上代表着常州苏学研究的水平和认识，在全国的苏学研究中也起了一种探索性的作用，集实用与研究为一体，融启蒙与导读为一炉，以服务 and 工具为目标。对未入苏海者，它普及知识，呈现苏海之波澜，引领他们进入；对于已入苏海者，提供研究资料和线索；对于专家学者，则切磋学问，互补短长。

该书的体制独特。第一辑，千年景苏撷英。陈弼编注古今对苏东坡的评价精华，既有工具性，又有导读性。第二辑，苏轼名言远萃。陈弼自选苏东坡诗文中名句，内容含读书学习、和谐理念、爱国情怀、爱民惠民、改革创新、清正廉洁。每条有出典，注解，解读，有工具性和鉴赏性。第三辑，探骊苏海。陈弼的学术论文和相关文章 34 篇，含学术价值和普及价值。另有附录 10 篇，有关全国第十七届苏轼学术研讨会的重要文本和常州苏东坡研究会的有关资料，及陈弼的自述，有资料性。

陈弼先生，儒雅多才，笃学而致志，饱学而心专，一辈子仰慕先贤坡公，“站在苏海之滨，

惊叹于苏海的博大精深，浩淼无涯”，他多年从事苏轼研究，体验极深极透，成果斐然。2002 年从书斋中走出，与同好苏慎君等，倡建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任会长十多年，殚精竭虑，带领同仁在苏学研究中不断跃上新台阶，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苏学研究队伍。会员由零散走向有组织，骨干队伍已形成，论文质量、数量稳步提升，还出版了一些专著，创办《苏学通讯》。2011 年 8 月，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成功举办了“纪念苏轼仙逝常州 910 周年·景苏诗文笔会”，200 多位专家与会，收到论文 240 多篇，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历届之最。这一切，都是陈弼会长主导进行的。如果说，在苏海中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是一艘船，那么，陈弼就是这艘船的船长。

陈弼先生学识丰富，见识过人，思虑缜密，又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对现实社会把脉甚切、甚准，对社会精神层面的短板和瓶颈也认识清晰。他提出以宣传、普及苏东坡文化为学习传统文化的抓手和突破口，在介绍东坡文化时，以现实的需求为依托、为背景，精选东坡名句，引起阅读者的强烈兴趣和勾起他们的美学品位，引导他们反思现实，从而达成古为今用的目的。所选名言，句句皆是苏海精华和精粹，而且题解精当。如第 43 页，“高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注解“《留侯记》。高祖，汉高祖刘邦。项籍：楚霸王项羽。忍：容忍，以待时机。”楚汉相争历史，人人皆知；苏轼评议准而切，陈弼君注解简而明，回顾历史，实际是思考现实的借鉴意义。再如，第 45 页，“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注解为“《策略第一》。患：祸害。不知其然而然：不知祸害是怎么形成的。”因文言有难度，关键句加白话翻译。陈弼君思虑周密。

（下转第 79 页）

## “书画亦皆精绝”(二)

### ——历代对苏轼书画的评价

[新加坡]衣若芬

相传苏轼又于墨竹之外另创“朱竹”画，清人戴熙（1801~1861）云：“东坡在试院用朱笔画竹，见者曰：‘世岂有朱竹耶？’坡曰：‘世岂有墨竹耶？’善鉴者固当赏诸驪黄之外。”<sup>(5)</sup>东坡的绘画作品见诸文字的尚有释道人物画<sup>(6)</sup>、雪雀（苏轼《次韵郭功甫观予画雪雀有感》，卷45）、犬、猫<sup>(7)</sup>、蟹<sup>(8)</sup>等，可惜这些画迹均已不传，而传世的画迹，例如著名的《古木怪石图》、《枯木竹石图》、《竹石图》等，以及题名为东坡的墨竹画也都尚未被学者确定为真迹。

东坡在世之时，书画即为时人所珍宝，东坡自云：“我书辄弃去，缪被旁人裹”（卷5《次韵子由论书》），“我书老益放，笔落座争掣。”

（卷34《赵景旸以诗求东斋榜铭》）王辟之（1031~？）《澠水燕谈录》卷4载：“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至于书画，亦皆精绝。故其简笔，才落手即为人藏去，有得真迹者，重于金玉。”黄庭坚《跋东坡书帖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29）亦云：“古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书，所以子瞻翰墨，尤为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价，百余年后，想见其风流余韵，当万金购藏耳。”果然，东坡身后，其所作枯木竹石便已万金争售<sup>(9)</sup>。孔武仲《东坡居士画怪石赋》（《宗伯集》卷1）云：“东坡居士壮长多难，而处乎江湖之滨。或夕休于岩，或朝饷于野。或钓于水之滨，或耕于山之下。顾然八尺，皆知其为异人。观于万物，无所不适，而尤得意于怪石之嶙峋。或凌烟而孤起，或绝渚而罗陈。端庄丑怪，不

可以悉状也。苍苍黢黢，硖硖礧礧，森森以鳞鳞，彼造物者何简也！此赋形者何多也！盖含之为一气，散之为万物，非尺度所裁量，斧凿所增损。……居士之文，俊伟闳博，纡余姣好矣，而又欲穷丹青之妙。忧以此娱情，欢以此寓笑。盖将以贾谊、陆贽之辞，凯之、摩诘之笔，兼之乎一身。故其动之为风，散之为云，敛之为秋，舒之为春，是何其视听食息与我略均，而多才与艺如此，此余之所以心醉乎斯人也。”东坡作品之高价，不仅由于东坡之声闻增益其艺术价值，而且还因为崇宁、大观年间以元祐党籍而销毁铲除了大量作品<sup>(10)</sup>，加之金人的掳掠劫取，更使得东坡书画奇货可居。何蘧《春渚纪闻》（卷6）云：

先生翰墨之妙，既经崇宁、大观焚毁之余，人间所藏盖一二数也。至宣和间，内府复加搜访，一纸定值万钱，而梁师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赍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释子所藏寸纸，皆为利诱，尽归诸贵近，及大卷轴输积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阙，输运而往，疑南州无一字之余也。

为了妥善保护东坡书画，不忍毁弃，宋人笔记中可以见到一些用心珍藏的故事，如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记载：

坡归至常州报恩寺，僧堂新成，以板为壁，坡假日题写几遍。后党祸作，凡坡之遗墨，所在搜毁。寺僧以厚纸糊壁，涂之以漆，字赖以全。至绍兴中，诏求苏黄墨迹，时僧死久矣，一老头陀知之，以告

郡守。除去漆纸，字画宛然，临本以进，高宗大喜，老头陀得祠曹牒为僧。

宋徐度《却扫编》卷下（四库全书本）云：

东坡既南窜，议者复请悉除其所为之文，诏从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祸，所在石刻多见毁。徐州黄楼，东坡所作，而予由为之赋，苏自书，时为守者独不忍毁，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楼名观风。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见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适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数千本，忽语僚属曰：“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立碎之。人闻石毁，墨本之价益增。仲先秩满，携至京师尽鬻之，所获不赀。

到了南宋，东坡真迹一字难求，孝宗乾道四年（1168），成都府知事汪应辰集苏轼书迹刻石，置于成都之西楼下，为“成都西楼帖”（或称“西楼苏帖”、“西楼帖”）30卷。后来陆游更加以选择，合为一编，名之为“东坡书髓”。陆游《跋东坡书髓》（《渭南文集》卷29）云：“成都西楼下石刻东坡法帖十卷，择其尤奇逸者为一编，号‘东坡书髓’。三十年间，未尝释手。”《跋东坡书髓》“成都西楼下石刻东坡法帖十卷”，或认为即卷29《跋东坡帖》所谓“成都西楼下有汪圣锡所刻东坡帖三十卷”中的10卷，或认为“西楼帖”另有10卷本，陆游从中择出一编<sup>[11]</sup>。“西楼帖”原石早亡，如今所传者为复刻本，有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本5册，北京文物商店藏本1册。“西楼帖”多收元丰、元祐年间诗作，楷书近徐浩，行草近李邕，是后人认识东坡书风之重要史料。后来道光十八年（1838）寥甦撰集的“观海堂苏帖”1卷、道光三十年（1850）瑛桂的“东坡苏公帖”3卷即是据“西楼帖”残本而来。南宋还有韩侂胄（？～1207）刻“阅古堂帖”（后更名“群玉堂帖”），其中一帖为苏轼。绍定元年（1228）聂子述刻“郁孤台法帖”，中有苏黄书迹各15件。明代则有陈继儒（1558～1639）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撰集的“晚香堂苏帖”35卷，明人卢氏的“雪浪斋苏帖”4卷即为晚香堂苏帖节本。至于清乾隆三希堂法帖，光绪十八年

（1892）杨寿昌的“景苏园帖”6卷，亦为流传的东坡书帖，以上诸帖由于年代久远，不免夹有伪书，学者宜察明参用<sup>[12]</sup>。

碑刻方面，至今所见元丰年间之“表忠观碑”、“罗池庙碑”，元祐年间之“司马文正神道碑”、“宸奎阁碑”、“丰乐亭记”、“韩文公庙碑”等，皆重刊本，而非原石。至于脍炙人口的名品墨迹，如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州寒食诗”卷（又称“寒食帖”）、“杜甫桤木诗”卷、“前赤壁赋”（文征明补36字），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寄黄几道文”，藏于吉林省博物馆的《洞庭湖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合卷，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李太白仙诗卷”，历千年而傲然独出，诚为稀世重宝。

### 注释

[5] 《习苦斋画絮》（台北：汉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2），卷8《便面类》。

[6] 释惠洪《石门文字禅》卷19《东坡画应身弥勒赞并序》，何蘧《春渚纪闻》卷6《东坡事实·乐语画隶三绝》：“蘧于扬州得先生手画一乐工。”

[7] （清）张道《苏亭诗话》云：“钱载有《题苏文忠公墨猫歌》，题云：‘东坡居士，向曾见其画狗，今又见其画猫。’”

[8] 晁补之《跋翰林东坡公画》称“翰林东坡公画蟹”，并评其画云：“公平居，胸中因放，所谓吞若云梦，曾不芥蒂者。而此画水虫琐屑，毛介曲隈，芒缕具备，殊不类其胸中。岂公之才固若是，大或出于绳检，小亦合于方圆耶？抑孔子之教人，退者进之，兼人者退之，君之治气养心，亦固若是耶？”《无咎题跋》（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艺术丛编》本，第1集第22册《宋人题跋》上）卷1。

[9] 费衎《梁溪漫志》卷6《论书画》：“东坡所作枯木竹石，万金争售。”

[10] 周辉《清波杂志》卷5：“淮西宪臣霍汉英奏欲乞应天下苏轼所撰碑刻，并一例除毁，召从之。”

[11] 参蔡鸿茹《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西楼苏帖”》，见1995年北京荣宝斋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

[12] 参容庚编《丛帖目》，台北：华正书局，1984年。

衣若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 恩师马德富先生传

唐 瑛

按语：马德富先生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轼全集校注》第二主编。惊闻先生于2017年4月23日仙逝，谨以唐瑛先生《恩师马德富先生传》哀悼之。

先生讳德富，蜀郡成都人。先随父居简阳，后迁龙泉驿。家中兄妹五人，先生居长。幼聪颖，善属文。壬寅秋，以成都石室中学解元入西南师范学院，时《光明日报》《蜀报》均刊先生之名。西南师范学院乃政府于西南新建之最高师范学府，录取者百不及一，先生之聪慧，此可见之。郡人称焉。

其时之西南师院，虽卑处重庆一隅，然尚有民国大家持教余绪，故先生亦能于其间得擢升人生之境。吾偶与先生谈及求学之事，先生莫不慨叹其师辈之大家风范。吴宓、刘又辛、徐无闻诸先生，都曾亲授其课。或文学，或汉语，或书法诸课。先生未及弱冠之年，能得人生教益若兹，倘溯先生后来于文学、书法之所成，莫不有关于此。

壬未年秋，先生以成绩优等毕业。其时正值文革高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兴未艾，先生亦不免。数年后，又因文名，被派成都工农兵中学。当时文革之风弥漫城乡，青年男女沉沦下潦者不可胜记，唯先生心有明灯，自学中医之余，常日夕揣摩往昔之所学。于恢复高考元年，即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改革开放后之首批硕士研究生。

先生受业于中国社科最高学府，又得钱锺书、陈荒煤等大家耳提面命、浸润陶铸，久而登堂入其室矣。待硕士学业毕，便以学问卓异留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彼时，先生进入北京大学执教亦不难，然先生之选前者，唯熟悉故耳。癸亥秋，应四川大学杨明照先生之邀，先生离京回川，栖身该校古籍所。

川大古籍所乃中华国家古籍整理委员会之下属，专以古籍整理为务。然于先生，因人地生疏，常被命以点校籍籍无名之辈为多。此等

冗务，除耗时颇巨，成果不显外，且甚为艰难。有时为索某一古奥义，遍索群经亦难得其踪。先生为此所花心血，几为人生之大半。加之蜀人中见识狭小者最善窝里争斗，先生每有新作，常被以未得领导集体首肯之故而不得发表。以至职位晋升之际，亦被没名额之荒诞理由耽搁数年。古语云，不平则鸣，压抑既久，其爆发之时唯日之远近耳！故于西元1999年，先生得调川大中文系，翌年得任该系硕士生导师。后两载间，因在《文学遗产》等连发数文，旋被委为博士生导师，引古代文学唐宋方向之研究者。“锥处囊中，其锐得发”，言先生彼时之处境矣！

在余，因学业而幸得拜先生为师！与先生往来，历时十三载，观其为人，如古之谦谦君子。每听先生之语，如醍醐灌顶，有豁然开朗之感。即在茶饭间，谈及人世，先生亦能要言不烦，人能窥其旨趣。不如此，以吾之愚钝，能顺利博士毕业于川大乎？言先生于吾之再造之恩，不为过矣！

古语云，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想先生今年暮春之还归道山，绝弃尘缘，在吾观之，亦复如是。惜先生术业之精进，吾等尚未及一半，而中道竟失先生，锥心之痛，尚复何言哉！终先生一世，有论文廿八，不刊之巨著一，即今之各名校馆藏之《苏轼全集校注》是矣。虽先生名列主编之二，知实情之人，亦能明察先生所付心血之巨矣！

呜呼，先生为人，纯系忠纯温厚者也。川大学人亦常以清流比之。古语所言之“温温士君子，谦谦古之儒”，是其详谓！倘后学者能于先生研读、校注之杜甫苏轼之文辞间，想见其一生追寻此两先贤之貌，则先生数十年孜孜不倦之探究亦值，可足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矣！

唐瑛，四川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苏东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杨常沙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们最爱称其苏东坡，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集大成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苏东坡的一生是辉煌灿烂、功绩卓著的一生，也是艰辛坎坷、备受磨难的一生。他生前曾居高官要职，名满天下，也曾被捕入狱，屡遭贬谪。他离世后的九百多年，不论官员还是百姓，不论文人雅士还是山野村夫，谈到苏东坡都会心存敬意、会心微笑。读书人读其诗词歌赋拍案叫绝，山野人讲其轶事传闻津津乐道。纵观中国历史，不论在朝在野，不论士农工商，对一个著名人物有如此的共同情感，实属罕见。

作家贾平凹说“苏轼是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此观点我十分赞同。

有宋一代，由于制度设计上的崇文抑武，重内轻外，军事上相比而言不够强大。但文化空前繁荣，教育空前普及，科技空前进步，经济相对富足。社会治理相对文明进步，在中国历朝历代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宋代相对开明的政治环境是苏东坡等一批文化巨匠得以成长的气候和土壤。

## 一、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正身立德的典范

一个优秀的民族一定会形成优秀的文化，而优秀的文化又会象江河一样源源不断地浸润滋养一个民族。这些优秀的文化会象血液一样流淌在民族的身躯里，渗透到骨髓，生生不息，绵绵不绝。

优秀的文化培育优秀的民族，而优秀的民族要有优秀的个体作为代表、作为象征、作出诠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以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儒家、道家、墨家思想以及隋唐之际大量引进中国并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佛家思想。汉唐之际，中国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佛、道思想为辅，兼及法家、墨家等各种思想为补充的一套较为完备的思想文化体系。

法家思想官方用的多说的少；墨家思想民间崇尚多影响大。这是角度不同，地位使然。

苏东坡善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养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他于儒家思想中学习最多的是民本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苏轼终身奉为

圭臬。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关注民生疾苦是苏轼为官从政几十年始终遵行的准则。

儒家重义轻利、重义轻生的观念，从小就深植于苏轼的内心。苏轼幼时，母亲程夫人亲自教其读《范滂传》。苏轼问程夫人：“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夫人慨然答道：“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正是有了儒家“兼济天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天下苍生为己念的广阔胸怀和强烈责任感，苏轼从青少年时期便“奋励有当世志”（苏辙语）。心忧天下，勇于担当。这就是他不计后果，不顾利害，一再直言上书，反复直言上谏，受挫后仍不改初心，写诗词讽喻朝政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个人仕途受挫，屡遭贬谪的重要原因。儒家思想最大的优势是解决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的人与人、人与事的关系。儒家思想的主基调是积极进取、积极向上。重点在告诉和教导我们如何“生”的问题，但儒家最大的问题是回避如何“死”的问题。也就是儒家重在讲“今生”没有解决“来世”。孟子只告诉我们“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让我们在“生”与“义”发生冲突时“舍生取义”，即告诉我们“生”与“死”的选择标准，但没有告诉我们“死”以后的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然而，生有涯，死必然。死亡对于人们来讲既是必然的，又是未知的，而人的天性对于未知的事物是好奇的，对于必然到来且又未知的死亡是恐惧的。

苏轼对佛学有较深的研究，他一生中许多高僧过从甚密，交际颇深。如广为人知的佛印和尚、诗僧参寥等。

佛教的生死观让苏轼更加坦然的面对生死。虽然宋朝皇帝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但他在犯颜直谏的时候的确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苏轼有正确的生死观。他说“死生亦细故尔”，正因为他能正确对待死亡，他才更能正确对待生命，才能活得精彩，活得有价值。道家的崇尚自然、崇尚规律，讲辩证、讲相对，让苏东坡能坦然对待困难与挫折。理论的坚实、思想的强大使苏轼心胸格外开朗豁达。使他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他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苏东坡虽然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但他没有一些读书人通常有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的“书生病”。而是一个运动健将、劳动能手。

苏辙曾写诗赞苏东坡骑马打猎，箭无虚发，无人可敌。苏轼自己的《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也写道：“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虽然“亲射虎”多系文学的夸张，但“挽雕弓如满月”和“千骑卷平冈”应是真实的描述。

苏东坡年少时就曾“手植松树三万株”，在黄州时更是“躬耕东坡”、“渔樵江渚”。

他精于烹调，发明了“东坡肉”、“东坡鱼”、“东坡羹”；他擅长酿酒，发明的“真一酒”、“天门冬酒”、“中山松醪酒”流传至今；他学习制墨、学习做笔，精心钻研，乐此不疲。

他性格开朗，心胸开阔，诙谐幽默，极具亲和力。有他的地方就有欢乐，他在的场合往往充满笑声。

他人格独立，精神强大，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犯颜直谏。神宗皇帝召对政令之得失，他直言神宗“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其《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议论深刻、言辞尖锐，古今罕有匹敌。

苏轼坦言如此逆流直谏的风险：“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上神宗皇帝书》）

“臣之所惧者，讽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上神宗皇帝书》）

直言已见会违逆上意，惹怒众臣，从而给自己带来灾祸，苏轼对此洞若观火。但他依然秉笔直书，义无反顾。古人讲“武死战，文死谏”，苏轼敢冒死相谏，不计利害，从传统道德观来讲已达到文人的最高境界。连地位比他高的司马光也承认：“敢言不如苏轼。”

苏东坡为官清廉，急公好义。在杭州，他捐出自己的积蓄建立“安乐坊”，有专家考据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官办平民医院，免费或低价为百姓医病；贬官惠州，他主动募捐并动员弟媳捐钱捐物为百姓修了两座桥；在密州，他收养了几十名弃婴；在黄州，他在自己都很困窘的情况下仍然大力倡导收养弃婴并带头捐钱。

晚年，他从海南返回常州，以毕生积蓄买了房子准备终老斯地，后来得知房主是一老妪，年老无住处，房子是被其子为偿债而私自售卖，苏东坡当即无偿将房子退还老妪并焚烧房契，结果一代巨星最终是在借住的朋友家中离世的。如此重义轻利，古今能有几人？

苏东坡重情重义，品行端庄。为人子，他孝敬父母；为人臣，他尽忠直言，任事干练；做地方官，他以人为本，以民为重；对妻子，他是好丈夫；对儿子，他是好父亲；对兄弟，他是好兄长；对朋友，他是良师益友。

## 二、敬业精事，奋励有为，建功立业的楷模

苏东坡曾担任过许多重要官职，如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担任过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扬州、颍州、定州等地的军政长官。

在朝为官，苏轼持论公正，仗义直言。地方主政，他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密州，他捕盗匪，安百姓，灭蝗虫，拾弃婴。

在徐州，洪水围城，面临城破人亡，人民为鱼鳖之险境。苏东坡力阻富户出城，动员禁军参与，亲率军民抗洪。数十日过家门而不入，始终战斗在抗洪抢险第一线。深入调研，广集民智，分道泄洪，终保一城百姓平安，获朝廷大力褒奖。

在登州，他只当了五天知州便奉召进京，其间为百姓做了两件好事：固海防、罢榷盐。登州人写诗赞美他：“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

在杭州，他力排众议，组织民工，疏浚西湖。亲力亲为，每日必上工地。没有苏东坡，西湖已被淤塞，美景不再，杭州无目。

在颍州，他亲自跋山涉水，丈量测绘，阻止了已经定板的一项劳民伤财、费力贻祸的大型引水工程。

在定州，他整顿军队，修葺营房，组织地方武装弓箭社。从家乡眉山引进稻种，教民种稻，编秧歌教民技术，解民疲乏，增加劳动乐趣。

有职有权时他有作为，无职无权当贬官罪臣时他仍然尽心竭力为百姓做好事办实事。黄州养弃婴，惠州修桥，儋州讲学育人传播文明促进民族团结。

苏东坡每到一地，都有政绩、有善行、有故事、有遗迹。每到一地都得到百姓的真心爱戴。

## 三、深思博学、笔耕不辍，立言立论的榜样

古人讲，人生要有三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这是中国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第一，一个人应有良好的品德为当代榜样、后世楷模。第二，一个人应该有所建树，做些福泽后世、惠及后人的好事。第三，应该有一些好的思想用语言文字的方式传播开去，流传下来。苏东坡给我们留下了4800多篇文章，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和《易传》、《书传》、《论语说》等极有份量的学术著作。

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巨人，而苏东坡无疑是其中最为杰出、最为丰富、最为优秀的人物之一。

有人给苏东坡冠以“千古第一文人”的桂冠，不无道理。

宋神宗曾问一位大臣说：古人中何人能与本朝的苏轼相提并论？这位大臣思忖一阵，回答，可能只有李白。

神宗摇摇头，说：李白也比不上苏轼。李白有苏

轼的才华,但是没有苏轼的学养、学问、学识。言毕,浩叹久之。

200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媒体之一的《法国世界报》连载生活在公元1000年左右,而影响之后1000年文明进程的杰出人物12位,称为“千年英雄”。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西方人眼中的苏东坡》。

有若干个大学、学术团体评选“知名度最高”、“人们最喜爱”、“最美的古诗词”、“当代大学生最喜欢的古诗词”……苏东坡的作品被选中的最多。

在诗词歌赋散文、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品类中,东坡无所不精,无所不能,并且都站在了该项目的顶端。可能某个单项他不算最好,但综合绝对是第一,无人能出其右。

“唐诗宋词”已成为一个固定词组。宋词大体有“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豪放派以“苏辛”即苏东坡与辛弃疾为代表,而开创豪放词派的是苏东坡,辛弃疾在东坡的基础上继续取得了成就。

词在苏东坡之前是一种小家碧玉般的文学形式,主要是文人墨客写一些伤春悲秋的情绪,偎红依翠的情感,难以言说的惆怅。意境词句可能十分优美,但格局境界通常不高。苏东坡以他豪迈的气概,高山大海般的胸怀和卓越的才华,将词风大改。词在东坡手中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题材上打破禁忌,实现了无事不可入词,家国大事,百姓情怀,都是东坡表现的内容。从风格上,把词的小家子气,变为洪钟大吕、浩海长风般的大气。在苏轼手中,一个被人们所钟爱的独具特色的文学形式成长定型了。

《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是豪放词标志性的作品,《念奴娇》(大江东去)更是千古绝唱。

在词这种文体上,要论贡献,论才气,论美感,论正能量的传播,苏东坡当数第一。他留下的300多首词永远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

东坡留下了2700多首诗,其中许多精品佳作。

苏东坡的诗或精致典雅,或饱含哲理,或晓畅易懂,是唐宋两代中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后人对其诗评价极高,给他封了若干个第一:“西湖诗第一”、“庐山诗第一”、“咏梅诗第一”。限于篇幅,不展开叙述。

苏东坡是杰出的散文大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人说东坡是“八大家”之首,我认为从文章的质和量上来看应该是不为过的。东坡有几十篇赋,其中最好的是前后《赤壁赋》两篇。特别是《赤壁赋》,我个人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好的一篇赋。

苏东坡还是思想深刻的学者。他晚年在海南岛致力于研究《周易》、《尚书》和《论语》,并写了《易传》、《书传》和《论语说》,这三部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东坡对此十分看重。北归渡海时东坡在船上紧紧抱着这些书稿,生怕海水、雨水把书稿淋湿。到常州后他郑重地将书稿交给朋友,并说30年后这些作品必将大

行于世。

苏东坡是中国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宋四家”之首(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代表作是《黄州寒食诗帖》,称为天下行书第三,紧随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文》之后。其在书法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苏东坡还是美术大家。他开创文人画的先河,其画作与同时代的大画家文同比肩,擅长画枯木、竹、石。其书画作品由于“元祐党人案”而大多被毁,留存下来的少量作品现珍藏于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及美国、英国、日本的博物馆。

苏东坡是生活在古代的现代人,是生活在中国的世界人,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的精神侠客。他的精神穿越时空,横亘古今。

他曾扪腹笑问众人:吾腹中装何物?有答满腹才学的,有答满腹诗书的。只有最理解他的王朝云答到:里面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哈哈大笑,引为知己。确实,他总是不合时宜。王安石激进变法他提意见,搞批评,结果是被贬、被整;司马光废尽新法,按常规说应是帮他出了气,但是他还是提意见,搞批评,结果还是被贬、被整。其实不论是新党还是旧党,最初都并不反感他,甚至有点倚重他,他只需稍微闭嘴止声便可皆大欢喜。其实他离宰执之位只有一步之遥。当然,如果为了当更大的官便不吭声他就不是苏东坡了。

苏东坡善良、无私,一心为民;正直、无畏、直言勇为;博学、善思、敬业精事;坚韧、宽容,人格完美。

他集真、善、美于一身,是中国人的理想人格。

中国如果少了苏东坡,历史会少些亮点,文化会少些趣味,性格会少些幽默,情感会少些温暖,自夸会少些底气。苏东坡是值得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并且崇敬的人。

杨常沙,眉山市政协副主席,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

## 苏轼与李清照

林冠群

苏轼与李清照都是宋代著名的词人，但苏轼比李清照整整年长一辈，社会关系上本无交集之处，但两人之间因家庭关系所连带产生了一些轶闻轶事。

李清照的丈夫叫赵明诚，看过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都知道这对夫妇之间感人至深的伉俪之情。赵明诚的父亲叫赵挺之，山东密州诸城人，与苏轼同朝为官，任监察御史。但此前，他与苏轼却发生矛盾，各生嫌隙。原来，赵挺之任监察御史之前曾在德州任通判，与他同在德州的有后来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时任德安镇监官，而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热中于官场投机的赵挺之为迎合变法，求取晋升的机会，硬要在德安实行王安石的市易法。市易法规定，商人小贩都要向政府借贷经营，每年纳息百分之二十（其实更高）。黄庭坚认为德安镇小民贫，百姓不堪盘剥，担负不起债负，因而拒绝配合执行。苏轼得知这一消息，在赵挺之参加“召试馆职”（相当于参加最高等级的公务员考试）时，公开批评赵挺之是个极力搜刮民财的“聚敛小人，学行无取”，无资格参加考试。为此，赵挺之深恨苏轼。

至元祐六年，苏轼在宣仁皇太后垂帘听政时获得重用，在京任翰林学士承旨（为皇帝起草文书的主官）时，赵挺之利用他的“御史”身份，上章劾奏苏轼在为大臣吕大防授勋晋爵而写的“制”书中有“民亦劳止”之句，认为这是在引用周厉王的典故“攻击”宋神宗时期为“乱世”，为臣不忠，毁谤人主，令“识者闻之，为之股栗”，是大逆不道。照赵挺之的意见，苏轼该当杀头之罪了。但究其实，这明显又是一种企图以文字罗织人罪的“文字狱”手段。其实，苏轼的原文是：“天维显思，当将启承平之运；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全出于恭颂当朝的联绵属对之语，苏轼亦熟知

神宗对他个人的赏识，岂有“不臣之心”？相反，若以此为论，则当时侍御史贾易弹劾苏轼的奏章中有：“豺狼当路，将肆其毒”，岂不是在攻击宋哲宗与宣仁皇太后用人不当，使朝廷上“奸臣当道”？贾易更应是奸臣一个！赵挺之的小人行径当时就遭到正直人士的鄙视。但苏轼却因为被诬而主动要求“外放”，离开朝廷到颍州任知州去了。

李清照的父亲名李格非，因文名而受苏轼赏识，与廖正一等被后人称为“后苏门四学士”。但李清照似乎对此并不买账。南宋初年（绍兴三年），她曾有诗赠韩琦的曾孙韩肖胄，称“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不承认与苏轼有任何瓜葛，撇清了与苏轼的关系。而李格非本人虽受知于苏轼，但极少来往，考其生平，当苏轼获罪被远贬儋州时，他获得晋升，成为吏部员外郎，可见已经摆脱了苏轼的影响。而李清照在苏轼去世那年（1101），年十八，嫁与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成了苏轼政敌家的儿媳。从这层关系上看，她对苏轼并无好感可知。相比于另外一个受知于苏轼的陈无己（师道）来看，简直判若两端。苏轼被弹劾南下杭州任职时，陈无己不顾利害，私自给苏轼饯行，因此而被革职查问。并且他的妻子虽与赵挺之的妻子同为姐妹，却从来不登赵家之门。有一回，天寒地冻，官府有事须整装出门，而陈无己家贫，只有一件寒衣，难抵酷寒。他妻子不得已，往赵家求姐姐要来一件皮裘大衣给他御寒。他知道这是从赵挺之家借来后，拒不使用，结果因受寒得病而死。同为苏轼所赏识的名士，竟有如此差异。

不过，李清照之父李格非虽蓄意与苏轼保持距离，后来又与苏轼政敌赵挺之结为儿女亲家，却也未能与赵挺之走到一起。相反，到了宋徽宗朝，赵挺之作为排击“元祐党人”的干

将获得重用，官至副宰相，权倾一时。而李格非却因蔡京颁布的“元祐党籍碑”上列名其中，被革去了提点刑狱的官职，被驱逐出京，全家生计顿入困境。李清照作为赵挺之的儿媳因此出面求情，请赵挺之网开一面，给父亲一条生路。但赵挺之无情拒绝，冷若冰霜。李清照为此有“炙手可热心可寒”，“何况人间父子情”的诗句，对赵挺之的势利无情表示出极大的愤慨。故此后人也有赵挺之不满赵明诚与李清照的婚姻，猜忌儿媳的传言。还有“赵明诚死后，李清照改嫁”的传闻也公然出现在宋人的笔记中。

北宋末年，王安石变法之后，像赵挺之这类钻营投机、拉帮结派的政客布满朝列。而且更为可恶的是，这些人结为党派排斥正人却反指对方为“党”，造成“新旧党争，祸及社稷”的假象，于是像苏轼这样本无意于争权霸位、邀宠干禄的正人君子也被诬称为“蜀党”，冤背黑锅，至今未能解脱。让人感叹的是，赵挺之最后也因与蔡京争权而被蔡京整垮，落得个“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贻笑后人。而因赵氏的倒台，赵明诚的猝死，李清照晚年也很不幸，虽不至穷饿饥寒，却也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景况十分萧条。

林冠群，原海南日报社总编助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海南省儋州文化研究会会长。

#### （上接第71页）

陈弼先生对苏东坡诗文烂熟于心，目光高远。所以选来驾轻就熟，体现了读书和理解力的功力深厚。

陈弼先生对东坡诗文和前人的苏学研究成果，能广泛地吸收，既不盲目排斥，又不全盘吸收，而是科学分辨，以现代的唯物辩证观点，体察苏东坡的处境和背景，探幽发微，再联系当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形成自己的观点。鲜明

而实际，简炼而清晰，科学而准确，实用而深邃。他的研究论文，不尚洋洋大篇，能短即短，不用术语，力求把话说清楚，把论点表述明白。他的话题论征，既集前人之精髓，又启后人之创见。

如《苏东坡如何适应谪居的黄州环境——兼述其黄州诗文中的环境信息》，陈弼先生从苏轼是如何主动适应环境、调整心态的角度入题。角度新而且切合苏轼豪放的性格、随遇而安的心态。文本用事实说话，抒写黄州的山水风光是如何感染苏轼，引苏轼的诗文中美景描写说话：他乍居临皋亭，作《南乡子》（晚景落琼杯）：“晚景落琼杯，照眼云山翠作堆，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葡萄涨绿醅。……一阵东风来卷地，吹回，落照江天一半开。”暮春晚景触动了苏轼心中之景，自然排开了愁绪。文本还大量引用苏文苏诗，说明苏轼是如何逐步适应艰苦的生活环境。文本还记录苏文苏诗是如何保留了当时鲜活的环境信息，还原了苏轼当时的心态。这样的论文文本，自然朴实，严密科学，思考缜密，自是受到读者欢迎和接受。

“九百来天地变，斯民终始爱坡翁”（张志烈），85岁老人陈弼的《千年东坡百家赞》即是对坡翁的敬礼。这部书凝聚了陈弼先生的心血，这部书的出版也凝集了常州精英们的心血：爱国儒商杨克平先生鼎力资助出版；屠岸老先生题签题诗，为此书增色；这部书编辑大气，编务精良，精细，精准，装帧尤精美，编务主任陆文桂老人等着力兹多；该书几无差错，85岁老翁朱海涛等校勘尤力。

苏海无边也无涯，如今，陈弼老人把常州苏东坡研究会的接力棒传递到现任会长卢晓光手里，卢会长勇于担当，挑起了“高山景行，仰之行之复传之颂之”的担子，带领研究会同仁开启了新征程。

许植基，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 徐州举办苏轼诗词朗诵会

2017年4月25日上午，为纪念苏轼诞辰980周年、苏轼知徐州940周年，由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徐州市诗词协会、徐州市朗诵协会主办，徐州市慧衡朗读者之家协办的“苏轼诗词朗诵会”在徐州矿物集团老干部活动中心举办。徐州市苏学界、诗词界、朗诵界一百多名骨干人员参加了会议。

大会由徐州市朗诵协会会长李莉主持。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魏新建，徐州市诗词协会副会长孔伯祥，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徐新民、陆明德等人先后在会上讲话、致词或献诗。

大会朗诵的诗词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徐人颂苏子。朗诵陆明德先生的十五首咏苏诗词。主要有长篇叙事诗《彭城再唱苏子歌》，下分八节，二百二十六句，采用七言歌行体的形式，讴歌苏轼知徐州的历史功绩，表达徐人

对老太守的无尽思念和崇高敬意。另有咏苏诗词十余首，如《古彭寻太守》、《饮鹤泉抒怀》、《杏花村礼赞》、《群羊坡礼赞》、《苏公岛》、《苏公塔》、《苏公馆》、《苏公桥》、《重游百步洪旧址》、《画堂春·黄楼诗会》、《浪淘沙·抗洪石柱》、《西江月·筑堤抗洪》、《西江月·访张山人旧居》等。第二部分为苏轼咏徐州诗文。主要篇目有《登云龙山》、《送郑户曹》、《浣溪沙·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放鹤亭记》、《访张山人得山中字二首》、《永遇乐·燕子楼》、《江城子·别徐州》等。徐州市著名朗诵家李莉、王科竞、李莉华、张立东、王继平、张立东等人登台献技。台上妙句层出，韵律高昂；台下凝神注目，掌声不绝。会场上充满了思念、崇敬、欢乐、祥和的气氛，令人鼓舞，给人启迪，催人奋进。朗诵会持续了两个小时，取得圆满成功。（有愚）

## 四川工商学院三苏文化研究所成立

5月16日，四川工商学院三苏文化研究所成立。眉山市政协副主席杨常沙，眉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邓敏，眉山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尹鸿，眉山市文联主席王莉茹，学校领导王六章、夏明忠、杨夫子、赵同胤、胡雁出席成立大会。三苏文化研究所由该校副校长胡雁担任所长，图书馆馆长吴章贵、人文学院院长高恩胜任副所长。在成立大会上，王六章董事长为客坐研究员杨常沙、方永江、刘清泉等颁发聘书。

王六章说，成立三苏文化研究所，是学校传承地方文化、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尝试，也是学校推进转型发展，加强特色鲜

明的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举措。我们要加强研究所建设，深入研究三苏文化。

夏明忠校长指出，成立三苏文化研究所，是学校参与眉山“文化立市”战略的具体体现。学校有条件有平台也有能力搞好研究。我们要坚持研究与开发、推广并重，形成系列文化成果。眉山文化灿烂，苏洵、苏轼、苏辙“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

该所的成立旨在对三苏文化进行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和产品开发，主办或承办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有愚）